

●福建近现代人物

易学宗师黄寿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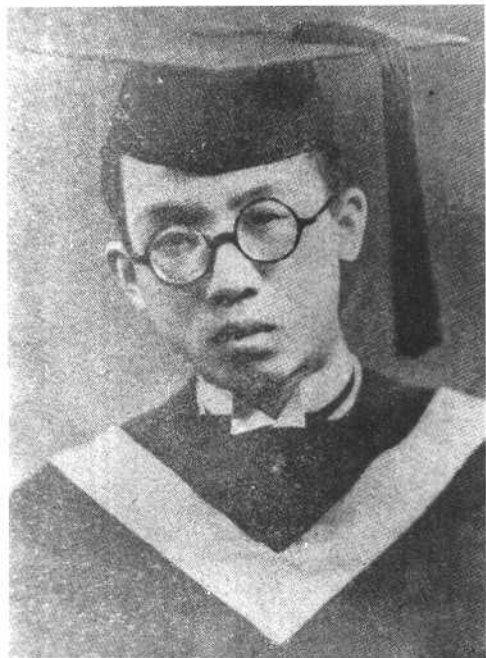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3·福州



黄寿祺教授



1935 年 6 月北平中国大学毕业时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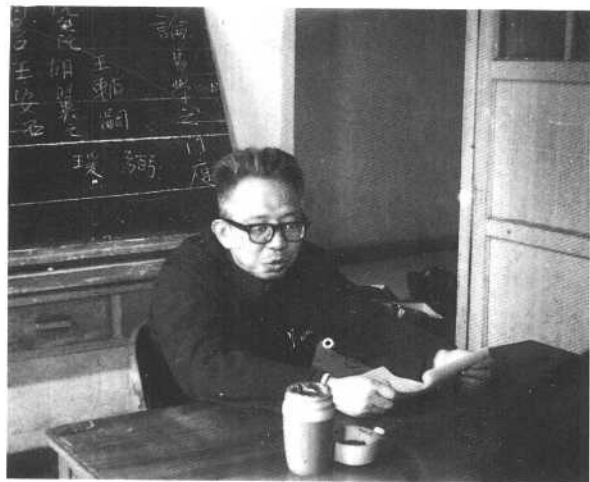
1940 年元旦摄于北平



黄寿祺(前右)与家人合影(195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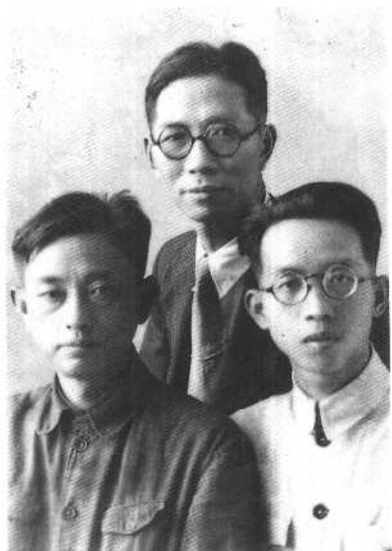
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1961 年)



为研究生讲授《易经》



1990年3月摄于美国洛杉矶



黄寿祺(右)与画家吴茀之(中)、
诗人包树棠合影(1942年,南平)



与俞元桂教授在一起(1987年)



陈光毅(左三)、何少川(左二)、陈明义(右一)、
叶品樵(左一)同志与黄寿祺及其家属合影(1990年
元旦于黄家)

電波傳訃告
舉世盡哀傷
頓下英雄淚
如臨父母喪
功同河嶽壯
名炳日星光
永記承延見
生生未敢忘

悼念周总理

壽祺



七十如今已不稀
九旬還少望期
頤愿將暮齒為蟄
燭放尽先
芒吐尽丝

辛酉春月

黃壽祺



黃壽祺手迹

序

俞 元 桂

黄寿祺教授离开我们3年了。去年，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了悼念他的逝世，筹划编印一本纪念文集，约请黄先生友好和学生撰文寄托哀思，让他们以亲身体验，多角度地映现黄先生的道德文章的美质，以为后学的楷模。经过同志们的协作努力，这个集子已编成付梓，即将呈献于读者面前。

黄先生是享有盛誉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壮岁游学北京，师事吴承仕、尚秉和等著名经学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开始了宏伟的著述实践。毕业后，在母校短期执教，随即南旋，长期在福建省高校中文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兼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教泽宏敷，造就甚众。他诗中有“及门弟子追洙泗，开国文章迈汉唐”之句，这并非夸饰之辞，仅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受业学生，已倍于三千之数。本集文章的作者多为知名的教授、作家、编审和文化界的领导干部，其中不少是芬芳桃李。他们以深情的感念，回忆亲沐春风的岁月。黄先生学识渊博，治学谨严，求真务实；他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默化潜移，催人

2013/13

上进。

黄先生壮年就精研易学，著述日富，崭露头角。解放后，他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且易学又被目为禁区，因而易学研究工作长期搁置。改革开放后，易学的价值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成为显学。福建师范大学成立了易学研究所，为他配备了助手，他招收了两批研究生，他的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0年间他同其弟子向我国学术界奉献了累累硕果。

作诗填词，涵养性情，是黄先生学术工作的余事，其成绩亦粲然可观。记行藏，抒友谊，感时事，写游踪，可概见平生。集中佳制，雅正蕴藉，媲美古贤精品。晚年被推为福建省诗词学会首任会长，领袖骚坛，推动了八闽诗风的发展。

解放后，我与黄先生共事近40年，追随左右，亦师亦友，相知颇深。兹略举三事，以见其爱国至贞，行芳志洁。一、壮年从军。三十年代，强邻压境，黄先生以一文弱书生，奋起投笔，愿为抗击入侵者效命疆场。二、老年入党。长期以来，他处处以高标准自律，以七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三、晚年出国。黄先生逝世前半年，应邀赴美国讲授易学。美籍华人慕名以金元求占卜者甚众，他一律谢绝，不愿助长迷信，玷污国誉。以世俗眼光衡量，不惜性命，不图权位，不爱钱财，简直是迂阔过甚，古板可笑。可这就是黄先生真淳的本色。他严于操守，有所为有所不为，决不随波逐流。他还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多年为省政协委员、常委，参预并领导文

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参政议政，光明磊落。

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经历着艰苦奋斗、奋发腾飞的征程。老一代知识分子面对艰难，备尝困顿，分享喜悦。黄先生总是坚守教育阵地，乐于育才，献身学术，卓有建树。他在古稀之年写道：“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他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实现其人生价值。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不再来，古今同叹！可喜的是薪尽火传，黄先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与学术事业后继有人，阵容壮大。学艺的成就是可贵的，嘉言懿行尤可珍惜。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已为世界所瞩目，黄先生未及目睹近年盛况，诚为遗憾。这本集子的出版，他的亮节高风将为更多的读者所认识，使人远离庸俗，在消除社会中拜金主义等消极思想的影响上将发挥良好的作用。先生的精神是永存的！“哲人日已远”，其道行与学术的遗产定能永焕辉光。

1993年6月于文园

主 编：

吴修秉

副 主 编

责任编辑：

黄小宁

目 录

序	俞元桂(1)
纪念六庵先生	周振甫(1)
题黄六庵先生纪念集	游 寿(4)
忆与黄老相处的日子	(美国)李珍华(5)
城曲曾同作布衣 ——忆黄寿祺教授	刘蕙孙(10)
雪泥鸿爪忆往年——小记与之六老友共处时 的生活片断	徐君藩(17)
文章道德 千古常青	高时良(22)
黄寿祺教授遗事纪略	陈祥耀(26)
忆之六先生	蔡厚示(32)
放尽光芒吐尽丝——黄寿祺教授晚年光荣入党 前后	李青藻 徐金凤(35)
我的怀念	郑松生(41)
至诚至善的人	陈钟英(43)
良师虽逝 风范长存	刘学沛(47)
正直、坦诚的长者 ——缅怀黄寿祺教授	吕荣春(50)
高风垂范 菩萨心肠	陈炳昭(56)

哲人逝矣 风范长存	佟亦非 熊先煜(58)
黄寿祺先师二三事	郑光仪(61)
永远怀念敬爱的之六老师	段亦凡(64)
追忆黄之六老师	林新樵(67)
隆恩高谊 永志心中	张可珍(70)
怀念寿祺师	郭 风(73)
一代宗师 永在我心中	方南生(76)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李联明(82)
忆念吾师黄寿祺教授	林海权(85)
永久的怀念	

——忆黄寿祺教授二三事

王惠廷(92)

“烈士老怀伏枥骥，盛时利见在田龙”

——深切怀念恩师黄寿祺教授

彭一万(96)

时光磨洗不尽的记忆

——怀念之六先生

李 仲(100)

但求永保童心在 绝假纯真志不移

——深切怀念寿祺老师

林景华(107)

魂牵梦萦忆恩师

(香港)施议对(112)

师生情 忘年谊

(香港)邹宗彬(120)

立身应世本真淳

——记六庵先生二三事

孔庆洛(123)

党心国心 永沁后人心——纪念黄寿祺老师

逝世三周年

金学渊(126)

春风细雨忆红楼

王筱靖(129)

追念黄老

林玉山(134)

留取丹心照后人

——忆六庵老人……………李悦照(137)

闽中宿学 陇上遗踪

——记随六庵师西行……………郭天源(142)

略述黄寿祺教授对语言文学教育的贡献

……………张均(147)

老树当风叶有声

——记黄寿祺教授……………俞元桂(153)

记与黄寿祺教授共事的岁月……………吴修秉(163)

寒灯冷雨忆恩师

——记随之六夫子学词三四事……………黄拔荆(168)

六庵之诗及其诗学主张初探……………王景祺(171)

先师黄寿祺教授治《易》成就述略……………张善文(186)

黄寿祺自传……………(195)

黄寿祺年谱简编……………黄高宪(211)

六庵先生著述要目……………郭天源(220)

编后……………(231)

纪念六庵先生

周 振 甫

1979年冬，厦大郑海夫先生约振参加厦大盛会。在厦大宾馆，与六庵先生同住一室。先生温文尔雅，其言蔼如，咳唾随风，皆成珠玉，信为诗人，言引《易》辞，深于《易》学。及归，导游泉州，先生于名胜古迹，如数家珍，知先生又熟于文献掌故。尝言泉州本多刺桐花树，有刺桐城之美称，惜今已不可得见。又导游梵宇，观弘一法师真迹。游李贽故居，观穆罕默德二大弟子圣墓，多所论列。振甫据先生所论，草为韵语，有“刺桐花树已难寻，留取佳名亦有情。胜景何年得重见，刺桐花绕刺桐城”；“花枝春满弘公偈，四十年前得见之。今日来参真迹在，高山千仞久钦迟”；“王学昔曾尊左派，法家虚誉说《藏书》。文章身价随时变，凌乱今看李贽居”；“可兰经与刀兵接，宗教战争我却无。应感尼山施教泽，二贤遗蜕委寒芜”。有所论列，皆得先生之教，思之如昨日事。既抵福州，又承先生导游福州名胜，不辞劳瘁。复蒙厚待，亲示易学求蓍得卦之法，至为可感。既而以先生搜集之《周易资料汇编》见寄，俾得稍窥治易各家之说，得开茅塞。

1984年，先生有《端午节日在周易讨论会上作》一诗见寄：

羲经丽泽利同人，讲习能教耳目新。

包扫百家神入妙，涵濡万祀健无伦。

群言歧异宜征圣，绝学承传贵得真。

盛会吟诗逢午日，陶然一醉汉江滨。

诗称“丽泽”，即用《易·兑》的“丽泽，兑”，“丽”犹连也，两泽相连，润说之盛，喻朋友讲习切磋之乐。“同人”为《易》卦名，用称同志。先生论《易》，包举百家，探神妙而扫浮辞，崇尚自强不息之义，以圣言为归，贵得真义。于此见先生之诗作典雅而《易》学精纯。

后中华书局命振甫编《周易译注》，乃于《周易》释名，知有黄优仕《周易名义考》、吴汝伦《易说》、尚秉和《论周易二字本诂》，皆得之于先生所赐之书。虽振甫之所释，本三家之说而加以推论，实不同于三家之释，然推论所得，实有赖于三家之说，此则先生之所赐也。至于论爻分阴阳，有郭老说，有汪宁生《八卦起源》说，吾虽舍郭老说而取汪说，而于汪说实得之于先生之书。论八卦代表八种事物，本于庞朴《八卦卦象与中国远古万物本源说》；说《彖传》、《象传》之作者，引王开府《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说；论《彖》、《象》、《文言》、《系辞》产生的时代，引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说；论《说卦》、《序卦》、《杂卦》产生的时代，引张岱年《易大传著作年代新考》；论《易传》的思想，亦本于张岱年说。以上引用诸家之说，皆得之于先生之书，皆先生之所赐也。

论《周易》之象数说，吾据李鼎祚《周易集解》，但《集解》释《乾卦》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引虞翻说：“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这是说，《乾卦》九二的阳爻生长到九三，即倒数第二爻到第三爻，都是阳爻（——），没有阴爻（--）。离（☲）是两阳爻夹一阴爻，从九二到九三，怎么变成离呢？又《乾卦》是六个阳爻，《坤卦》是六个阴爻，怎么又来一个“坤为夕”呢？这个《坤》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些问题，振在引象数说时不解，本想向先生请教，念先生执教治学极为烦劳，不宜打扰，因向先生高第张善文同志请教。得张同志指示，按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息，长也。阳长至三，为《泰》；二失位，变正成离（☲）。”这是说，虞翻用“消息”“之正”来讲《易》。“息”指长，长指从初九进到九二、九三，

即《乾卦》的下卦从初九到九三是阳爻(☰)，是《乾》下。“消”指变，即《乾卦》从九四、九五、上九的阳爻(☰)变成阴爻(☷)，即《坤》(☷)上，成为泰卦，所以《乾卦》的上卦变成《坤》(☷)了。又讲“之正”，认为《乾卦》的“九二”是阳爻居阴位(二是偶数，是阴位)，不正，要变为阴爻，所以成离(☲)了。经过张同志这样解释，才明白虞翻的说法。这说明先生的《易》学已有传人，极为可喜。吾用象数说解《易》，这就有所取舍，即不取虞翻的这个说法了。按《乾卦》，九二以阳爻居阴位，不正，是对的，但九二还是阳爻，没有变为阴爻。《易》讲消息是对的，但《乾》的上卦是三个阳爻，并没有变为阴爻，虞翻用“消息”说来使《乾》的上卦变成《坤》，用“之正”说来使《乾》的九二变成阴爻，与《乾卦》的六个阳爻不合，故不取。《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用不着变阳爻为阴爻。这样，振对于象数说有所取舍，明白虞翻的这个说法不足取，实得于张同志之教，也即得于先生之教了。拙编《周易译注》付排后，得善文同志惠赠先生与善文同志合著之《周易译注》。这部大著中，有《读易要例》，引宋代学者开《易》图之学，以为《易》图化繁为简，“识其阴阳生化之原，奇偶交变之义，而后观象玩辞，有所准的”。因有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十二辟卦方位图、二十四方位图、卦气图、六十四卦方圆图、八宫卦图，足见先生的《易》学内容极为丰富，已不限于《易传》及汉代的《易》学，而兼及宋代及其之后的《易》学，体大而思精。先生《易》学，得善文同志继承而研精，尤为可喜。诚当再读先生及善文同志合著的《周易译注》，以益吾不逮。

1992年8月

题黄六庵先生纪念集

游 寿

倚楼东南望，潸然思良朋。昔我翔北国，唯君是先登。红学讨论会，此艺未敢胜。故里之英俊，易学谁足承。悠忽日月逝，难艰经锻炼。君独悟斯旨，耸然即飞腾。太姥无多路，严黄盐田称。我姨有贤侄，与君结萝藤。令郎育孙女，三世文章赓。远约看桑梓，考古讲学应。潭府开客馆，酬答如直绳。白日劳咨询，长宵记之恒。西行探陕洛，传世赋比兴。遥寄多鸿篇，篷竿几榻增。飞越太平海，想象机窗凭。囊中贮吟富，留作采风征。亚美新教席，皓洁如日升。放眼八十寿，行健不息称。险夷常不改，操饮常曲肱。治易七十载，著述中外凭。

公元 1992 年，夏历壬申金秋，哈尔滨师范大学八七嫗游寿初稿

游 寿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忆与黄老相处的日子

(美)李 珍 华

我有幸结识黄老是在1984年的秋天，那时我从兰州东下，经上海折道入闽，到了福州。这是我第三次从美国回大陆。第一次是1972年，由香港经广州、韶山、长沙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第二次是1981年夏天，我率领一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史的美国青年学生到西安活动。这一次是到兰州，参加全国第二届唐代文学学会会议。

记得那时，虽已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但办理各样手续还比较费事。我到兰州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帮了大忙，而我的第一次入闽，则不得不感谢项南先生，是他应我的要求，批由福建师大接待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闽籍人士的，师大则批由黄老接待他的霞浦小同乡。

在福州，我住在师大招待所的一个套房里，条件很不错。当时似乎是台风初过，天气比较凉快。招待所里客人不多，用膳时除我以外，尚有一位日籍教师。我在福州期间，主要在师大作了一次讲话，和外语系老师交换了一些意见。

我早岁离开霞浦，对家乡的亲朋故旧都欠深切了解。我有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叫毕寿松（霞浦盐田人，中等个子，一品仪表，言行雅有儒者之风），我似乎就是从他口中约略地听到我县在外的一些名流学者的情况的，内中就有黄老。当时年纪轻，自然目不

识泰山，更谈不上对他们各人在学术和事业上的成就有多大认识了。

在福州和黄老相处期间，由于他只字不提自己的事，而只是忙着安排和陪同我活动，在开头的几天，我对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易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占的地位不甚了然。仅在这一点上，就足见前辈学人的谦逊之风。

我真正有时间和机会领略到他在古典学术上的成就，是在一天下午等车子的时候。写到这里，要把事情说得远一些。60年代中期，我对唐诗开始发生兴趣。当时，我正在教美国文学，为了探求中外文学中印象派和象征派发展过程的有关问题并作中外对比，我追溯到李商隐、李贺和杜甫，并最终沉浸于盛唐的诗歌创作及其批评理论中。我把主要点放在一位诗人——王昌龄、一部总集——《河岳英灵集》上。王昌龄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他享有所谓“诗家天子”和“绝句圣手”的美誉，更在于他对诗歌创作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于他所著的《诗格》。《诗格》和《河岳英灵集》的“序”和“论”是异曲同工的，两者都是当时的诗歌创作理论和艺术批评的代表作，都强调声律和风骨的融合。在声律方面，两者都提到抑扬律（包括轻重律、长短律、平仄律）的问题，都强调“词与调合”，而这个问题是与盛唐诗歌的吟咏方式相关连的。我不由地想起杜甫的名句“新诗改罢自长吟”、“独立苍茫自咏歌”，他老人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神态也恍若眼前。我感到，王昌龄时代的雅言离近代北方方言较远，而离闽粤吴语较近，由此想对用福建方言吟咏唐诗的方法作一番探讨。我的想法曾得到安旗教授（当时任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的支持，他并与河南大学华钟彦教授共同发起组织唐诗吟咏研究小组。

现在言归正传。那天在候车时，我偶尔提到唐诗的吟咏问题。黄老一听，顿生兴趣，我当即取出录音机请他用霞浦方言吟唱王

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之一）》：“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名诗家喻户晓，我每次请人吟唱必坚请用方言，目的在于便于作音韵和声调的分析。我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录音材料，内中最令我满意并印象最深的便是黄老的吟咏。我离乡 30 多年，乡语几已全忘，但对书面语的发音多少还能领略。黄老吟咏时的抑扬顿挫、吐字转气，尽洗尘气暑热，令我有神游“故国”之感。于是不揣冒昧，不作客气之词，请黄老一连吟了好几次才罢休。

出于好奇，我问黄老，他的吟咏是家传或是出自师承。他说是出自师承，老师是曾住在霞浦的陈善臣老先生。我一听大感兴趣，因为陈先生是我初中时代的国文老师，对他，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他在课堂上要我们反复吟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他启发了我对诗歌的兴趣。那时，我和他的儿子陈辉过从甚密，故而亲聆教诲的机会较多。陈先生所教的七言绝句吟法和黄老的吟法是一致的。发现自己与黄老在唐诗的吟咏上同出一个老师门下（尽管年岁有差），便觉得和黄老在感情上一下子接近了许多。

此后，每若得便，我就询黄老一些家乡讯息，以及师辈和同学的情况。这其中，感受最深的，便是我小学五年级时认识的叶挺荃老师的事迹，他英年早逝，“天殒国宝”，可惜可叹。我希望叶师的笔记能够有机会被整理出来，或可作为一个时代的剪影和脚注。

在福州期间，曾有机会到黄老家中，至今，对他的公子、媳妇和小孙女黄嫫，印象犹新；家中罗列架上的“劫后余生”的线装书和挂于壁上的一幅国画、一幅霞浦杰出女学者游寿的书法，仍然在目；小黄嫫的唱诗和“三山诗社”几位女诗人的吟唱亦宛然在耳。

回美国后，我曾给华钟彦教授写信，请他有便与黄老联系。从

华教授的回信中得悉，他和黄老本就是吟友——真太巧了！不幸的是，现在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都已仙去，不知唐诗吟唱研究这一项工作有无后继者在。如果后继无人，至数十年后才“心血来潮”、想回过头来挽救和保护这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来一个“礼失而求之于野”——那恐怕就太迟了。细想一下：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外的人来说，想领略唐代寺庙宫观建筑的丰采，除回祖国外，还可以到日本的京都、奈良或宇治等处去；想品尝唐代乐器的古风神韵，亦除回祖国外，还可以到日本的正仓院去；想欣赏唐代戏剧的表演艺术和优美唱腔，可以到漳州、泉州一带去听南戏和梨园旧唱。但是要领略唐诗的吟咏又该到哪里去呢？现在福建经济起飞了，关心家乡文化事业的当大有人在。一些巨商富贾是否可以和有学养的地方人士协力合作，就在黄老生前培养过众多学子的福建师大成立一个和闽地各处诗社互通声气的诗歌吟咏研究资料中心，与方言学、文学和语文教学工作者一起，努力继承和发扬诗歌吟咏这项古老的事业呢？（霞浦长溪诗社社长张景嵩师长曾应我所求，把他们用霞浦方言对自己的诗作所作的吟唱录了音，寄来给我）我以为，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既有利于保护这份文化遗产（对保护文化遗产，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无力顾及；而中国时下经济如旭日东升，且为泱泱大国、文明古邦，安能在这方面瞠乎人后），同时不也是纪念黄老的一个具有深长意义的方式吗？记得去年11月在厦门参加由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第二次国际学术会议时，有机会和旧友、福建师大的陈祥耀教授作一夕谈。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是：我们闽中学者比之于上海和北方一带学者，较长于创造、写作，后者则以多藏古籍之便而长于考证。这句话很深刻，给我启发良多，受用不尽。闽中多志士英才，在文化方面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很多贡献，黄老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便是一例。

离开福州前，黄老送我几本他的易学专著。回美国后细读，发

现他是个典型的中国学者——既深于研究，又善于文学创作——是个通才。我对古代哲学一直有兴趣，对阴阳象数之学稍有涉猎，可惜无缘亲自获教于黄老，诚属平生一大憾事。

走笔至此，回顾与黄老相处的日子，深感时间虽短暂，但获益甚多。黄老的文章、道德、风度都使我这同乡后辈心仪不已。

1993年3月5日

李珍华 博士，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教授

城曲曾同作布衣

——忆黄寿祺教授

刘 蕙 孙

黄寿祺教授逝世，不觉近3个年头了，诸同志预备写写纪念文章，要我也写一篇。我和寿祺同志还在20几岁时就在一处工作，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友了，自义不容辞；但黄教授是朴学大师，仆何人斯，敢乱置喙？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二人躲在北京西城城角落里，布衣素食，一段交往，还是值得回忆的。

事情要从我自己说起。1935年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习，就辞了金城银行的工作，转到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顾颉刚先生领导下担任编辑。1937年初，顾先生有一个雄心壮志，要从冀察西湖上、下受降城，作一番地面考古调查。嗣得到中英庚子赔款的资助，就组织了冀察古迹考察团，由我和吴世昌、张维华、王震锋带领照相、测绘和勤杂人员各一名，作第一阶段、即河北河南地区的考察，由我任团长。我们7人先到安阳的小屯、邯郸的赵王城、定州的中山古城、曲阳的北岳庙和燕下都，一路很顺利，但到了易县就霖雨不止，无法做野外工作，一连六七天。我们想这样空住着白花钱不值得，就打电报向研究院请示如何办法，回电说：“易县离北平很近了，先回来，等天气稳定了，入秋再出发，接着向西北去。”我们如命而回，傍晚路过卢沟桥，见那里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景象。想不到回来不过两三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风云变

色，不久北平沦陷，文化学术机关纷纷内迁，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顾颉刚先生去了甘肃，史学所历史组群龙无首，无形解体。日伪政权成立，我当时虽已有家小，但尚在庇荫之下，暂时尚不至没有饭吃，但有一个隐忧：我原是同文书院的学生，曾到日本留过学，在北平研究院工作的几年中，凡有日本学者来访问顾颉刚先生，都是我做翻译，和他们混得很熟；倘没有一个隐身之地，这些人会来麻烦我。于是我想住进租界，为此去找沈兼士先生，说想进辅仁大学，其时已是9月。沈先生说：“现在人事已定，没有办法了，倒是中国大学一些有共产党关系的人都走了，而学校要开学，就聘孙蜀臣为国学系主任。孙要组班，来找我要人，你去找他吧，就说是我要你去的。”我就去找孙先生，孙说：“现在齐燕铭走了，他以唯物史观讲的中国文学史很叫座，没人敢接，你能不能代课？”我是初生犊儿不畏虎，心想中国文学史是常识性的问题，很容易；唯物史观的书我在日本也不只读过一部，这有什么？就一口答应下来，孙先生很高兴。第二天，中国大学就将国学系中国文学史讲师的聘书给我送来。

10月初，中大开学了，我去上课，中国文学史是一年级第一门课，排在开学第一节。当我走进半翠堂（教员休息室）时，见那里空空荡荡，除校工老艾一人外，就再无他人。等到上了课堂，也只在第一排靠窗坐了一个学生，这样既没法子开讲，又不好不上课，就在讲台上讲起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来，扯了20分钟，就下课了。回到半翠堂，看见我原来坐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穿阴丹士林大褂的先生，看起来不过20几岁，和我差不多，旁边茶几上，放着一个旧绸书包。我想，这一定是国学系的老师，便走过去和他搭话，其人也起身答礼，说是姓黄，名之六（以下就称他为“之六”），是本校国学系毕业的，本学期受聘为讲师，是孙蜀臣的学生，福建人。问他教什么课， he说是教《宋元学案》——三年级的选修课，我不觉肃然起敬。因为我觉得文学史这类课程只是常识，而《宋元学案》则是理学，不是一般人所能讲的。听他自介是福建人，我更

有兴趣了，因为其时我正在研究“太谷学派”的由来，正苦于找不到资料来印证关于“太谷学派”是出自福建莆田李兆恩的这一说法；心想他既是福建人，又研究理学，应该懂得，就趁机向他请教。之六说：“不是李兆恩，是林兆恩，《辞源》弄错了，我写过他的传，下次带来向你请教。”我听了大喜。他要上课去了，于是道谢而别，这半翠堂成了我和黄教授的定交之处。

第二周，我又在休息室见到之六，他不失信，果然把《林兆恩传》带来，我不禁有点失望：只薄薄两三张纸，是记林兆恩毁家请兵赶走倭寇并埋葬死人的事情，并未谈到林的思想，再向他请教，之六说他也不懂，只莆田、仙游一带信仰林的人很多，他的祠堂和土地庙一样多。我觉得他这人很诚实，就问他除中大以外，在别的学校有没有课程。他说在嵩云中学教一班语文，每节课只6角钱，一个月12元，他也就住在那里。当时，中大的待遇也很低，每小时只1.5元钱，一个月也是12元，连一个小学教师的待遇还不如，我俩不觉叹息，相互说“只好辞富居贫，深藏城曲吧”。

第二年，我在辅仁大学兼任史学系“金石学”讲师，还兼了一年级一个班的国文，每月有65元收入，总算“住”了“租界”（“住租界”，这是当时既无法南下又不愿进日伪学校工作而不得不躲在教会学校里混饭吃的人自我调侃的话）。我在中大，中国文学史课多了一节，课时增至3小时；另有一门“陶、谢诗”，原任课教师半途不教了，荐我代授，共有5节。授课待遇也改为每小时3元，每个月有60元，两处共125元，生活自然好些。之六仍是两个小时，不过把《宋元学案》换成了《周易》。当时，工资是长了一倍，但面粉的市价已从一袋2元多涨到5元多。因为混熟了，我就问之六：“现在物价一天高似一天，你这一点收入如何生活？”他叹说：“毕业以后，为了在北京多住些时，多读点书，多向先生们请教，所以未走。中学这几十元本来喝稀饭也不够。不瞒老兄说，是尚节之先生叫用他的名义写几篇《周易》提要，拿点钱勉强维持。当了中大讲师后，才用自己

的名义写，不分润先生的收入，这总不算周粟吧？”

写到这里，须顺带介绍一下《周易》提要的写作是怎么回事。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也是战胜国，各国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但不能作为政治、军事的开支，只能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至于用法，退还国可以跟中国协商决定。“清华学校”和留美学生经费就是从美国退还的赔款中开支的。日本退还的赔款分三项开支：其一，组织“日华学会”，管理一部分退还的赔款，作为对在日留学生的津贴；其二，组织“中日教育会”，把原来日本“东亚同盟会”所办的天津同文书会接收过来，改名为“中日学院”，培养留日学生；这最后一项，就是组织“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中日名流，续修乾隆以后出版的经、史、子、集提要，以中国人江瀚为会长，由日本所派的一个叫桥川时雄的秘书管理具体工作，邀请名流学者担任写作。被邀者都必须是专家，旧文人要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新人物要有讲师以上的学衔。尚节之先生是进士，又是易学专家，所以请了他。之六是尚先生的高足，学问不成问题，但因没有学衔，开初只能替尚先生代笔；当上讲师以后，桥川也请了他。当时，备修的提要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图书馆供给，作者另有也可，每篇300字以上，修毕每篇给稿费5元，相当于大学一节课的报酬，算是比较优厚的待遇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之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是多读了不少书，特别是写了不少《周易》提要，使他在关于《周易》的学问上由广博至于精深。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学群书平议》就是当时的成果，我认为这部书是之六的不朽之作。

在中大的第三年，我的“陶、谢诗”一门课停了，又开了一门“作诗法”。适此时赵憩之（印堂）离开中大，他开的“文学概论”一课由中大研究国学的先生接任不大方便（这门课以日本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为蓝本，内容大部份是西洋文学理论）；而我是赵先生在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又会日文，赵就推荐我接他的课。以同时开了三

门课(共7小时),就被提升为副教授了。这年下学期,又接任了燕京大学第二外语7小时,就将“作诗法”让出,请之六教(“作诗法”虽然也是选修课,但每年都开,比较稳定)。孙蜀臣总觉得赵先生开的“文学概论”是个“洋玩意儿”,与国学格格不入,和我商量,改以《文心雕龙》代替。其时我在三校共有十几个小时的课了,而开《文心雕龙》要重新备课,就建议请之六来开,自己另开“金石学”。这样,之六也有了三门课,但当时的习惯,专任教师(教授、副教授)三门课要有一门是必修课,“文学概论”是必修课,而《文心雕龙》是选修,与例不符,之六的副教授也没提升,我深感惋惜。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也对中国正式宣战,“庚款”当年就不再退还了,“东方四库提要”的事情也就结束了,作提要的人的收入也就断了。

一天,我在中大上课,之六来了,手上没有拿教本,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要走了,今天是特意来和你告别的。”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没办法了,要回福建去。杜悦鸣来信说福州有一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他们要请教授,可以去,我决定回去了。”(杜悦鸣名琨,也是中大毕业的福建人,和之六是同乡同学,我初到中大那年,杜也在国学系教诗,后来没有再见)我说:“也好,现在燕京垮了,东方没了,西山薇蕨已经精光,你还有家可归,至不济还可躬耕南亩,我一大家人怎么办?”他说:“你还有辅仁大学呢。”我说:“谁知道辅仁能维持到哪一天!”相与叹息,就把他送出半翠堂,走到竹林边,之六说:“到此为止吧,我还要到宿舍和几个同学告别。”我和他握了握手,目送他到前边院内,此后近10年未通消息,直到1950年,我来到福建师范学院,才又见到。

之六先生道德文章彪炳乡里,有口皆碑,用不着我再辞费,但我们这一段城曲同作布衣似的交往,同时的人多数已做了古人,还是值得忆念的。前几年,他的《六庵诗选》出版,我为他题词,起句就是“城曲曾同作布衣,如磐风雨一鞭归”,盖纪实也。

之六先生还有一件事，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多。就是北京宋哲元开始抗战时，他曾投笔从戎，在赵登禹师长麾下抗日，虽然不过一天，赵军溃败，赵将军为国牺牲，之六却是曾持干戈，以卫社稷。另有一件事，虽与之六无直接关系，也值得澄清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作为国民党党团盘踞的学校首先被解散，之六出身于该校，毕业后又在那里工作了几年，不知情的人将如何看法？其实，中国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性质，在解放前夕，确是国民党党团的据点；但当初开办时是革命的学校，为孙中山所手立。此后至抗战之前，在一个长时间里，都一直有进步青年和具有进步思想乃至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士在校中学习或任教，如刘佩元、吴承仕、齐燕铭等人，都曾担任该校教授，向青年灌输进步思想。原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孤梅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学生之一。我第一天到中大上课时坐在窗边的那位学生，也是个搞革命工作的青年（他名叫陶枕秋，可惜没看到解放，就在家乡病逝了）。虽然教师与学生中情况不免有些复杂，但总的来说还是倾向进步的。抗战爆发后，一些虽留在敌占区但不愿与敌伪同流合污的爱国人士把该校作为隐蔽之所，往往在里边担任两小时的课，用以拒绝日伪。如北洋政府袁世凯时期的法制局局长方兆鳌先生退休家居多年（时已60余岁），为了避开他在伪政府中的熟人以免被请“出山”，也来校担任两小时的大一国文课。一时，留在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校的知名教授纷纷在中大担任一名名替教授或讲师，以为挡箭牌，所以当时开的选修课可谓百花齐放，几如20至30年代的北京大学。后期，邓以蜚、张子高、王之相来校分任文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他们都是一流的教授。中大不像辅仁、燕京那样，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做后台，而只靠校长何其巩的人事关系以应付取容。当时的私立学校，哪怕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都要请日本教授，辅仁请了天主教神父细井次郎子爵，燕京请了有名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为教授，独独中大没有。原来，校方对日本人说，我校离任教务长

方宗鏊的夫人、日文教师方政英女士是日本人，在校任教已30年了，既已有之，“何必再请”，就这样挡了回去。更奇怪的是，北平和南京伪政府的一些要员及其他大小汉奸，不将自己的子女送往伪院校，而送来中大读书；中大把学生的毕业证书送往重庆的教育部盖印，他们也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陈诚、陈立夫曾来北京，特别发帖邀请未在日伪学校工作而入燕京、中大、辅仁三校任教的100多位教授开座谈会。抗战胜利后，原校长王正廷利用陈雪屏的三青团进入中大，从何其巩手中将中大夺回，造成王、何之争。接着，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又和三青团争中大，两派甚至在课堂上动刀。此时一些名教授都离校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我们这些不愿蹚浑水的人也都退出中大，中大从此沦为国民党党团学校。之六是1938年8月至1941年11月在中大任教的，此时期以外的事皆未与闻，当然既未见到国民党党团的争校，也未参加上述的那个座谈会。

北平沦陷期间，我们这些“城曲布衣”的处境是很艰难的，日本人瞪着两眼看着你，不论上什么课，课堂上都有日本学生（实际上是特务）。讲新闻学的蓝公武先生曾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了一年（从宪兵队放出后，由西山的地下党同志接到解放区），校长何其巩也曾被抓。到了后期所谓“大检举”的时候更是人人自危，原在教员休息室时时能见到的人见不着了，而且往往是一去不返；有的过几日才见到，估计是被宪兵队抓过，但不敢问，放出的人也不说，彼此心照不宣。因此在那几年，之六和我这么熟，也从未到我家来过一回，我也未去过他所住的学校。我与他都是搞中国古代东西的，课堂上闲话不说，所以总算未进过宪兵队（当时晚上一听门口汽车响就不由心跳，回想起来真不寒而栗）。

1993年元月

刘蕙孙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雪泥鸿爪忆往年

——小记与之六老友共处时的生活片断

徐 君 藩

之六老友书赠的同客仙游诗三首，镶在玻璃框里，几年来一直高挂在我家客厅或书房的壁上。在不时吟诵中，常常勾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虽说“往事如烟”，但与之六兄共处时的某些生活片断，仍不时冲破将近半个世纪的烟霭，闪烁在脑海中；在他逝世后，还伴随着哀伤的波涛。谨作这篇小记，权当一瓣心香，以纪念老友逝世两周年。

自 1941 年至 1990 年，我们在学校中共事了 49 个春秋（只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放牧”到不同的地方，才分开了两年左右）。所以《六庵诗选》中涉及的人和事，我多耳熟能详，读来特别亲切。

1938 年 5 月厦门沦入日寇魔掌，不久省会迁至永安。1941 年 8 月，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师专）创立于永安。首任校长唐守谦非常重视延揽优秀教师；加之，当时东南战局日趋紧张，省外许多专家教授撤来永安，从本省沿海疏散至内地的教坛耆宿亦荟萃于此，为选聘教师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故在建校初期即能组成一支能适应各科教学需要的比较精干的师资队伍。之六兄亦于此时间关南旋，来校执教。我应调协助筹办该校，后并从事教学。我们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共事。

师专座落在邻近下吉山的一个名为霞岭的偏僻小山村里，离县城约7公里，因没有水陆交通工具，在学校与县城间，往返得靠步行。校址在山岭紧紧包围中，幸有一湾清流，恰由村前经过，上面架一道由十几只小木船编成的浮桥，给单调的山村环境增添了几分秀气。可是，浮桥、流水并没有进入之六兄的诗境，对他更具吸引力的当推下吉山。原来下吉山是名酒“吉山老”的产地，而他嗜酒好饮，也很善饮，当时曾吟哦“沽来斗酒价十千，一醉如泥莫计钱”（见《六庵诗选》，下引诗句同），在沽酒上占了不少“近水楼台”的便宜。直到40年后，他路过永安时还在“寒忆吉山鸡老酒”呢。

1942年5月，师专迁校南平沙溪之滨的水南后壑村，离市区约4、5公里。校址虽仍在小山窝里，但交通较为利便，出校数十步即到溪边，乘学校所备交通小木船，可来往于学校与市区间。校址比在永安下岭稍为宽敞一些。可是校舍和在霞岭时一样简陋，几乎全是木结构，连外墙也用木板钉成，板隙透风，夏热冬凉。宿舍未装电灯，教师只好在昏黄的油灯下工作。山区“山岚瘴气”凝重，疟疾流行，师生无一幸免。之六兄有诗道：“二竖交相侵，恶疟不能已，揽镜照容颜，憔悴失人理，自嗟年方壮，衰颓已如此。”他给我们留下的，确是地道的一介文弱书生的形象，同他的“衰年貌转丰”的照人风采相比，许多老友一致认为判若两人。

当时政府贪污腐败，物价高涨（确如之六兄所作描述：“观政祗货财，用人随好恶。万钱市片肉，千钱买一芋”），而公教人员工资又十分菲薄，以致在霞岭时，师专教职工三餐佐饭不外芥菜、黄豆，黄豆、芥菜，至迁到后壑村后才得以每个月吃上半斤肉。之六兄虽由大城市南来且置身于小山村，但对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的艰苦毫不介意，一到霞岭村，立即孜孜矻矻地挑起了古典文学的教学重担。自此他以高亢的声调、清晰的普通话和生动的表述，以及精辟细致的讲解、丰富的旁征博引，领尽八闽教坛数十年风骚。

之六兄友情醇厚，不论对旧友还是新交无不如此。这在各个时

期许多吟稿的字里行间磅礴涌现，熏人欲醉，在日常交往中也感人至深，数十年如一日。之六兄与吴谿（菲之）、包树棠（笠山）以志趣投合而倾盖相交、谊结金兰一事，尤传为“士林佳话”。吴，浙江浦江人，当时已是国画名家，又工诗和书法；包，本省内杭人，古典文学造诣深厚，长于诗词古文。他们3人在教师楼上比邻而居，时常品文评画，把盏联吟。此情此景直使之六兄“白头重过，感而有作”（指“剑水忧思三友情，……”一诗）。

《六庵诗选》中《南旋集》所收，就是在永安和南平时的诗作。

1944年秋季，国立海疆学校成立。翌年1月，之六兄偕我应聘前去任教。校址初在仙游县城的金石山下，各方面条件都比在师专时好得多。每当炎夏月夜，我和之六兄等常各挟草席一领，携清茶一壶，登上山巅，仰卧草坡上，沐于清风之中和明月、星斗的清辉之下，一边享受大自然美景所带来的欢悦，一边高谈阔论，从抗战形势、教学问题到仙游风物，无所不谈，直到深夜才尽兴归寝。我们还经常出北门散步（学校即在北门边），之六兄《新月同君藩城外闲行》一诗写到的踏月闲行所见的林深鸟寂、废苑奇石、春潭绮波等景象，至今历历犹在眼前。仙游风光旖旎，名胜古迹特别多，之六兄游兴极浓，几乎踏遍诸胜地，我常奉陪。他酷爱祖国自然风光，后来历访许多名山古川，“千岩万壑留踪迹”，直到晚年仍不肯停步。

一学期后学校即迁到南安九都。九都是个较大的乡镇，一座相当考究的三层洋楼（一个前地方军阀的别墅）被用作教师宿舍。这时“包公”也来了——包树棠老友脸盘宽阔，肤色微黑，为人正直，老朋友常称他为“包公”（亦含尊崇意味）——“燕水延津又海疆”，老友又聚首共事了。那几年我们都是单身住校，同住一楼，朝夕相见，在九都宿舍门口的三人合影，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影集中。翻阅之余，想到三友中已失其二，唯我独存，不禁黯然神伤。

《六庵诗选》中《海疆集》所收，就是他旅居仙游和南安时的作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次年师专迁往福州，之六兄和我偕回师专工作。师专校址在乌石山上，在这里，我们度过了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最后3年。福州解放前夕，之六兄曾挺身而出，反对师专当局拟向上级开列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名单。霞浦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张某曾约晤他，告以他所赏识的学生叶挺荃等是“异党”嫌疑分子，“必须与他们断绝关系，方可免受株连”，云云。他毅然回答：我自有评价学生的标准，只要我认为品学兼优者，不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我一律看作好学生；反之，我也一律看作不好的学生。奇怪的是，凡是我认为好学生者，你们都指为共党分子，为何好学生都被共产党拉去呢？张某气急败坏地咆哮道，“你我无共同语言，但愿以后不要追悔”，说罢拂袖而去。在关键时刻，之六兄仗义执言，正气浩然。即在平时，他也从不隐讳己见，对人对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平则鸣，这也是他数十年一贯的作风。

1949年8月福州解放，次年9月师专扩建为福建师范学院，校址仍在乌石山。福建的高等师范教育史掀开新的一页，之六兄的生活史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诗选》中没有“乌山”专集，1947——1949年的几首编在《海疆集》中，1951年的几首编在《朝阳集》中。

1952年秋季，福建师范学院并入福州大学，次年福州大学又改为福建师范学院，校址都在仓前山。《诗选》中的《朝阳集》是他迁居仓山区（“文革”时曾改称朝阳区）后1951——1966年诗作的结集。

1970年学校被撤销，之六兄被下放闽东两年半，《山居集》便是这时生活和情感的写照。

1972年福建师范学院恢复（改校名为福建师范大学），之六兄和我被调回，我们又继续共事了。《诗选》中最后两集，均以寓所命名。《华香园集》为1972——1980年住在施埔路师大华香园新村时所作，《华庐集》（1981——1983年）则为寓居对湖路华庐宿舍时的

作品。可惜1983年以后的诗作没有结集在内,希望《诗选》再版时,将新编的《意园集》殿后(对湖马厂街意园新村是作者最后起居之所),以完全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潮流汹涌澎湃,之六兄个人抱负的舒展和事业的成就,也都“更上一层楼”,进入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境界。他曾吟哦“人生难得老来红”,而他自己却在“难得”中得之!这时期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我认为最好借用他的诗句来刻画:“秋田经雨禾添实,老树当风叶有声。”

不幸在这金色的丰收季节,之六兄竟受到癌病的袭击,出人意料地匆匆走了。在我们之间,数十年的亲切交往曾经形成一个稳固而圆满的友谊的“完形”。他这一走,在我的心理空间似乎引发了一阵大雪崩、一片大塌方,把友谊的“完形”砸得支离破碎,留下无限的失落感。心理失去平衡,也引致生理的不平衡,在恭送老友遗体进火葬场的次日,我的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旧疾复发,又进省立医院住院去了。至于他这一走,八闽教坛顿失仪型,学术领域痛折栋梁,损失之大更不用说了,呜呼哀哉!

之六老友离开我们不觉已经两周年了,他留下那壮实的累累嘉禾,将在人间千古飘香;他那迎风迸发铿锵的金玉之声,也将永远在我们耳畔回响。之六老友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992年8月

徐君藩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文章道德 千古常青

——纪念之六教授逝世三周年

高 时 良

“斯图我记为题诗，分赠群贤共护持，今入高斋悬素壁，故人老树尽新姿。”这是5年前之六兄为已故画家吴忠翰教授赠我古榕图的题诗。以往，我总是经常更换悬在壁上的字画，唯独这一幅古榕图，始终未曾换下来，仿佛欲从故人硕彦的丹青翰墨中得瞻仪容。

我与之六兄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山城永安。那时他执教于暂设在霞岭的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我在内迁下吉山的省教育厅担任编辑研究工作。当时，在下吉山和霞岭之间来往无交通工具可利用，我到之六兄那儿或是他来访我，都得步行半个多钟头。一路之上，浮桥、流水、人家，翠竹、艳阳、芳草，景物十分宜人；加之访友情殷，且在探求学问与人生之真谛方面，彼此有共通之处，故亦忘路之远近。

我在大学时期，念的是教育专业，副系历史，二者的结合，使我对教育史特感兴趣。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之六兄对儒学早有很深造诣，可惜执经问难不久，1942年5月，他便随师专迁往南平，从此音问鲜通。直到1952年才得重聚。是年因院系调整，福建师范学院（原师专改）并入福州大学，我由省研究院转过来，虽不同系，却有了面聆指教的机会。

我小时候在私塾念“四书”、“五经”，只是鹦鹉学舌。进入福州大学后，由于教育史教学和科研的需要，重温旧读，对“四书”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但对“五经”，尤其是《周易》，却仍感生疏，也难理解，常以它对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相关系数不大而作自我摆脱。我曾同之六兄谈论《易传》是否孔子所作的问题。1989年他赠我一篇为参加于曲阜举行的孔子讨论会而作的论文《从〈易传〉看孔子教育思想》，文章以有力的笔触、详实的论据，揭示了《易传》同孔子思想的关系，并从《易传》分析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无征不信，这对我与与我同观点的人都有说服力。《周易》具有玄奥的哲理，我钦佩之六兄有高度的思维能力和惊人的智慧。他的《易》学研究成就，不但在国内颇具影响（像与张善文先生合著的《周易译注》，在出书极为困难的今天，竟能在半年内连续再版3次，实属不易），而且在国外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只是有些人至今还把有关《易》学的科学研究著作看作是占卜和堪舆的工具书。1990年他应邀赴美讲学时，便遇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今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在发展，传统文化研究也在发展。我曾同之六兄谈起《周易》的辩证法和自然哲学的现实意义，像17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自称他创二进制时，曾受到《周易》八卦的启迪。相传他还将所写的论文连同按二进制研制而成的乘法计算机的复制品赠给清康熙皇帝。我为这个历史事实所吸引，同之六兄见面时，总爱谈论这个问题。《周易》与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它之成为当代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气功师等共同感兴趣的热门学问，表明它之于现实生活，并非南辕北辙。遗憾的是，这位一代《易》学权威过早离开了我们，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自己却“壮志未酬”——未能利用时下所提供的新的研究条件，以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如新近考古发现双古堆汉简《周易》，来不及让他过目）；继承者的事业及其成就，他更无从得知。如此，只好用人们常说的“含笑九泉”来安慰离开了人世的人。

吴检斋先生是近代的国学大师，之六兄是他的入室弟子。吴先生作为徽州学派的继承者，其主要学术成就在经学，其次为史学。他先后执教于北大、北师大、中国大学等校，较长时间从事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过有关教育的文章，也应是一代教育家。我曾告诉之六兄，我准备整理吴先生的教育遗产，请他提供书刊所未曾发表的鲜为人知的资料，他表示“倾囊相助”。而我这几年因忙于其它研究课题，再则以为近水楼台且来日方长，于收集资料一事不免“何遑”起来，万想不到他去也匆匆——机会失于一念之间，终究不能完成夙愿。

之六兄为人忠贞鲠直，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针砭时弊；对朋友的过失或不足之处，也直言不讳，坦诚以告。1989年本省评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主办单位将我的《学记评注》一书送他审查，他见着我说：“这本书火药味很浓！”这是事实。犹忆《评注》完稿时，正当“文革”结束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就要我消除原稿中“文革”的（尤其是“批孔”）的痕迹。《评注》行世后，我又意识到书中“阶级斗争为纲”的硝烟未尽，之六兄正是针对这个缺点而发。我后来对他说“《评注》有日再版，当力图使其成为‘无核区’”，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之六兄生活上自奉俭朴，淡泊明志，非己之财，一介不取。1988年北师大为他出版旧著《周易群书平议》，其中有两老为之序跋：一为丁超五先生，另一为陈遵统先生。他们早已作古。之六兄认为稿酬中有他们的一份，要我提供两老后代住处。其尊重别人的劳动，是如此的认真。

我同之六兄同年同月同日生，他的为学做人都远远走在我的前面。他像一支点燃的蜡烛，始终照亮着别人——对朋友（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的委托，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办，总以成人之美为旨，无私地予人以帮助。数十年如一日，他在文化、教育的园地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从来不曾考虑到体力和脑力的超负荷会给自己的健

康造成什么后果。最后，终于被那杀伤力最大的病魔推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就这样一去不复回来了。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的事业与成就千古常青！

1993 年 1 月

高时良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黄寿祺教授遗事纪略

陈 祥 耀

我与黄寿祺教授是1945年在泉州相识的。解放后我们在福建师范大学共事30多年，70年代后，外出开会常同住一个房间，80年代同住在师大意园宿舍大院中，接触很多。他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萦绕我的心目，时常恍惚他还活着，还在我邻近的宿舍中认真地工作着。他从教50多年，著作丰富，是一代的学者和师表，可记的事情很多。他的生平经历及主要学术成就，已有其他同志的记述文章在，我这里只简要地记他的一些遗事，以表示对这位敦厚的学者、长者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

—

吴承仕，字检斋，安徽歙县人，与黄侃（字季刚）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最著名的入室弟子，有“南黄北吴”之称。黄、吴皆精通“四部”之学，尤以经、子、音韵、文字之学为孤诣。吴先生《三礼》之学的成就，超越清儒，一代无匹。黄先生下笔矜持，留下著作较少；吴先生则撰述甚勤，生前除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刊印《经典释名疏证》、《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辨证》、《三礼名物》等十多部专著外，身后还留有大量的讲义、讲稿和“读书札记”未经整理和编集、刊印。

1929年，黄寿祺教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的预科，1931年，升入

本科国学系。那时候，吴承仕先生正是国学系的系主任。黄先生的勤奋精神和学术、文章的造就，受到吴先生的赏识，师生关系密切。吴先生曾把黄先生的文章，介绍在《文艺捃华》、《中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吴先生以感黄先生在校时经济困难，就把人家托他写的一些应酬文字如寿诗、寿序之类，交由黄先生代写，把收到的润笔金给他交学费和做生活费用。吴先生对黄先生的赏识、信任与爱护，于此可见一斑。

吴先生逝世后，他在北平的弟子虽很多，但他的朋友、学生和家属都认为，对其学术有较全面的认识、对其遗著能认真地加以梳理的，非黄先生莫属。吴先生的儿媳周同德乃将吴先生已刊、未刊的著作，和一大包“读书札记”等手稿，交由黄先生整理。

黄先生不负师谊和众望，仔细阅读吴先生的原著及手稿，编成目录及提要共47种，并亲自抄成4份。黄先生说：“记得当时共整理出47种，每种均写了简明的提要，合称为《先师歛吴先生之著述》。原文分抄4本：一交周同德，一交孙人和先生，一为商鸿逵先生索去，自存一稿。今孙先生已逝，同德不知何往，商先生的一本，云转交中法大学学报编辑部，亦找不到，我自己的一本，南旋时已散失。究竟47种都是何书，我已不能完全记忆。吴先生原稿南旋时悉送还同德，今亦不知存亡。”

吴先生的著作及手稿，身后多所散失和蛀蚀，整理困难。他生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文革”后，北师大组织人力整理其部分著作交中华书局、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但以感到阅读遗稿之困难，乃邀请黄先生前去协助。黄先生以已逾古稀的高年，带领两个助手到北师大，阅读、校理吴先生的遗著、手稿，多方检阅有关文献，辛勤、紧张地工作半年，就可以搜集到的吴先生的著作，整理了一份目录，指出其出处，计49种；并指导其助手张善文、王筱婧二同志，校点吴先生的《检斋读书提要》、《白狼慕汉歌诗本语略释》、《丁丁集》（此集还加注）等著作。在这个基础上，黄先生

写了《略述先师吴检斋先生之学术成就》一文，刊于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3 年第 1 期）中，全面论述吴先生的学术成就，具有很深博的识见；又将吴先生的全部著作作分类列举，有的并作提要 and 提出处理意见，花了极大的精力。黄先生无愧是吴先生的学术知己和情谊极深的高第弟子。

二

行唐尚秉和，字节之。所著《辛壬春秋》，记述辛亥革命史事，系为黄花岗起义烈士所写的传文集，其中的一些传文解放前被选入中学《国文》课本，流传颇广。他是《易》学专家，著有《周易尚氏学》、《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周易古筮考》、《左传国语易象释》、《易说评议》、《学易偶得录》、《周易导略论》、《时训考》、《卦气考》、《太玄筮法正误》等十余种，都是专家特派之学，但少为世人知悉和理解。

黄寿祺先生在治《易》方面，承受家学，夙有根底。他入中国大学读书时，尚秉和先生正在系里教授《周易》，师生相遇，知爱莫逆。黄先生于尚先生往来最密，受益最多，故入中大后《易经》之学大进，并确定以此为终生治学重点。在中大读书时，即协助尚先生撰写《焦氏易詁》、《左传国语易象释》等书，《易詁》付印时，黄先生并为撰写序文。师弟之间，不但有授受的渊源，且有切磋的乐趣，黄先生在《晨报》上发表《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义书》三通，尚先生不以为忤，且作答书，并刊于中大学报上。

黄先生在北平，博览《四库全书》所收的及未收的前人《易》学著作，自 1938 年起，即为《四库》未收的《易》学书籍写《提要》。后来《民国续修四库全书》的编辑部门，约请吴承仕、尚秉和两先生为《全书》所收的《易经》、《礼经》中的有关书籍写提要，黄先生也同时应约写《易》、《礼》书的提要。当时应邀写提要的，都是著名的老师

宿儒，黄先生在撰稿人中是最年轻的，可见其《易》、《礼》之学，早具深厚根底，受人重视。黄先生所写《易》籍提要，有一部分是自己应约写的，署自己的姓名；有一部分是代尚秉和先生写的，署尚先生的名。后来先生編集所写提要，共7卷134篇，名为《易学群书平议》。其中代尚先生所写、曾署尚先生之名的，尚先生要黄先生收回为已作，并为《平议》写序（今后，《民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若获出版，书中凡已收入《平议》中的文章——虽署尚先生之名，乃是黄先生的作品）。此事黄先生曾亲口告我，但他在出版《平议》时并未作说明。我既知此事，在黄先生身后，应为郑重言之，以免后人产生疑异。

尚先生又擅诗画，黄先生诗集中忆念尚先生以及和尚先生唱酬的诗作很多。尚先生曾画《庐山图》为赠，黄先生也赋长歌以谢。

三

霸县高步瀛，字阆仙，是晚清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的弟子，知名的学者和文章家。他著作丰富，已刊的有《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文选李注义疏》等书；中华书局将为整理刊印的，尚有《古文辞类纂笺证》、《魏晋南北朝文举要》等书。

黄先生进中国大学时，高步瀛先生正在国学系里担任《史记》、《文选学》、《散文源流》等科的教学工作。黄先生的学术造诣，同样受到高先生的赏识。

高先生的《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两书，以选材精粹、注释详审有据，为学术界所推重。但这两部书的注释，并非完全由高先生亲手写定；他经常把要引用的书籍检出，在纸条上写明要引用哪页哪条的材料，把它夹在书中，再用指甲划出要引用材料的起迄之处，交由黄先生代为抄写归注。以划痕非由笔出，不易辨认，故判定何为高先生所指并据此使所摘集的材料都能正确无误地归附本文，非学有根底即无法做到。高先生请黄先生帮写注释，用这个方

法，可谓大得其人，大省精力。他见黄先生当时经济困难，请他做这件事，也意在藉此给黄先生以一些经济报酬，帮助他解决困难。这事也是黄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士林嘉话，应为记留。

黄先生对高先生感情极深。高先生 1940 年逝世，1947 年黄先生有挽章《先师高闾仙先生纪念诗》云：“道丧文章敝，潜然念国工。才高兼众体，学博破群蒙。注选能精熟，抱经守固穷。定知有遗恨，不见九州同。”缅怀高先生的博学，惋惜他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和我们谈起高先生，还表露出无限的敬思和哀情。

黄先生教授古典文学，以引证材料丰富，对作品意境的投入，对吟诵作品的重视，受到学生的欢迎。其讲词尤具吸引力，他曾告诉我，他讲词受到孙人和先生的教益很大。孙先生字蜀丞，既精经子之学（治《韩非子》尤有名），又擅长诗词，当时在中国大学教授《词学通论》、《词选》、《国学书目》等科，教词时很注重吟诵。黄先生亲炙多时，故能得其精功而发扬之。

四

黄先生的诗学、诗功，已见于所刊《六庵诗选》，俞元桂先生（署名桂堂）的《老树当风叶有声——记黄寿祺教授》和拙作《六庵诗选序》、《当代诗词点评》中就黄先生诗所作的点评，对此已有所论及，不再重复。有一点应该补充，即黄先生诗才甚捷：如《诗选》中《交心会议坐上初见展怀（按，即郭虚中先生）白发即席有作》云：“剑浦记初晤，榕城瞬十秋。一见垂青眼，相看渐白头。事同春意闹，闲忆少年游。何日交心罢，西湖共泛舟。”信手即兴之作，而意境甚佳。又记 60 年代初期，一次教研组会议上，偶然谈论王安石、司马光代表的阶级性问题，我不同意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司马光代表大地主的说法，与时论相背，有遭受批判的危险。黄先生闻而有感，片刻后即在火柴盒上写一首绝句，偷偷拿给我看，诗云“祥耀先生最吉祥，有时持论亦刚强。温公代表大地主，众说纷纷我再详。”虽是一时

游戏之作，也曲而能达，足见其思路的敏捷。

先生晚年，虽近视颇深，耳朵有些重听，但神志极清，记忆力仍极强。对所读的书，人有询问，仍能原原本本记诵以告；对多年前的事，也能清楚复述。他工作常至深夜，晚年夜里事毕、客散之后，仍坚持写日记。精神很好，工作很繁，不异少年人。这既要归本于天赋的聪强；也由于先生睡眠情况很好，倚枕即能入睡，不会患失眠——人们所谓能善于休息，才能善于工作者即此。

先生极富克己待人的精神。他自奉甚俭，生活清苦，却经常以其有限的收入，源源接济亲友。他经常抛置自己的写作，腾出宝贵的时间，为朋友、学生仔细审阅、批改书稿，解答疑问。

先生解放前多用文言文写作，解放后才多写白话文。写文言文，守桐城派的义法，力求有物有则，归于雅洁；又兼学殖深广，落笔时自有词藻涌赴，故出以自然，毫无费力做作之感，而渊懿闲雅可喜。晚年的文言文、白话文，能率意存真，故我挽他的诗，有“文守方姚到率真”之句。

1992年8月

陈祥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忆 之 六 先 生

蔡 厚 示

我初次拜识先生，是在1956年。那年秋天，福建师范学院举办首届科学讨论会，我随厦大代表团参加了讨论会。先生当时任师院中文系主任。由于郑海夫师早就告诉过我：黄之六先生为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之高弟，治学严谨，为人谦和；因此当我拜识先生之后，即以师礼待之。先生待我奖掖有加，爱护我几无微不至，积30余年如一日。兹举数事，以见一斑。

1961年，我刚从厦大养猪场奉调回系工作，便接到省汉语方言调查领导小组通知，要我往厦门鹭江大厦参加领导小组会议。当时我真不禁哑然苦笑。心想：自1958年后，我被打入另册，什么职务都被撤光了，怎么居然还留下这么个非我所长的职务挂着？原来，在1956年底，之六先生奉命组织省汉语方言调查领导小组，我当时曾以厦大中文系秘书的身份参加。如今系秘书早就不当了，连原先的许多熟人都想着法子回避我，而在这时候，之六先生竟还记起我，特地指名要我参加这个领导小组会。记得先生当时笑着对我说道：“《易》有言：‘君子终日乾乾。’你犯不上碰破了一块皮便消沉下去。”这句话，我受用了一辈子。后读到先生赐寄的《赴厦车中作二首》，更深受启迪。

十年浩劫，先生饱受磨难。当1973年秋我路过福州晋谒先生于华香园时，先生才从周宁茶广村下放归来不久。在先生坚留为我

洗尘的晚宴席上，我把《再游武夷》一诗呈请先生指教。先生读后，竟特别称赞其颌联两句：“壁立千峰纷上仰，萦回九曲竞东流。”先生慨叹地说：“我下放期间也写过两句诗：‘心能旷达宜身健，诗入精微与道通。’如今我这辈人渐渐老啦，振兴中华诗国的重任该落到你们青年人肩上了。”

先生少时即以诗鸣。晚年有《六庵诗选》行世。但先生常谦称诗非所长，而以“经生”自期。1979年秋，先生光临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我曾多次陪同先生参观、游览。当先生每一诗成，必不耻下问，且从善如流。遇到一些我读不甚懂的典故，必详详细细地为我讲解，使我获益匪浅。此前数月，先生《江西湖南之行吟稿》印成，我获读后曾呈奉先生一绝云：“横穿湘赣风雷地，新铸情文壮丽辞。四十一篇吟诵久，百年又见定庵诗。”谈到这事，先生由衷地说：“你把我比作龚定庵，我哪敢啊！”其实，先生的诗词早已饮誉于海内外，诚如喆庵先生所称，“辞非一体，才足兼工”（《六庵诗选》序）。先生却自谦若此，益使人钦慕不已。

1981年，我奉调来福州，得向先生请益的机会更多了。每当我拜谒先生时，先生总是娓娓不倦地教诲我如何做人和做学问。1988年，朋友们建议出《天风集》，要我整理《独柳居诗词》列入。我很无把握，深恐贻笑大方。为此，我把选好的100多首诗词恭请先生过目。先生乐不知疲地为我删改、润饰，使我避免了不少错误。此外还赠我一首七律：“蕉窗浑不觉春寒，展读新编到夜阑。绩学纵横怀远志，浩歌激烈见忠肝。君同逸鹤摩霄汉，我似闲鸥敛羽翰。何幸暮年相沆漭，骚坛酬唱有余欢。”先生奖掖后辈、为后辈甘作人梯的赤忱，从诗中就能清晰地看出来。

1988年6月，我有幸陪同先生参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会。会后驱车往大林谷谒朱子墓。先生在墓前虔诚顶礼，我也跟着先生向朱子墓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先生深有感慨地对我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不能数典忘祖呀！没有先贤创造的

古代灿烂文化，哪来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呢？”这使我记起了一件事：“四人帮”肆虐期间，先生曾拒写批孔的文章，对我说过：“孔夫子的书，我还不曾学好。我们当学生的，哪能倒过来打老师呢？学生能超过老师当然是好事，但学生决不该打老师。你我都当了大半辈子的教师，能不懂这个理么？”

虽然，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但每当想起先生在世时对我的殷殷教导，就总感到有一股强大的鞭策力量在促我不懈前行，教我虚心向上。

1992年9月

蔡厚示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放尽光芒吐尽丝”

——黄寿祺教授晚年光荣入党前后

李青藻 徐金凤

黄寿祺教授逝世至今已两年多了，我们时时怀念他。而每生怀念之情，必深感受到激励与鼓舞——为他那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奉献精神；为他那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思想品质，严谨细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黄老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道路，晚年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归宿，成了一名忠心耿耿、矢志为事业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1981年6月20日，黄寿祺同志以七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直至病逝的10年间，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仅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教授，而且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黄寿祺教授入党的那一年，李青藻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金凤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我们俩人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此，我们乐于把他入党前后的情况，撰文献诸读者面前。

—

黄寿祺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求学时代，他以坚韧不拔的毅

力,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发奋攻读钻研,终于苦学成才。他26岁时任大学讲师,27岁时升任教授。解放前,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致力培育人才;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时不刻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在1932年《不寐》一诗中云:“夜深不寐独徘徊,家国沉忧志未灰”,胸中跳动着一颗年轻而热烈的报国之心。1936年他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九军参谋处收集有关抗日的资料。时过半年之后,由于业师吴承仕等推荐,他才回到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解放前,他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极感忿恨,能洁身自好,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感慨良多。解放后,他不断自觉地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使他深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他热爱自己的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愿终于实现了。他努力实践着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宏伟志愿。

黄寿祺教授晚年入党不是偶然的,是他一生追求进步的必然政治归宿。解放前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屡次拒绝参加国民党和它的所谓民意机构如参议会等。他当时身在高校,受到了爱国进步学生运动的影响。在北京求学和工作期间,他深受吴承仕先生的教诲。吴承仕是我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解释经学的大师,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病逝。黄寿祺是他的高足,是他学术活动的重要助手之一,曾协助整理过他的部分手稿。黄老的为人品格和学术成就均深受吴承仕的影响;解放后得知吴承仕是共产党员之后,心中不由地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敬爱。1946年黄寿祺返榕在福建师专任教,他同情爱国的进步学生运动,同情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叶挺荃等人,曾坚决拒绝特务分子的威胁利诱,为保护进步学生尽心竭力。全国解放前夕,叶挺荃等不幸牺牲,黄老对他们始终十分敬佩和怀念。解

放后他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积极靠拢党组织，1958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文革”期间，黄老遭受严重迫害。他对林彪、“四人帮”深恶痛绝，但是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粉碎“四人帮”以后，1980年，重新送上入党申请书，1981年递上自传，同年七一前夕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之日，黄寿祺教授满怀深情地说：“我今年70岁，但我只是党的初生的婴儿。”同时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日献辞》中写道：“我已行年垂七十，何期能作党婴儿。但求永保童心在，绝假纯真志不移。”真诚地表达了他忠于党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婴儿是不能、也决不会离开母亲的，童心永保、绝假纯真，永远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黄老期望做“党婴”一事在教师中传为美谈。

二

黄寿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终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是和他坚持学习、研究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分不开的。他曾经说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进步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他的老师吴承仕先生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明证。他还说：“由于我长期从事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研究，封建传统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孝’的道德观念对我影响很深”，“后来，在党组织的教育和老红军干部陈荣辉同志等的帮助下，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有所提高”。

邓小平同志说过：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黄寿祺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优秀文化也一定要讲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和态度始终贯串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之中，晚年尤显自觉。

黄老在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使自己的思想上升到崭新的境界。通过学习党纲、党章和党的基本理论，他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见《入党申请书》）黄寿祺教授将他的思想认识付诸实际行动。不论是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真实思想，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党章》里说：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黄老在工作中执著追求、处处体现着这一精神。晚年他曾写道：“七十而今已不稀，九旬还可望期颐。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见《述怀》），形象地表达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心志。

黄老入党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他和助手于1981年10月发表的《“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一文，正是用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探讨了《周易》中“观物取象”这一艺术思维的美学问题，这标志着他的学术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84年3月，我国著名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央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出版吴老的遗著。在此之前，黄寿祺教授被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长达7个月，参加并指导吴承仕手稿的整理出版工作。在他完成任务返回福建师大后，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来函称：“对于吴老的这些遗著，包括许多未加整理的散乱手稿，黄寿祺同志一一检阅，按类分出，并逐一写出了校阅附记。在附记中，既概述了每一著作的中心内容，又尽力考订了它们的写作年代，这为进一步研究吴老学术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黄寿祺同志的辛勤劳动，现已分类整理出《经学通论》、《经典序录》和《国故概要》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三礼》类、《春秋》类、《读书提要笔记》类，以及《诗文集》

类等 13 种,近 200 万字;并和我校启功教授一起指导整理出《吴检斋文录》、《论衡校释》、《吴检斋读书提要》、《检斋读书记》、《检斋学术论文集》、《淮南旧注校理》等 6 本书”。来函末尾称赞道:“黄寿祺同志严谨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诚恳待人的品格,给我校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老晚年笔耕更勤,著述颇丰。从其主要撰述与编著中——不论是《楚辞全译》、《周易译注》、《论易学之门庭》、《周易研究论文集》,还是《六庵诗选》中所录的晚年的诗作——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从事著述的闪闪光辉。

三

黄寿祺教授入党后,作为省政协常委,他更重视与党内外人士的联系,更积极地参加政协组织的会议与活动,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出谋献策。

黄老入党时还在副校长任上,但他在党内,始终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组织生活,摆看法,谈认识,交流思想,平等待人,没有任何架子。尽管在党小组会上,从师生关系上讲,他是师长;从年龄上讲,他是最年长的党员,但他却自视为“党婴”。他把申请入党看得很神圣,一旦入党就很真诚、专一,他在《关于申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报告》中说:“1981 年 7 月 1 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今后我一定向无数优秀的老、中、青共产党员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虽然年迈体衰,仍要努力工作”。“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这诗句正是他的真实写照。黄老经常用共产党员的条件对照检查自己,履行党员的义务,同时自觉地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比如,1981 年毕业生分配前夕,他向校党委表示不要特别照顾他的儿子、不必将其留校——尽管他年老体弱,只有这么一个爱子在身边。当时作为副校长,他的这个模范行动确实是产生了很好的影

响。黄老入党后按时交党费,在所在党支部内是众所共知的,有时他还亲自上门将党费交给组织委员,有时因外出开会,便托亲属代交,从不拖拉。1990年2、3月间,他应邀访问美国,用深奥的易学哲理解释现代科学,引起美国科技界专家、学者的兴趣,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完成赴美讲学任务后,如期回国。令人感动的是,这年6月间,他在病榻上参加了“党员登记”,他写道:“我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我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去年春夏之交的风波中,立场坚定,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自1981年入党以来,能在校、系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我现在虽年迈体弱,仍愿意为党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他对党所说的最后的话。一个月过后,黄寿祺教授即在福建省立医院与世长辞了。总之,黄老入党后,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执著地实践着入党誓词。福建师范大学在追悼大会上称他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学生撰文称赞“你是我们的恩师,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永存在后学的心间。”(见石中坚《共产党人的形象》)我们想,这些赞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1992年8月

李青藻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校长; 徐金凤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的怀念

郑松生

50年代初,我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念书时,受过黄寿祺师的直接教诲,他先后教过我所在年级的《历代文选》和《中国文学史》两门课。那时,我年纪小,但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兴趣。黄寿祺师上课时,我总是认真地听,感到他和蔼可亲,学问渊博。他讲课时声调抑扬,很有感情,很生动,而且引经据典,材料丰富,见解深透,对我来说,实在受益不浅。特别是,他每次讲课时所流露出的、希望他所讲的一切都能为我们不折不扣地接受的那种神情,更使我感动。

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继续学习,接着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辗转3年,又回到母校任教;从此,我与黄寿祺师共事了30多年。我逐渐地了解了黄寿祺师的为人:宽厚坦诚,毫无心计,克己俭朴,乐于助人。他要求进步,始终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祖国;他任中文系主任和副校长期间,对工作极端负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屡受“左”的冲击,心中有委屈,在“文革”中又受尽磨难,但他信念不移,一次又一次地挺了过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培养了几届研究生,并且在《周易》研究上矢志开拓,成果累累,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和黄寿祺师的宿舍同在意园新村,各住一幢楼内,两楼之间隔着一条宽宽的通道,往来须走上一段路。他退休后,我有空常去看他,入座后,他一边叫家里人递烟送茶,一边就高兴地谈开了,不

是谈他的易学研究，就是谈他怎样替向他求教的学子改稿这一类事。有时，他还拿出他刚写的诗稿，亲笔题上“松生老弟指正”几个字，要我给他提提意见。每次，我走出他家，他总要亲自送我到门口。遇到急事，必须马上找我，他往往不打电话，径自拄着手杖，步履艰难地走下他那幢楼的台阶，慢慢地穿过通道，来到我家。谈完话后，他却坚决不让我送他回去。

他赴美国讲学一回来，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去看他。这一次，他和我谈了很久（是历次谈话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谈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谈了1989年我国那场政治风波在美国的反应，还谈了美国的易学研究情况。他说：“我在美国讲学，不外访，只在住处呆着，不接待任何来历不明的人，不听任何煽风点火的话。也有人请我用《周易》卜卦算命，我是一口回绝的。”我相信他说的话。我注意到他脸色比过去苍白，精神不大好，便起身告退，并劝他：“黄老，您高龄了，长途旅行，看来很劳累，现在该好好休息啊！”过了7、8天，我再去看他，他已感身体不适，吃不下东西，可还想参加省政协会议。我有点担心，对他说：“请个假吧，黄老，您得去医院看一看。”想不到，他还是参加会议去了。这以后，他病发，住医院，终而离开了我们。

岁月匆匆。黄寿祺师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我似乎觉得他还活着。

1992年12月

郑松生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至诚至善的人

陈 钟 英

黄寿祺老师辞世已两年了。人们叹息着：这人世间又失去了一位大好人。好人不该这么早就去世啊！

我认识黄寿祺老师是在1953年秋天乌石山省立师范学院并入福州大学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助教，他已是一位中年名教授了。我虽无缘受业，但敬之以师礼。40年来，我们都在福建师大中文系工作，共同经历过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正如苏联文学家阿·托尔斯泰的名著《苦难的历程》题辞所说的：“我们在碱水中泡三次，在血水中浸三次……”80年代风和日丽的好光景也共同经历过，只可惜黄老走得太急了，看不到90年代的辉煌。

黄老是人们所敬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闻名海内外的易学专家。他秉性忠厚，待人以诚。他品格磊落，处事顶真。他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至诚至善的普通人。我想就我的记忆所及，谈几件有关黄老的“佚事趣闻”，从一滴水折射出广阔的海洋。

50年代中期，“向科学进军”号角吹响，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民主党派工作活跃。当时福建师院中文系民盟成员大多数是黄老的文朋诗友，如黄曾樾、钱履周、游叔有、俞元桂、郑庭椿、洪心衡诸先生。他们很希望黄老也加入民盟组织。可是他受“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无意参加。但他说他愿意做民盟的朋友。果然，他常常在系主任坐班之时为师院民盟中文系小组分发文件，传送开会通知，

认真负责，乐此不疲。他自称“盟友”，也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忠实的盟友。

“反右”斗争后接着来的是“交心”运动。黄老的著名诗句“何日交心罢，西湖共泛舟”脍炙人口，历久不衰。它不仅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对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厌倦心情，同时也反映了诗人自己坦荡磊落的胸怀。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泰山压顶，怎么想就怎么说了，这才是真正的“交心”！（但在后来的一连串运动中，他为此吃尽了苦头。这两行诗句屡被作为不满现实、抵制政治运动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对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一场绝后的考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反映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遭遇与心态。这一批“国宝”在逆境中仍然孜孜不倦，真诚感人。我想如果有人要写以黄寿祺老师为主人公的“牛棚小品”，一定也会十分生动感人的。

当时中文系的“牛鬼蛇神劳改队”是全院规模最大的“劳改队”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每日开往长安山上修路和清理学生宿舍四周围的垃圾泥沙。为了醒目，这“劳改队”的标志竟是七面木牌，白底黑字，一字一面。队伍出发时，必须单列行进并由其中7人负责举牌，好象一支蹩脚的龙灯队。一到工地，刚放下牌子，黄老就像到了系主任办公室一样，立刻埋头干起活来。不论是干什么活，筑路也好，扫地也好，他都特别认真卖力。那时节，大学生们都忙于造反去了，宿舍楼周围的垃圾扫不完除不尽，尤其是楼后面的小山坡垃圾特别多，杂草中、树枝上，果皮纸屑触目皆是，扫起来特别费劲。黄老挥舞着长长的竹耙，耐心地一下接一下地扒着，大有不把它们都给扒出来就誓不罢休之势，那严肃认真的神情，仿佛在向人表演他的书法。宿舍墙基四周水沟中淤积着泥沙，这是什么扫帚都无法扫得干净的。一天，黄老把家中炒菜的锅铲带来，蹲在沟前不停地操作着。有了这种新式“武器”，又有这样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

老书生蹲在沟前、每天挖沙不止，“劳改队”的工效大大提高了。黄老忠厚诚实、一丝不苟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1970年早春2月，经过清队整党之后的福建师范学院，开始了“斗、批、散”三部曲的第三部。“牛鬼蛇神劳改队”中的大部分人在做了“结论”后被戴上大红花，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了。黄寿祺老师被分配到周宁县咸村公社碧岩大队茶广村——他是闽东人，这多少还有点“照顾”吧！大约过了半年之后，下放闽东地区的干部们将黄老的两个突出表现传到福州来了。其一是他每次到公社开会，必定准时端坐前排，恭恭敬敬、一字不漏地用楷书做笔记。大教授的这种虚心学习的态度，颇令公社干部吃惊。其二是碧岩村的两个村民为一只兔子而争吵，告到了黄老面前。他劝解无效，便对这两个村民说：“你们不要吵了，我买一只兔子给你们。”一辈子读书、教书、著书的老学者，一旦碰到社会生活中这么具体实际的问题，肯定会手足无措的，更何况黄老这样一位忠厚长者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黄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他更加勤奋地治学，夜以继日地整理书稿，呕心沥血地培养研究生。在政治上他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并在古稀之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暑假我出差北京，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字楼招待所。那时，黄老住在该校小红楼别墅，正在整理他的业师吴承仕的著作。我一有空闲就到小红楼去看望他。是时黄老住在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两旁住着他的助手：精通古文、尤工诗词的王筱婧和矢志学易的张善文。每次我上楼时，只觉得一片寂静：师徒三人聚精会神伏案整理古籍，仿佛身居深山古刹，不闻人间烟火气味。正如黄老《小红楼纪事》所写的：“红楼万卷可藏身，遗迹尘不染尘。滴露研朱勤点校，太平庄里太平民。”他这时的心境是何等的宁静、超脱而自在！加上有两位难得的助手，所以在半年多时间内就取得累累硕果，载誉南归。（这说明为学术造诣深的老专家们创造优化的

生活环境和优异的工作条件,是多么的重要啊!)太平庄里小红楼,应该是黄老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吧?只可惜这段时间太短促了。

黄寿祺老师已永远离开他辛苦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坛、诗坛与文坛了。但他的学问、道德、文章,千古垂范,八方共仰。我以为向他学习,首先就是要以他为楷模,做一个至诚至善的人。

1992 年秋日

陈钟英 华南女子学院副院长,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良师虽逝 风范长存

刘 学 沛

我第一次见到黄寿祺教授，是在1961年10月上旬。当时，我与左云鹏同志从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离京前，历史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告诉我们，师院中文系主任黄寿祺教授是他的好朋友，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在教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向他请教。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云鹏和我带着熊老的介绍信到施埔寓所拜见了黄老。黄老正在伏案写作，看了熊老的信，非常亲切地询问了熊老和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情况。此后，我们凡是碰到历史教学或古文学习中的疑难，都免不了去打扰黄老。黄老对我们也总是有求必应，有些一时记不清的问题，还为我们查阅各种资料。30年来，黄老一直是诲人不倦的良师。

1974年，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福建成立了李贽著作注释组。全组有20多人，除专业工作者外，还有工人、解放军代表，都集中住在小柳村省委党校6号楼。黄老和我都参加了这一工作，黄老负责注释，我参加写作《前言》。因此，从1974年9月至1976年底，我有机会与黄老朝夕相处，无所不谈，对黄老的为人、治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当时注释组经常召开讨论会，就李贽思想的评价及注释中的各种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黄老总是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对各种意见（即使有的与自己的见解相反），都抱着欢迎的态度，尽量采纳其中所有的合理部分，表现了一位学者恢廓大度

的胸怀。

在重大的学术问题上，黄老是极为严肃的，决不轻率放弃自己费尽心力形成的学术观点。如，当时全国一片“批孔”声，“批孔”文章连篇累牍，对孔子全盘否定。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黄老从不曲意苟同，在讨论会上和个别交谈中，他始终坚持对孔子应一分为二：孔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如“克己复礼”和等级观念）是保守的、反动的，但作为他思想核心的“仁”的学说和他的教育理论，不仅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而且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当时许多文章把中庸之道说成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折衷主义，黄老认为这不符合孔子的本意。他指出，在孔子思想中，中庸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极高的境界，决不是什么调和、折衷。还有的文章为了拔高李贽的历史地位，把他的哲学思想说成是唯物主义的。黄老对李贽的进步的历史观、是非观和反道学的斗争精神，十分钦佩。同时，又根据他著作中大量存在的佛学思想等，认为他的世界观应属于唯心主义。不人云亦云，不唯上，不随风，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事实，坚持真理，是黄老治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黄老对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很深的感情。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黄老万分悲痛，一连好几天，他眼中含泪，寝食不安，忧伤而又深情地说，周总理鞠躬尽瘁，积劳成疾，“是难得的好总理”。1月下旬，我从朋友处借到一部油印的《陈毅诗词选》，并送给黄老阅读。黄老读后十分感动，特别是对“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一诗，更是赞叹不已，说只有像陈老总那样具有“挺且直”的高洁品格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好的诗篇。当晚，黄老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抒发了自己的感受。那时，全国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江青、张春桥等人进一步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千方百计压制群众悼念周总理，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想置邓小平同志于死地。“批邓”的调子越唱越高，“批邓”的活动由北京、上海推展到全国。“四人帮”的

为非作歹，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4月初，终于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悼念周总理、申讨“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4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长篇文章，把天安门事件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接着，“四人帮”又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黄老对此十分气愤。一天晚饭后，我们在党校校园里散步，黄老对我说：“悼念周总理竟然成了‘反革命’，总理最信赖的邓小平竟然成了‘反革命’的总后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说：“过去有人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今天的中国，难道真成了野心家、阴谋家的乐园？”我们都对时局的发展，对小平同志的安危，感到深深的焦虑。正因为对老一辈革命家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所以在打倒“四人帮”以后，黄老是那样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在许多诗篇中都抒发了这种由衷的喜悦之情。

我喜欢黄老的诗，也非常喜欢黄老的字。我早就想向黄老求字。但见他总是忙个不停，每次省政协开全会，他都是白天参加会议，晚上手不释卷，因此几次都是欲言又止。1989年4月，省政协召开六届二次全会，我们同住在西湖宾馆。一天晚上，许多朋友来拜访黄老，交谈甚欢，临走时有人向黄老求字，我也趁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会后不久，黄老就为我写了一幅字，写得是那样一笔不苟，遒劲中带着浑重，清丽中含有风骨。黄老知道我是湖南人，特意为我写了他年前的诗作《别长沙》：“岳云湘水两悠悠，九日长沙作快游。明月似怜人惜别，清辉伴我到株州。”清水芙蓉，情感依依，我倍感亲切。双手捧着黄老的墨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样重的情意，我怎么担当得起！

黄老呵，您的厚爱，您的言传身教，您的音容笑貌，永远是激励我不断进取的巨大力量！

1992年8月

刘学沛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正直、坦诚的长者

——缅怀黄寿祺教授

吕 荣 春

第一次见到黄寿祺教授是在 1954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当时,我刚从厦门调到福州,入福建师范学院工作。那天下午,我拿着学校人事科开的一张介绍信到上山路黄教授的寓所报到。在一间仅有几平方米的会客室里,他招呼我坐下,并给我沏上一杯花茶,之后,就很随和地同我谈了起来。他先问了我的经历和有关的一些情况,然后对我说,“为适应本省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下一学年本院中文系本科、专修科各招 100 名学生。学生数增加了,但原有的师资力量相对不足,所以特地将你和童睛岚同志从厦门调来。至于你们的任课安排,待过几天研究后再通知”。得知当晚黄老还要应邀进城去观摩省地方戏曲会演,我坐了一会就告辞了。秋季开学时,我照系里的安排,担任一年级“现代文选及习作”课的教学任务。从此,我一直在黄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30 多年来,他的正直、坦诚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始终将他当作一位最值得尊敬的前辈来看待。

我刚入福建师院工作时,中文系尚未有系主任之设,黄老以系工作组组长的名义,主持系行政工作。1956 年春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后,随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他

被正式任命为系主任。黄老对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有切身的感受，他衷心拥护党，热爱党，将系行政领导工作当作党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来看待。他在这一岗位上全力以赴，呕心沥血，并且不得不将他原先擅长的易学研究暂时放下。黄老的办公室原设在新建的教室大楼第三层的一间被分隔的小屋里，屋中只能摆一张办公桌和一付沙发，其局促可想而知，曾有人戏谑地称之为“牙科医师诊疗所”，但黄老仍泰然地在那里办公。1958年夏学校新建的图书馆落成后，中文系用房被安排在该馆第一、二层的部分房间，黄老和两位系副主任才有了一间较为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那时系主任不像后来那样可以不坐班，有事或开会才到系里，黄老几乎每天上午都到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或与两位副主任商量工作。他事必躬亲，作风深入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60年代初期的那次教师学衔（相当于职称）评定。他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了好几次座谈会，对每一位晋升学衔的教师所作的业务评语，都由他亲自起草（评语中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并恳切地提出希望），然后再由系务会议讨论通过。那次评审工作由于做得公正合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当时尚未计算教师工作量，黄老却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主动兼课，为青年助教开讲专书。

我在福建师院工作的第二学期末尾，亦即1955年初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谓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与胡风素昧平生的我竟成了那次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黄老作为中文系的行政负责人，对此甚为关切，但由于他与我相处时间尚短，也不大了解我的真实情况。有一次他奉命与我作个别谈话，诚恳地劝我一定要将所有问题交代清楚，争取宽大处理。从平时与他交往所得印象，我深知这完全出于这位忠厚、善良长者的一片好心。当年8月初，对我审查一段时间后，由于找不到确凿的实证材料，又不愿就此了结，我的问题被暂时挂了起来。临近秋季开学时，黄老问学校

一位行政领导，是否仍安排我上课，答复很明确：“当然要安排。”于是黄老通知我继续担任二年级“现代文选及习作”课程。谁知到了10月份，我的问题又重被提起，并再次受到审查，那位校领导竟完全忘记自己先前说过的话，责怪黄老为什么安排我上课，黄老不能不据理申辩。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内心很为黄老代我受过而不安。次年初夏，经过一年的反复调查，学校有关方面终于做出了我与胡风和所谓“胡风分子”无关的结论，恢复了我的工作，黄老得知后很感欣慰。秋季开学后的一天下午，我到他刚搬迁的新居去看望他，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他与我谈了很久，勉励我继续大胆工作，并留我共进晚餐。当年秋天，我当选为中文系的工会主席，密切配合系行政，在教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福利方面做了一点工作，得到他的好评。自1958年秋季起，我担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曾多次在全校性会议上作教研组工作经验的介绍，黄老对此也很重视。我虽然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但黄老待我与本校出身的毫无二致，他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从不以是否他的学生来定亲疏。60年代初期，黄老鉴于中文系没有党员副主任，曾多次向当时系党总支的一位负责同志建议，将我作为系行政领导的后备力量来培养。1965年秋，学校任命我为中文系副主任，黄老竭诚支持我开展工作。

自50年代中后期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频繁，并常出现偏差，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考验。一个人的品性如何，在政治运动中往往表露得最为明显。黄老是从响应党的号召出发来参加政治运动的。他心地善良、坦荡，没有丝毫整人的心思，也决不做落井下石这一类事。在1957年夏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中，福建师院中文系教师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好几位。黄老作为系主任，在各种大小批判会上免不了要发言，但内容、口气大都较为温和，没有一点火药味。记得他曾在一次小组会上，对一位“右派分子”苦口婆心地婉言规劝，这在当

时是很不合时宜的，极易被视为同情“右派分子”，但由此不是可以窥见黄老的为人吗？在反右派斗争后开展的向党交心和学术批判等运动中，黄老是“重点帮助对象”，为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的会，有时甚至从下午开到晚上，动员学生写的大字报也不少。当时对黄老的批评大体上有所谓“政治立场”、“宣扬儒家思想”等问题，其中有许多是扣大帽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黄老却始终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坚持讲真话，不发违心之论。他认为批评得对的就接受，自己一时想不通的就坦率地进行辩解，曾写了一份又一份的答辩书，决不为了求过关而把所有的批评都“包”下来。对于上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黄老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的。听说早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就对当时个别学生用漫画形式批判教师表示反感。1958年开展的交心运动本应强调自觉，但施行起来却成了没完没了的无休止的追问，对此，他生了厌烦情绪。这种情绪不便于公开表达，但在他的诗作中有所流露，如《交心会议坐上初见展怀白发即席有作》即是。当然，这仅是一种对直觉感受的抒发，并不是对于当时政治运动中开始出现的“左”的倾向已有理性的审察。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老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而整理有关他的材料的工作则早在当年春季就着手进行了。继他之后，铺天盖地的有组织的对我“声讨”的大字报也贴满了中文系学生宿舍的墙壁。黄老虽是批判对象，却也被动员写我的大字报，搞所谓“互相揭发”。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应付着草草写了一张。与那些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大字报不同，黄老写的完全是事实，确是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语气温和。不久，黄老和我及其他教师共十来人被打入“牛栏”，接受管教。在一次劳动间隙，黄老轻声地问我，“你又有什么问题呢”，深为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愤愤不平。我们这些人白天搞体力劳动，晚上还要集中在中文系学生宿舍附近的一间平

屋里写“思想汇报”，至10点钟才能离开。每逢这时黄老就急着赶回家去，因为他的老母正倚窗等待他平安归来，要见到他才放心。1967年春，我和几位教师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时机，“自己解放自己”，不再接受“管教”了，而黄老每天仍去中文系学生宿舍打扫卫生，并持续了一段时间。1969年夏“清队”时，黄老和我又同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我们同住一个房间，上午体力劳动，下午、晚上写交代材料，还不时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去接受一些外调人员的态度恶劣，横蛮无理的盘问。每次盘问后，黄老回到房间，总是唉声叹气的——他是一个正派人，决不肯无中生有，这如何能满足外调人员的无理要求呢？经过一段时间审查，搞不出什么问题，黄老和我终于在是年冬被解除“监管”。不久，福建师范学院停办，教职员分别下放到全省各地农村，我与黄老有两年半时间没有见面。

1972年秋福建师范学院复办并改名为福建师范大学，黄老当即被调回学校，我也通过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习而重新分配到师大。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1975年的“评法批儒”中，黄老应召参加省有关方面组织的李贽著作注释，他很不同意片面抬高法家，只想着早了一事以求解脱。一次，他奉命在中文系全体教师大会上作关于批孔的发言，他不为明哲保身而去迎合当时那股气势汹汹的潮流，仍坚持对孔子和儒家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黄老心情舒畅，干劲倍增，在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余，还恢复了已停顿多年的易学研究，并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1981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宿愿。此后他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他殷

切地希望党兴旺发达,在与我的谈话中曾多次批评削弱党与群众的联系的消极腐败现象,对报纸上刊登的个别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事例深感痛心。他说,“作为一名党员,见到这类事情,心里很难过”。“宅心处世但存真”(《六庵诗选·叠韵四答喆庵四绝》),这一自白是黄老为人处世的准则。他心地坦荡,光明磊落,敢于直言,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92年10月

吕荣春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风垂范 菩萨心肠

陈 炳 昭

黄老仙逝已二周年了。他一生致力育人，尤其对八闽莘莘学子，独具一片菩萨心肠，高风垂范，感人肺腑。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全国各地学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黄老执教的国立海疆学校的数百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全校罢课。当局对进步学生滥施迫害。正直无畏的黄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几位著名教授一起挺身而出，及时保护了学生会中的三位地下党员干部，经周密细致的安排，使他们迅速地脱离了虎口。这次义举，深受全校师生赞誉，尤其是学生会的干部们，对此更是感激涕零。

黄老对亲朋故旧一向关怀备至，解放前如此，解放后更是如此。他上有老母，中有病妻，下有弱女稚子，家境十分拮据，但他却时常周济经济情况比他更困难的亲朋和学生。他长期担任福建师大中文系主任，平素对同事十分关怀。每逢清明、端午、重九，特别是旧历新年等佳节，外地教师思乡情切，黄老每每筹措酒菜，置办家宴招待他们。我是座上常客，面对佳肴美酒，倍觉人世间温情脉脉暖心头。

黄老对亲朋故旧如此热情，对莘莘学子更是一片菩萨慈悲心肠，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护。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突出的而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主持高考评卷工作中，黄

老以极端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大家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把评卷工作做得天衣无缝,以经得起反复检查。他尽最大努力为每道题想出各种周全的答案标准,从不错漏一分半。他常说,考生会因半分之差而名落孙山,失去进高校深造的良机,这样,国家损失了人才,个人也毁了升学前程。因此,在试评中,他总是嘱咐各组要认真评定。由于汉语词语具有多义性等原因,试卷中改病句、释词义等题,考生的答案常是五花八门。黄老每每谆谆交代(我当时常担任汉语大组组长),要尽可能地把考生答案的可取之处依语言规律归纳出多种答案,电报中央批准,列出补充答案,使考生尽可能不失分而多得分。对总分为58、59分的试卷,他总是细心地、不厌其烦地逐题复核,尽可能予以挽救。黄老对考生的这一片菩萨慈悲心肠,长期以来,被广泛地誉为佳话。

黄老是国内外著名的易学鸿儒,他的文章道德,更是八闽泰斗。他的业绩与感人事迹,实难罄书。值此周年大祭,兹述其二三事,谨表敬仰萦怀之至情!

1992年中秋之夜

陈炳昭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哲人逝矣 风范长存

佟亦非 熊先煜

霞浦黄寿祺先生是先父佟麟阁将军最器重的学生，也是我们最尊敬的师友。

1936年8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以抗日救亡事业亟需文武兼备的人才，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学生军训班”，在平津保三地招考大学毕业生500人，加以训练。

斯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以下简称“将军”)兼任该军军事训练团团长，坐镇南苑，整军经武，训练军事干部，准备抗日。将军素来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宋将军遂委之兼任大学生军训班主任，在南苑进行军事训练。诸生文采斐然，专修武备，将军对他们十分爱护，明耻教战，孜孜不倦。当得知黄寿祺先生(以下简称“先生”)年少高第，又系吴承仕教授之高足，能诗文，通《易》、《礼》，是以器重逾恒。先生体质较弱，将军常嘱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各级干部予以特别照顾。将军好学深思，喜研《周易》，在课余之暇，还延先生为之讲《周易》。有时先生与同班同学计照、仵道益、鄢传薪等慷慨高歌，将军则击节欣赏。在军训班毕业前夕，将军嘱先生代拟同学录序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将军英勇抗日，壮烈殉国。先生是日在北平城内绥署值班，遂未及难，噩耗传来，悲痛逾

常。

1985年，首都各界举行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先生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得知舍弟佟兵的情况，便寄来《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缅怀佟麟阁将军》诗一首，表达他近50年来怀念和敬佩将军的心情。诗云：

南苑从戎岁 将军实作师
虚怀延代序 好学听吟诗
众爱称菩萨 艰贞抗日夷
大红门奋战 壮烈震当时

我们有幸和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彼此间鱼雁互通，先生提供了很多有关将军的史料，我们并从先生处得到很多教诲。兹略举数则：

1986年5月23日，先生寄来《抗日革命烈士佟麟阁将军墓碑铭》。他曾五易其稿，并征求福州、厦门的十多位专家教授及一些老同志的意见，经他们一致认可后始定稿，其严肃认真的精神可知。先生同时寄来1936年秋代将军所拟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考取大学毕业生训练班同学录序》（原稿复印件）。后来，这些极其珍贵的史料都被编入《佟麟阁将军》一书中（该书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抗日战争丛书之一，1990年12月北京出版社印行）。

先生先后赠我们以《楚辞全译》、《六庵诗选》及《西北游吟草》、《粤游吟草》等著作，并赠有玉照及敦煌莫高窟照片各一。我们亦奉赠在香山将军陵墓前所拍照片。先生复信说：“你们所寄来之照片，当命儿孙永珍宝之。”

1987年11月4日，先生托其门人张善文同志捎来《霞浦文史资料》第五期和福州上茶，嘱我为张购买船票。张善文同志路过重庆，人地生疏。先煜不顾年高疲劳，冒雨从山洞陪他搭车进城，步行为其取票，找旅馆，并到江边码头看船，期以报先生之嘱托也。

同年11月，先生和福建省政协委员多人到西南各省参观，途

经桂林、昆明，于28日到达成都，次日即来函告知定于12月4日晨到渝，约我们相晤。先煜于是日前往南泉招待所拜晤。亦非因病住院，未克赴约，迄今尚觉歉然。先煜与先生相见甚欢，促膝谈心半日。先生对将军殉国后的哀荣、其家庭的遭遇，以及我们的情况一一询问。还提到对将军夫人彭静智的印象，赞其端庄贤淑、待人周到（他在南苑将军办公室与夫人见过面）。当得知夫人在十年浩劫中受害病逝，极表沉痛。下午，先生在先煜陪同下乘车游览山城市容，先煜当义务解说员。先生游性极浓。已而夕阳西下，才在两路口依依惜别。先生回闽后，寄来亲书条幅《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四日重庆喜晤先煜同志》诗一首。诗云：

佟老将军有快婿 神交万里已多时 何期重庆终相晤
半日倾谈慰百思

我们把它常挂书斋东壁，见物如见人，藉以怀念先生之高情厚谊也。

今先生仙逝已两年矣，国家失哲人，我们失师友，痛悼良深！缅怀先生的业绩、风范、情谊，心中极不平静，兹虔诚略书数语，聊表我们的敬佩怀念之情。先生精勤治学、爱国育才、立身明道、待人以诚的风范，永留人间！

1992年8月18日于重庆

佟亦非 佟麟阁将军三女

熊先煜 佟麟阁将军三女婿，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黄寿祺先生二三事

郑 光 仪

1937年，我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1年毕业。在学期间，俞平伯先生教过我宋词，系主任孙人和先生教过我词学、填词，黄寿祺先生讲授唐宋诗选、《周易》等课程。黄寿祺先生讲课时总是神采奕奕。当时他衣着简朴，讲课时总是穿长衫、长袍，头戴一顶绒球儿的猴帽子（用线或毛线织的，平常折叠成三层戴在头上，天气寒冷时拉下来，可当围脖挡风寒）。我毕业离开中国大学之后，为了工作和生活疲于奔命，再也没有同黄老师联系。

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冬天，黄老师来北京，突然到我家来看我（是通过吴检斋的儿媳、我在中大国学系的同学周同德找到我的住址的）。谈了一些家常之后，提到《周易》的研究问题，我找出了当年听课的笔记。黄先生看了之后很惊奇，说道：“有这么多心得呀！你竟把笔记整理得这样清楚，这样有条理，还用墨笔小楷书写得整整齐齐，这得下大功夫啊！”。我说：“这是我从中大几位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包括您那儿学来的。”黄先生又问：“是对我一个人讲课如此整理？”我回答说：“孙人和、孙海波、陆宗达、俞平伯、高阆仙、任化远、柯长泗、刘盼遂、孙楷第先生等，几乎每位老师的讲课我都在下课后做整理，并用墨笔小楷书写清楚。”黄先生回福州后给我来信，向我借这份《周易》笔记。后来寄还我时在信中说：你的墨笔笔记给福建师范学院的领导和中文系的负责人看过，并且复

印之后分发给中文系的一些学生作参考，“有关领导都称赞我这个学生极为用功，毛笔字写得非常整齐，这样的学生是很难得的”。这事离我从中国大学毕业已经20年了，我极为欣喜地从黄老师那里又一次得到了鼓励——作学问要认真！

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酝酿举行纪念吴承仕先生大会和出版纪念吴承仕先生文集。我向有关方面推荐，请黄寿祺老师参加整理吴承仕先生遗稿的工作。1983年5月至是年冬，黄老师和我应北师大出版社之邀，为该社与中华书局拟联合出版的吴承仕先生遗著作校勘、注释等。我为《三礼名物》作了校勘和注释，还撰写了《三礼名物略例校勘后记》、《校勘记》和《校点后记》。黄老师看过我写的《校点后记》后，把这篇文章亲自抄了一遍（以防排字工人误植）。当时，他已72岁了，以这样的高龄，所抄文章仍字迹清楚、工整且苍劲有力，书法功力之深，令人吃惊。

我和黄老师一起整理吴承仕先生的遗稿和讲义，并作注释、考证、点评、校勘……戮力同心，专心致志，甚至带病坚持工作。而黄老师更以惊人的精神翻阅了41包吴承仕先生的遗稿和讲义，还细读了一部分稿件（只是因时间关系来不及全部细读）。

黄老师比我长几岁，身体也有不少病。但据他带来的助手说：“夜深了，黄老师常嘱咐我们这些助手和其他协助工作的同志早点休息，而自己却常在午夜才入睡，甚至通宵达旦阅读材料。”他住的北师大小红楼的灯常通宵不熄。

工作期间，黄老师极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检查助手和协助工作人员的工作进度、完成数量，并督促之。例如我和黄老师一起搞《三礼名物》校注时，他就经常检查我究竟完成了多少注释等，其治学之严谨，令人叹服。

黄先生不但精通古今，尤善《周易》，而且也是一位诗人。我在中国大学学习时作了许多诗，蒙黄老师认真修改，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遗憾的是，经过黄老师亲笔修改的那些诗词在十年浩劫中散

失了,这是很大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88年我主编《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时,曾请黄老师担任顾问,他欣然接受,并在百忙之中为这部书撰稿。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可惜,《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至1991年7月方得出版,而其时黄老师已逝世一年了,未得亲见,甚是遗憾。

我永远怀念我的老师黄寿祺先生。

郑光仪 口述

陈宏炤 笔录

1992年8月4日于北京

郑光仪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教授

永远怀念敬爱的之六老师

段 亦 凡

之六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50 多年间常得老师教诲，受益良深。

最初从老师受业，是在 1937 年读高中三年级时。当时，老师教国文，讲起课来清晰而详细，而且不时有些幽默的语句，同学们因此都爱听老师的课。老师在讲课中曾着力分析屈原等人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言之慷慨激昂，生动感人，我至今不忘。凡我在作文中抒发忧国之情，老师总是将有关的语句密密地画上红圈，以感老师理解青年学生的爱国之情，我对老师又增了几分敬重。

1938 年我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该校于 1941 年与男子师范学院合并，恢复北京师范大学校名），课余的诗词习作，有时寄到老师当时住的嵩云草堂，请求批改。从老师细致的改正及所作批语中，我颇受启发。我在学校的一次习作竞赛中曾名列前茅，实是老师的指导之功。

老师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课，所兼嵩云中学学生的作文，一度曾让我课余代为批改，并教我哪些应改，哪些可改可不改，以及如何写批语等。我毕业后在教学工作中对批改学生作文能应付自如，实得益于老师那时在这方面的指导。

我原名段梦仙（系老祖母命名），在大学学习期间，因不喜欢

名中的“仙”字，曾自署“轶凡”。老师以此名颇有些自命不凡的意味，乃将“轶”字改为“亦”。我从北师大毕业参加工作后，即用“亦凡”，以字代名，一生牢记老师的教诲。

老师南返后，每有诗作或著述，均赐寄给我，故得以拜读。老师非常关心我的子女的成长，函示中常一一询问。我和师弟高宪及老师非常心爱的小孙女嫋嫋，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老师曾几次因公来京，最后一次是协助北师大整理吴检斋先生的书稿。老师离京返福州的前一晚，我去送行，分别时老师与张善文同志一同送我至汽车站，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和老师的永诀。

1990年农历除夕，老师示函告知将赴美讲学，我复信为老师到异国弘扬我中华文化而欣喜，并祈望保重身体，不可过于劳累。老师回国后，寄来两张在美国拍的照片，老师神采奕奕，完全不像已届八旬的老人，我为老师的平安返回而欣喜。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突接高宪弟来信，告知老师病危的消息，即匆匆复信，未想到没过几天，竟接到福建师大发来的讣告。啊，苍天无眼，竟让病魔夺去了我师的生命，痛何如也！更为遗憾的是以相隔千里，不能亲身为老师送葬。后来从高宪弟寄来的照片中，看到了老师安葬的陵园，在那庄严而清幽的陵园中，敬爱的老师啊，您安息吧！

在纪念老师逝世一周年时，曾委托高宪弟代备两束花献在老师遗像前，以慰老师在天之灵。高宪弟办事细心，拍照寄来，看到那两束美丽的花，我眼前好像出现了老师微笑的慈颜。

老师，值得您欣慰的是：高宪弟、何芸妹及他们的女儿嫋嫋，在学习或工作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我退休后仍发挥余热，写出了有关语文教学的书稿9册并已陆续出版，最近还将参加编写的《学生辞源》寄给了嫋嫋一部。我的子女们也都能勤奋工作，小儿子文超今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以上情况用

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之六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1992年9月25日于北京

段亦凡 北京第一五九中学高级教师

追忆黄之六老师

林 新 樵

1942年余负笈永安，得晤黄之六老师于母校（福建师范专科学校）。是时黄师自燕京归，回霞浦故乡后，来永安就聘，乘舟至白马门遇盗，所有衣服均被洗劫，至校借方德植教授之衣方能上课。先生处之泰然，从所吟“难得逍遥抵永安，故人相见尽心欢。杜陵病后神犹王，杯酒谈诗到夜阑”一诗（《六庵诗选》“去年正月十一日舟至白马门遇盗，瞬经一岁，追忆前尘，兼摭近感十五首之一”）。知先生其时精神犹舒畅。事后先生见到为盗之家属穿用其被劫之衣物，先生以宽容态度处之，不计前仇，亦不究财物之损失。“近感十五首”另一首所吟“风雪连天压客车，衣裳单薄倍兴嗟。最怜弱弟痴顽甚，频怨阿兄作计差”，盖写介弟怨其兄之不查究。

至校授吾级课程，先生未定教材之前，先调查我班同学学习过的古典文学书目篇目，然后针对情况，编定教材。先生善于教学，每上一课都广征博引，从容不迫，诸生皆凝神恭听，未尝有不满意者。盖因先生每授一科或一文都有教育目的；如讲授《左传·秦晋韩之战》，先生有意引导诸生学习《周易》，详细说明古时卜与筮之不同；并详尽阐明所授文中“归妹之睽”卦象与卦辞之解释，藉引同学对《周易》之兴趣。我班同学重视学《周易》和分析筮词，都是由学习此课文开始的。

时值抗日战争期间，以国土沦丧，流亡学生极多，心情均甚沉

痛,同学中普生消极情绪,李后主之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常为同学吟唱共鸣,亡国愁感,郁结难排。先生针对此种情况,在教学中多引积极的诗句,如龚自珍之“浩荡离情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又护花”(《己亥杂诗》),启发同学积极向上。又如,他曾向同学介绍说:清代学者俞樾以其所作“落花春仍在”一句为曾国藩所赏识,遂名其书室为“春在堂书室”,并将所撰各书210卷总称为《春在堂全书》。亦旨在鼓舞同学上进。所以听黄老之课,确如坐春风之中,不觉时光易逝也。先生讲学既得诸生之欢迎,但先生却甚自谦,“要略同商左氏书,鱣堂释菜讲谈初。门墙桃李盈三百,时雨春风谢弗如”(“近感十五首”之一),先生之虚怀若谷可见。

1956年我调回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是时有许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先生为培育新一代,特在晚间开班讲授《论语》、《孟子》等。我系教研组青年教师均踊跃参加,校外亦有闻讯而来者(如福州教育局干部及其他高校的教师等)。先生不辞辛苦,常讲学至午夜方休。先生尽心教学,以其渊博的学识,对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有所批判地进行剖析,较他人深刻许多。听者咸满座风生,虽至午夜不倦。许多无识之人尝谓先生为封建道德、儒家思想的卫道士,可谓诬矣。

先生对历史人物之评价,亦有独见之处。如对曹操其人,先生认为功大于过。而当时学生因受《三国演义》之影响,不同意先生的看法,认为先生有偏见,及至郭沫若先生论曹操之后,诸生始折服先生之见。

先生为人十分骨鲠,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仍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与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入党以后,对组织仍是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此种朴素真诚精神(在别人看来似乎直而且戆),实难能可贵。

先生孜孜工作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亦为众所敬仰。高校职称评议工作开展后，送先生评阅的论文很多。先生以白日须给研究生上课，评阅论文工作多置于晚间进行，且几乎每天都阅至午夜。诸生劝其早些休息，师均答以白天无时间，只得晚间相补耳。甚至最后病在省立医院，除每日记日记之外，还为《福建诗词》撰写序文。师之勤劳，确为吾人之典范。

先生教学50余年，而生活常困穷坎坷。解放后稍得安定，得党和政府的重视，擢为中文系主任、副校长，但家中又迭生不幸，师母、太师母及爱女幼严相继仙逝。先生曾于1976年夫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作七律一首，稍后又作“哭严女”等诗，以志伤痛之情。我曾以诗记先生此段的生活：“……极左之风时冲击，不屈不挠因无私。贫穷之鬼还侵袭，病魔常扰严式仪。鬻书卖画救眉急，虽有万卷亦含悲。幸得省委来相拯，暂解医药积欠资。可恨天公不作美，狂风强折傲霜枝。伤心未愈来文革，十年动乱历劫身。下放茶广二年许，何知天又夺乃慈。仁人孝子心为裂，呼号长泣情如痴。祸不单行俗语说，掌珠竟亦化尘埃。临终之时长寄语，今后无人慰晨昏，我闻此语长流涕，旁观垂泪犹伤神。……”

呜呼！先生已归道山二周年，缅思先生之教学为人，未尝不潸焉流涕，姑书数语，以志哀思。

1992年8月

林新樵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隆恩高谊 永志心中

张 可 珍

1940年秋，可珍负笈燕溪，越明年，杜悦鸣师就聘母校——福建师范专科学校。于杜师处获悉其挚友黄之六先生亦已应聘，且将来校。杜师又告我等，黄师学窥秦汉以上，专《周易》，通三礼，文宗桐城，诗承盛唐。擅书法，每回乡省亲，霞浦为之纸贵。旋恩师从燕归，途遭匪劫，财物荡焉，而师泰然处之。忆在学两年间，师所授课程有历代文选、专书选读与各体文习作诸门。师授课诠释入微，广征博引，从容不迫，循循善诱。课余常指导我等攻读专集，诵读名篇。今日翻阅士衡《文赋》与昭明《文选序》，犹琅琅成诵。当年书声紫霞岭、灯影映剑津之情景，今犹仿佛如昨。课余经常到教授楼问难求教，师于释疑、解惑、授以为学之道外，时以正直持身、诚厚待人相勸。受益匪浅。其后数十年可珍从事教书育人，处处以师为典范，培育莘莘学子，微有所成，恩师之功不可泯也。可珍七十自寿诗中有“已自从师学作人”句，盖纪恩师之德也。

1946年，母校迁回福州，师亦来榕，从此40多年来常趋庭聆训。我等事师如父兄，师亦视我等如子弟。每年春节必结伴登堂贺岁，从未间断。高光坦学长成婚，师为主持婚礼；先妣弃养，师躬临吊唁；林新樵学长萱堂仙逝，师亲莅主祭；郑贞箴学长辞世，师闻耗悲痛，连夜作联以挽：“夫妇同窗，父子及门，两世深交今所罕；每年贺岁，上月初筵，一朝永诀我何堪！”可珍七十生辰，恩师莅临祝福

并赋七绝四首惠贺，其一：“河朔归来到燕溪，讲坛记在渡头西。当时同学多推重，文采风流有品题”，其二：“卅载劳心在八闽，舌耕不倦育新民。修能内美俱相得，无愧鸿名号可珍”，其三：“稀龄甲子喜开元，聚饮何妨共放言。教泽早知留左海，家风况可继南轩”，其四：“庶政维新总可观，岁寒我亦有余欢。但期腰脚年年健，与子重登十八盘”。隆恩高谊，永志难忘。

恩师极重友谊，就学燕京期间，与悦鸣师结为知交。某年假期，悦鸣师抱病南旋，师随行照料，海行数日，悦鸣师泄泻不止，体甚羸弱，每如厕，师必负其往返，并以身俯伏船舷以供倚靠。。师曾言及，悦鸣师少有神童之誉，初作诗《春游芳草地》即能遍押上下平三十韵，其《北游吟草》尽掷地有声之作。1942年，悦鸣师归里奔其祖妣之丧，哀毁逾恒，不幸病逝。师痛失挚友，乃筹划开追悼会以表哀思。其时北平、福宁各地寄来挽章不下百余幅，骚赋、古风、律绝、对联，诸体皆备。我等忍悲含泪，夤夜张挂。《六庵诗选》中《别悦鸣权厝》有句“抚棺一洒泪，欲去首频回”，《除夜有怀亡友悦鸣》有句“去年除夕记相思，曾寄平安七字诗。今又岁终君竟去，招魂无处雨如丝”，其笃于友情如此。

师与江左吴茆之师、上杭包笠山师交谊亦深，曾号“岁寒三友”，师年最少自称“梅弟”。《六庵诗选》中与吴、包二老酬和之作不少。

恩师为人正直，不畏权势。1942年，福建师专国民党分部屡胁迫恩师参加国民党。事后师含愤告我：“他们今日又来胁迫，我严辞相斥，说：‘人各有志，我黄之六到南平街头排卦摊也不受这种肮脏气！’”

恩师处事考虑周详。1947年，彭传珍主师专校政，拆移洪山桥原兵工厂砖瓦，于乌石山建一座四层大楼。师为命名“又习楼”。楼成，在榕校友决定献匾申祝。师为拟“广厦大庇”四字。将付镌刻，师感题词欠妥，恐破读而生误会（盖彭乃厦门大学第一届校友），于

是改为“乌峰毓秀”。

师家中三代人于十年浩劫中先后去世。太师母仙逝时已逾 80 高龄；师母久病，疗治无效，师自言均无遗憾。惟女幼严过早离开人世，以华年凋谢，师为之抱憾终生。幼严夫婿，不思续弦，师常以此为忧，谓之曰：“我虽谙古礼，然并非食古不化者。幼严去世已数载，汝宜续弦；倘汝先幼严而去，三年之后，我亦劝其再醮。”只此一端，亦足见恩师思想之开明。

1986 年，恩师七十五寿诞，我邀陈景汉同志参加庆祝。先是，师拟出版诗集，曾将诗稿复写，征求意见。席间就出全集或出选集进行讨论，师意欲出全集，而陈以出选集为宜。陈说：“出选集则瑜可掩瑕，而出全集则易致瑜不掩瑕。”师瞿然喜曰：“此诚肺腑之言！”师虚怀若谷弥增后辈钦仰。景汉挽六庵夫子联上句为“未得忝列门墙只稽一拜”，足见其对黄老之尊崇。

恩师著作等身，凡出版新著皆承分赠，诸如《周易译注》、《楚辞全译》、《六庵诗选》等。虽敬受供诸案头而未能精读，负疚至今。我与新樵兄常叹虽追随恩师数十载，却不曾学好《周易》，实为终生憾事。

先师归道山于兹已两载矣，两年前得新樵之电告连夜奔丧，其后恭送骨灰盒于文林山陵园，两年来清明节登山献祭，7 月 28 日于意园斋寓志哀，兹复溺笔记述若干事，冀有裨于阐扬恩师之潜德幽光。然终难报恩师之鸿恩与厚爱也。

1992 年 9 月

张可珍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

怀念寿祺师

郭 风

1942年秋至1944年夏，我就读于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原称文史地系）。黄寿祺老师当时任中文系教授。为此，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

寿祺师到福建师专任教之先，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他原就从这所大学毕业，曾受业于吴梅、高步瀛等著名学者、教授，是他们的高足。福建师专刚成立时，校址设在永安的霞岭。记得9月间开学时，寿祺师尚未到校，但师生间已风传他是一位当代易学大师，精通我国古典文学，等等。大家都盼望他早日到校。大概是在开学后的一二个月，他果然来了。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十分年轻（当时不过30岁出头），平和、宁静，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

记得连续二三个学期，他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自《六经》、先秦文学以至隋、唐、五代和宋的诗、词和散文名篇。在我看来，当时的师专似有一种自由讲学的学风，所选教材以至教学方法，似均由教授自定，以各显其所长。寿祺师所选古典文学教材，未必一定是世所公认的名篇（这有一个好处，可使学生的识见不至囿于某些固定的看法），但也不乏历来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他选《论语·先进》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等便是。不过，我又觉得，寿祺师之所以给我们选读这一章，也许有某种用意，而此种用意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必可以明言。记得他曾说过：“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止是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从本章可以看出，他力求自己的学生和周围的人各自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还说：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句，值得玩味！”

他曾授我们以《离骚》。上面提及，当时师专似有自由讲学之风。教授讲课，是在各显神通。譬如朱维干教授，授的是《中国通史》，他却只讲汉代历史，且在两学期之间，又只专讲汉朝酷吏的历史，把那些古代的贪官污吏一一予以曝光。寿祺师讲《离骚》也几乎讲了将近一个学期，使我们在《楚辞》上所得的知识既广泛而又有所专深。

不过，寿祺师却没有在课堂上正式讲授过《易》。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讲《易》，免不了要辩证法……”这或许说明了他的苦衷。

福建师专只在霞岭办学一学期，次年4月，即趁燕江和闽江水上涨、利于航运之时，迁至南平后壑。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霞岭的风景是值得怀念的——山间有一片片的杉木林、杂木林，燕溪从校前流过，溪上有一座浮桥，通向对面岸上的公路（若浮桥为洪水冲断，在未修成以前，过河用渡船）。当时，学校的环境，在我看来是清静的。记得，每日傍晚，寿祺师常与包树棠、杜琨和当时在艺术系任教的画家吴弗之等教授，走过浮桥，在校对面的公路上散步（这公路是通向连城的，四面皆山和杂木林）。看到也在散步的同学们，总是和蔼地向大家打招呼。

在福建师专就读期间，我虽然没有放弃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但我在课外时间，除了创作外（我在这时期，在国内一些文学期刊以及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些习作），阅读的多为西欧、旧俄等的一些翻译作品，当然也免不了要浏览发于当时报刊的文学作品。寿祺师可能发现我对本国古典文学的学习有所放松。记得在我快

毕业的某一天,当我去看望他时,他对我说:

“诸如《论语》、《孟子》以及唐宋诸大家的作品,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你方便时还是多加研读;当然,读书也不可勉强而行……”

我始终认为,他对自己的学生一直是十分关注的。

寿祺师对于《易经》有极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对于《楚辞》亦然。但到了晚年,他的《周易译注》、《楚辞全译》等著作始得出版,我们都为之欣慰不已,以为此乃学术界、文学界的盛事。但作为一代宗师,他还有许多著作应该陆续出版。

1992年8月

郭 风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一代宗师 永在我心中

方 南 生

恩师之六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思念之情无时或释。翻开先生于1988年初夏从遥远南天寄赠的《六庵诗选》，凝视着他老人家在扉页上亲题的手笔，一股深厚浓郁的情意，便肃肃然笼罩心头。对先生的学问、道德与著述，海内外人士记叙颇多。桂堂先生《老树当风叶有声——记黄寿祺教授》一文，可谓集大成之作，分析精辟恰当。这里，仅就先生的为人处世，就已所知，略补一二，以期能给桂文提供一些注脚和例举。

先生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诲人不倦，教学精益求精，至今印象极深。我于1947年考入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其时，先生为中文系主任，虽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是左海有声的博学鸿儒了。我听过先生讲授《离骚》一学年，先生旁搜远稽，唯恐不尽。既从文学史角度讲述时代背景、发展源流，又从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进行细致的剖析，诱导学生深入思考与鉴赏，掌握篇章段落的思想；同时，又从字义、音韵和通假转借细加分析，使学生初步熟悉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一堂课下来，如坐春风，不觉疲累，倒觉得是极好的精神享受——而先生已歪粉满身，汗下涔涔了。

先生平日对学生教之既严，爱之亦切。我也听过他讲《周易》一学年，有一件事记忆犹新。1950年春，我被抽调去福建省团校学

习,3个月归来,正赶上毕业班教学实习。我被指定到附中一个班,讲授赵树理的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我按老师的要求写好教案,做了充分的准备,自以为万无一失。实习课的那一天,50余名学生静坐讲台前,后排坐满了中文系的教师和同学。黄老亲自主持了这次重要的毕业考核。当我分析课文时,随口提到教案未列的“八卦”,并即转身板书卦名——自觉已在先生门下学了一年的《周易》,这卦名还不是信手拈来吗?谁知在黑板上写了7个卦名之后,粉笔头在黑板上点点戳戳,就是“憋”不出来;尽管心里反复叨念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但还是“唤”不出第八个卦名来。众目睽睽之下,我懵住了——就像一位初次登台的新演员,忘了台词,又不知应变——一直急得面红耳赤,汗出如注。这时先生从后排走上讲台,从我手中接过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斗大的“巽”字,然后又从容地回座位去了。自这次蹩脚的实习之后,我自感愧对先生之殊爱,无地自容。但先生并不改初衷,爱护之情弥笃。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提起此事,先生笑笑地说:“谁能保证没有一时憋住的时候,何况是第一次上台!”

光阴荏苒,我从福建师范学院毕业(1950年师专改院),转眼已四十春秋。长期辗转北国,与闽海榕城,远隔千里,而先生仍一如在校时那样关心我,指导我。我承担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的校点工作,一有疑惑,即千里飞书问难。先生有问必答,每指点再三,唯恐不详。我不会写诗,但心血来潮时,偶亦学写几句近体,呈寄先生审正。先生阅后,随即回信,常指出某词某字如作某,则意境更佳、境界全出等等。先生门墙弟子,何止三千,而对我这样初涉诗坛的人,竟从不疏忽遗弃,一有佳作,必彙录一纸,远寄京华,使我先睹为快。1983年暮春,先生来京主持整理吴检斋先生遗著,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一号楼二层朝南的一间房里。这里的环境十分幽静。推开窗扉,院里一棵枝繁叶茂的合欢树,点缀着满头红花,在薰风里不时摇曳花姿,探进头来。先生有诗云:“合欢树下是吾庐,晴影

花光笼架书。独坐小楼笺断稿，水流云在悟盈虚。”正是说此佳境。当我去看望先生时，先生神采奕奕，坐在桌前，看起来很健康，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苍老。谈话中，先生说：“我以古稀之年入党，是一个新党员，要向你这老党员学习。在党的知识上，你是我的先生。”我说：“党性高低不在入党先后。先生在建国前就深明大义，大力支持革命活动和进步学生运动，在立场和思想上，早就靠近党了。”谈到此次晋京还准备参加纪念吴检斋先生大会，先生顺手拿出为此次大会写的一首诗，要我提意见。先生是享誉诗坛的老手，还要我提意见，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但在先生真诚恳切的要求下，我也只好尽一己浅薄之见，提出个别字可商。先生听后，沉吟片刻，说一声“改得好”，立即提笔改了。北京虞北山教授是先生的旧交，他73岁寿辰之日，正值国庆、中秋佳节，先生高兴地写了二首诗（即《寿虞北山教授七十三两首》），欲持去宣南西砖胡同37号虞宅祝贺。在这之前，先生要我提些修改意见。我见其中第二首云“相见常惭四不如，英文、佛学与诗、书。愿将炳烛余光在，日向鱣堂侍起居”，就说：“学生以为英文、佛学，北山先生固可当之无愧；至于诗、书两项，恐可再议。”先生摇头说：“这点你不清楚。虞老的诗、书，黄某也望尘莫及。”当时我也技痒，试写了三首祝寿绝句，请先生批改。我第三首写的是：“才兼庾鲍更参禅，隽逸清新又妙玄。长把金花吟不释，回肠荡气思悠然。”先生看后说：“最后一句得改，如改成‘行云流水思悠然’，对诗人兼书法家的虞老，则更贴切些。”近重温先生《送郭荫棠之漳州二首》诗之二（“仓山春霭共秋云，风雨宵阑每论文。启我深思攻我过，有谁诤诤更如君。”），更进一步体会到：对已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对人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求真精神，正是先生为人学之本色。

1983年6月中旬，我写了一篇探讨初唐《翰林学士集》的论文，约万余字，初稿甫成，即呈请先生教正。当时先生正在点校吴检斋先生的《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等遗稿，十分繁忙。但仍挤出时间，

为我连夜审稿。初稿尚未誊清，看起来很吃力。先生仍逐行逐字审读，遇有问题，即用朱笔批改，记下审读日期，落款书“祺记”、“祺又记”、“祺注”等。稿末并有总批：“大作已粗读粗校讫，……妄有所见，即随手批注，以供参考，未必悉当，幸勿拘守。”落款：“六庵老人祺校讫并记。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四夜于北师小红楼一座之南窗。”在大忙而酷热的季节里，先生不辞辛劳，为我看完这篇稿，不知又淌下多少汗水。我为感谢先生的盛情，曾写了三首五言绝句，其中第三首云：“仰对云天月，苍茫有所思。艺山犹可踵，师德邈难期。”先生阅后说：“你写得有些过，我不敢接受。但从用词遣字上讲，‘艺山’无据，不如作‘高山’有出处。”当年在校时，先生为我批改的一批作业，毕业时，在一次白蚁灾中，化为乌有；北来后，经先生批阅过的稿底，留下不少审读时的朱批墨迹，我逐一什袭以藏，留作纪念，詎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化为一片灰烬。现手边只剩下这篇论文底稿，留有先生的朱批笔迹，是多么宝贵的遗墨啊！

先生外表道貌岸然，俨似一位冰冷严肃的长者，其实内心世界是热火一团；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事业，也热爱师友，热爱亲手培育的满墙桃李和自己的亲人。他在京期间，访其老师槐轩先生（即尚节之先生）故居，有“谁料槐轩都讲地，庭前无处觅双槐”诗句。吴检斋先生遗稿整理告一段落，先生束装南旋，曾寄来《留别京中诸友》七律一首，诗云：“三载京华频作客，关心岂独为师门。行经故地常留影，言念旧游总断魂。敢望著书能问世，但期学道善寻源。清明时节莺花好，长记良朋过往繁。”1966年春，黄师母病故。1976年，先生在为纪念师母逝世十周年而写的一首七律中吟道：“昔日音容常在忆，几时魂梦果相亲。”写得多么凄恻动人！是年6月中旬，先生爱女幼严病重，先生曾驰电托我在京为其购买特效药。我正在王府井八面槽奔走时，旋又接电示：“幼严二十二日已逝，西药不必购买。”先生在《哭严女》一诗后两句沉痛地写道：“夜

台好去寻慈母，为报阿爷也快来！”可想见当时先生悲痛欲绝之状。翌年夏天，先生游福州西湖，又寄来《西湖杂感五首》，其中第四首有句云：“可堪娇女如花谢，忍对湖邻十八中。”见景伤情，悲从中来。1980年先生因病住于福建省立医院，曾寄我《住院杂咏五首》，其中第四首云，“蕙折兰摧已四霜，我家娇女岂能忘。伤心重过三区地，犹见当年旧病床”，其下并有自注。想念亡女之殷殷亲情，时见笔端，读后令人泪下。先生对已故亲人，如此多情，而对膝下儿孙，又寄以无限的期望。先生家中大厅上，挂着一条先生的亲笔条幅，写有1988年春节给孙女娴娴的一首七绝，诗云：“新年恰好是龙年，兆得乾爻利在田。最喜娴孙今七岁，能为拉纸写春联。”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机蓬勃的天伦乐趣。

1984年9月，先生年事已高，犹去山东曲阜参加孔子诞生二千五百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会后乘兴登泰山，游济南。游兴既浓，腰腿亦健，窃为之庆幸。正是古人所云：“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心情舒坦，奚囊常满，先生曾用毛笔亲录大作《登泰山》、《游济南市》两诗赠我。其后又陆续寄来《西北游吟草》、《秦豫行唱和集》等诗集。1986年8月间，先生来示，告以祥耀先生近亦移居意园，今后可朝夕切磋，吟诗唱和，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并附《喆庵迁来意园，喜赋二十二韵》诗一首，有句云：“今建意园成，层楼高且美。与君并移居，相隔咫尺耳。赏奇或析疑，不愁难见矣。飞笺与传韵，幼孙便可使。”可见先生对颐养晚景充满了情趣，对自己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充满了希望。1987年秋，内子得重病，住院开刀，先生得知讯息，屡来函致问，并慰藉周至。内子病愈后，于1989年秋，携手同返闽省，曾谒先生于仓山意园，相见甚欢。随后先生又以79岁高龄，拄杖登上我落脚之仓山进步路19号楼六层回访，并约我们隔日前去他家共进午餐。盛情难却，唯有从命。当我们应邀赴约时，先生早已命其公子高宪夫妇亲自主厨，为我们夫妻二人备办了一桌丰盛的佳肴。饭后，先生拥小孙女娴娴坐在书斋藤椅上饮茗休

憩，一面告以将去美国讲学，为期半年。我以先生虽身体尚好，但毕竟已年近八十，以此高龄赴异国讲学，生活当有诸多不便，且对所患消渴之症亦有影响，欲以劝阻。先生说：“学校领导很关心，决定派两名年轻同志陪我东渡，谅亦无妨。”当我们告别下楼时，先生执意要亲自送出楼外。我们走至院内，频频向楼上挥手，预祝美国之行，胜利归来。先生亦手扶栏杆，向我们挥手致意。诟料一别竟成永诀。除收到先生在洛杉矶所摄玉照外，再也见不到敬爱的先生了。

“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先生遗愿已经实现了。先生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律己严、待人宽的人师风谊，对学术、对事业求实存真的精神，对栽培学子的深情厚意，将永远留在我心中。

1992年9月于北京六里桥边

方南生 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李 联 明

黄老辞世，已历年余。每当我脑际里浮现恩师的音容，忆及病榻前无言诀别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潸然泪下。

我就学于福建师院，毕业于师院，后又长期执教于母校。40年的耳提面命，40年的教诲熏陶，黄老的道德、学问、文章，我极为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是我打心眼里最为崇敬的师长之一。

黄老自幼勤奋好学，后又师从名家，学识渊博且又融会贯通，其于吾国传统文化，素有“活字典”之盛誉。黄老授课，对古典诗文，字斟句酌，探幽钩沉，又广征博引，淋漓酣畅。他串讲《离骚》长达16课时，精剖细析，极为透彻，让听者领略历史的风烟，把他们带进艺术的圣坛。如今虽则整整40年过去，但那动人的场景，仍历历如在目前。作为美学研究者，我经常想：美覆盖着一切领域，黄老的讲课艺术，岂不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美么？

黄老待人处世，禀持真诚。在斗争成风、运动迭起的峥嵘岁月里，他屡遭冲击。在“左”风日炽、万马齐喑的氛围中，他只能三缄其口。时而被迫反省思过，也是心存耿直，适可而止，绝不随风转舵，曲意逢迎。无论顺境逆境，均不失其赤子之心。常有人传言，50年代党组织曾动员黄老申请入党，他答以“家有老母在堂，未能把一切献给党”。有人曾以此贬黄老之“迂”。此事真伪，我未作核实，但我始终认为，即便如此，不也表现了黄老处世之严肃与真诚么？胸

怀坦荡，表里如一，不故作谦恭，不发违心之论，这不正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么？在人品上，这和那些口是心非、欺世盗名的“伪君子”相比，不啻天渊之别！事实上，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尤其亲历了拨乱反正的新形势，黄老的思想境界终于实现了新的飞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入党申请，党组织也及时向他敞开了怀抱。记得在10年前的“七一”宣誓大会上，他代表新党员讲话，恳切陈辞：“论年龄，我是在座中最年长的一位；论党龄，则是最年幼的小学生。”全场以善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回报他这出自肺腑的真诚。黄老的真诚，时而以慷慨直言出之，时而以委婉低回出之，时而以豁达调侃出之。如“何日交心罢，西湖共泛舟”一句，既抒发了对那在烽火连三月的日子里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的愤懑抑郁之情，又不失温柔敦厚。我以为诸如此类的诗句，是最具性格化的，用文艺理论的惯用术语来说，确实是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黄老皓首穷经，卓有建树。他满腹经纶，又非食古不化。他崇奉儒家，常以古证今，但同时又注今入古，推陈出新，因而他的言行往往迸发出传统精华与现代意识相互撞击的耀眼的火花。他是一位非常开明的老学者。

这里以我亲身经历的两事为例。40年前，在学完《屈赋》一章后，黄老布置了以“论《屈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题的作业。是时，张贻惠教授正为我们讲授现代汉语。我用现代修辞学的观点，系统地分析了屈赋的语言艺术。黄老极表赞扬，打了满分，还鼓励我学习古典文学一定要和其他现代科学融会贯通，以收相得益彰之效。此后，不论是在治学、讲课和研究中，还是在行政管理工作中，黄老的教诲始终让我受用无穷。

上述的事过后31年，1983年夏日，省委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转到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面对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致函正客居首都选编吴承仕文集的黄老，向他求教。不几天就收到他热

情洋溢的复示：“我国传统思想，修齐是为了治平，独善乃不得已而为之。能兼善者固仁人志士之弘愿也。省委如坚请出任行政工作，望鼓勇为之！来京之前，曾有人垂询多次，固知足下之将肩重任也。贺贺。”面对着那苍劲工整的字迹，我感奋不已。上任后，我曾向他诉说，“事务太忙，没时间写文章了”。他恳切地说，“不要老是惦念着自己的小文章，要到社会上去写好一篇大文章”，随之，亲笔书赠五律一首：“脱颖膺新职，真如锥处囊。风华方正茂，文采望非常。用世吾之愿，育才尔所长。相期弘教化，流誉在闽疆。”从这些助勉中，不难看到黄老随着时代前进的足迹。

我出生于1935年，恰与黄老大学毕业执掌教鞭同年。我是多么期望当我花甲之年时，能参与庆贺黄老从教60周年的庆典啊！但黄老过早地离我们而去，这一夙愿终未能实现，以致成为终身憾事。悲哉！

闽山苍苍，闽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敬爱的之六夫子，您的品格、风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跟随您的步履长达40年的学生，将遵循您的“相期弘教化”、“写好大文章”的教导，敬业尽责，期能有所建树，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1992年11月

李联明 福建省文化厅厅长、教授

忆念吾师黄寿祺教授

林 海 权

我国当代著名的易学专家黄寿祺教授逝世已经两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没有死，他还活在我的心中。每当我遇到疑难问题时，总是想到，要是黄老还在，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迎刃而解。师生情深，生死在念，何能一日忘怀！以下略记数事，聊寄我深切的哀思。



我 1956 年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跟张贻惠教授和当代语言学家洪心衡先生学现代汉语，但我对古典文学有更浓厚的兴趣。那时导师制执行得严，古典组刚留下的几位助教在进修计划中规定要听系主任黄寿祺教授的专书课，每周上一个晚上的课。我得知后，提出旁听的要求，先生一口答应，说：“凡愿意听的一律欢迎。”那时听课的约 10 人左右（包括校外的 3、4 人），课堂就设在先生家里。每到上课时间，我入先生家时，先生早已在书房里摆好了凳子，有时先生用饭未完，就叫他的掌珠幼严或佳胤高宪来倒茶。在几年的时间里，先生给我们讲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和《古文观止》等专书。每次上课我们都虚往实归：先生讲课生动，深入浅出，上下古今，广泛联系，有时穿插一些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故事，很能引人入胜，听了久久不

能忘怀。例如一次讲《孟子·公孙丑上·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章，先生说，从前有个职业刽子手，无时不在想如何才能把死犯的脑袋一刀砍下来。一次在吃饭时，他端着碗两眼直瞪着他父亲的脖子发呆，他父亲发觉后责骂他道：“你他妈的不吃饭，一直瞪着我干嘛！”那刽子手说：“我在琢磨像您这样一副脑袋要怎样才能一刀砍下来。”讲完故事后，先生说，此事说来荒唐，大逆不道，但刽子手平时确是这种心态，“故术不可不慎”，孟子的话千真万确。先生讲课声调高亢，富有感情，令人乐而忘倦，虽每至夜分，总是恋恋不愿离去。先生常说，师范是教育工作的母机，师院更是母机的母机，师范教育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今天来师院深造的都是全省百里挑一的英才，你们更是英才的英才。教师要把乐育英才作为自己崇高的志趣。当讲到《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时，先生更是精神振奋，目光炯炯，对我们寄予厚望。几年来，先生为我们的成长呕尽了心血，付出了代价，而我们却没有给先生任何物质上的报偿。一年春节，学校通知不放寒假，先生怕我们几个外地人在校过节孤单寂寞，特地备了一席酒茶，把我们邀到他家过年。先生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感情。今天我们以四海为家，‘为异客’的感觉就大可不必了。”先生亲切的话语，说得大家都笑了。这一年，我们过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春节。

二

先生出生于书香之家，有优良的家学，他从小勤奋，并具天才，加上师友的教诲，造成深邃广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力。先生平时谈话，引经据典，如数家常，古诗古语，冲口而出，令人钦佩得五体投地。我问先生何以有此等记忆力，先生说：我从小熟读《四书》、《五经》，都得力于祖父的严格督课。祖父天天督我背书，他有一种特殊的奖励办法，就是给我上算盘珠子。我每背《诗经》一篇，他就

上一颗算盘珠子，一直背到 305 篇、上到 305 颗为止；然后再叫我倒背，每背一篇，就退一个算盘珠子，一直退到零为止。背书炼就了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对《诗经》，先生背得滚瓜烂熟，其余各书，也莫不如此。先生对于《四书》，尤其娴熟。每凡向先生请教《四书》中的问题，若原文记得不全，先生听了几个字，便能接下去把原文背出来，并问是不是这一章，这一段，然后逐一加以解释。先生真不愧是一部“活字典”。凡辞书中查不到的问题，我去请教先生，每次都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有时需要查找书籍、资料才能答复的，先生也不惜花费时间，一直追寻到有了结果后止，从不马马虎虎，不了了之。每逢查找有获，先生不是叫高宪同志把资料送来，就是自己亲自送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一再表示歉疚。先生总说：“我事情多，又常外出开会，你来了遇不着，岂不白跑一趟。再说查到的资料如不及时处理，日后连自己也会忘记放在何处，那时再找更花时间，倒不如我亲自送来，既省时又不误事。”先生总是替别人想得更多，他那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先生惊人的记忆力老而不衰。一次我注释一篇古文，遇到“题糕”一语不知出处，先生正讲完《周易》下课出来，我迎上去问“题糕”是关于何人的典故，出自何书，但话一出口即有些后悔，担心这“突然袭击”会把先生难住，怨自己不该不经查找就匆忙请教。不料先生听后，不假思索地说：大概是刘禹锡的典故吧，出于《历代诗话》，我 20 来岁时看过的，记得不十分真切了，你不妨去查查。后来我查了《历代诗话》，果然是刘禹锡的典故。我看书往往得后遗前。先生说，要去掉这个毛病，就要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须知记忆力也是锻炼得来的。又说，我学问的基础是在 20 来岁时做成的，凡我看书，都用志不分，用心思考，从不一目十行，故能久久不忘。

先生帮助后学不遗余力。回忆我的每一进步，都和先生的鼓励、帮助分不开。我平时爱写点诗词，但从来不敢轻易示人。1969 年，因“备战”关系，学校迁到建瓯南雅，在那里继续进行“清队”和

“整党”，我和先生住处相邻。那时中文系有个学生叫邹宗彬的，喜爱古典诗词，竟忘了自己的职责是看守“反动学术权威”，常来向先生求教，先生也不顾忌，每来即同他谈诗论词。清队中那种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活泼轻松了，我有时也凑过去旁听，顺便呈上几首新作请教。先生看到我会写诗，很高兴，立赋一首《读海权诗稿漫题一绝》，写在小纸条上递给我。诗写道：“晴窗展卷读新声，字斟句酌见性情。年少多著诗律细，顿教老眼霎时明。”在先生的鼓励下，我的诗逐渐写得多了。1972年师大复办，我即将下放期间所写的部分新作呈先生审阅。先生指导十分细心，凡诗中用字重复、对仗不工或有合掌错误之处，都逐一指出，或径予改正。凡先生认为写得好的诗，就在诗题上加两个圈表示，好联、好句也在其下连画几个圈表示，有时还加上扼要的评语。凡经先生修改的诗，思想性、艺术性都提高了，更能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实际。此后，凡较重要的诗作，我都喜欢向先生请教，而先生看后，每次总是声明，“这些意见，仅供参考，不必拘泥”，给我留下了从容思考的余地。

我写《李贽年谱考略》一书，也始终得到先生的关怀和帮助。1974年，我奉调参加福建省李贽著作注释组的工作，注释李贽的《焚书》和《续焚书》。此外，我还接受编写新的李贽年谱的任务，中心工作是弄清李贽诗文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为注释《焚书》、《续焚书》服务（弄清李贽每篇诗文写作的时、地问题，可以更进一步弄清李贽的仕履、交游、讲学和思想发展等的情况）。而要弄清这些问题，就离不开有力的证据，因此考证就成为编写年谱的首要手段了。当时先生担任注释组的顾问，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先生谈了，先生极表赞成。这样我就把李贽年谱写成以考证为主的一部专著，并正式取名为《李贽年谱考略》。1977年李贽著作注释组解散，“年谱考略”尚未最后修改完成，先生见面时总是询问修改的进展情况，鼓励我用力把它写好，后来更建议我把初稿刻印出来，征求意见，然后再作修改，争取出版。时郑松生副主任分管教师科研，也力主

此见。1980年《李贽年谱考略》由中文系出资刻印105部作为征求意见稿。在付刻之前，我请先生替我审阅书稿，先生慨然应允。后来先生又应我的请求替《李贽年谱考略》写序。在序言中，先生赞扬我“坚毅坚持，十余年来无间寒暑，孜孜不懈，遂得成此专著”的精神，同时又说：“……故余之研究李贽，可谓一事无成。”其实，先生在注释组，“当时所见常与时论不同”，曾写有读书札记百数十条，题为《注李贽墨》，说“一事无成”，不过是先生的自谦之词罢了。

先生对听过他的专书课的学生印象特别深刻，一向都很关心，业务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遇有大事，常问这些人最近表现如何。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先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一些人的作为。一天，先生拄着拐杖来校，要到系办公室取信函，和我在校门口相遇，先生即把我叫住，直截了当但又十分关切地问：“你这次参加过游行没有？”我说我没有，而且我也不同意上街游行。先生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对对！这就对了，这就好了。”先生教书又教人，严格要求学生，就是对老学生也不放松。这件事就是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先生言传身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他正直高尚的品德和“绝假纯真”的人格力量。

三

1990年初，先生应邀将到美国去讲学，我去看他。在谈话中，先生说：“我还有一门学问没有传，这就是《三礼》，今后想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传《易》学，再传《三礼》，我就可以瞑目息肩了。”我听了很高兴，心想，南京大学洪诚教授治训诂学几十年，自说他《三礼》读了七遍，我也治训诂学，却远远不如，就说：“那我今后就向您请教了。”先生要到美国讲《周易》，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先生的光荣，就试写一首诗来给您送行如何。临行前，我把一首题为《送我国著名易学专家吾师黄寿祺教授赴美讲学喜赋》的诗呈送给他，诗写道：“东学西传万里行，而今《周易》庆新生。五洲四

海齐相慕，但祝元亨更利贞。”先生看到我的诗用了《周易》开篇《乾卦》中的用语，笑着说：“还是你有办法，待我从美国回来再把和诗及以前答应要书幅的大字一并给你。”我预祝先生旅途平安。

4月间，忽传先生提前回国，说是胃有不适，要到医院去检查。后来传出是得了胃癌，但医院一直瞒着先生，说是患了较严重的胃炎，要开刀治疗才利痊愈。先生对此深信不疑，读书作诗自若。一天，我去看他。先生说：“再过几天我就要挨一刀了。”但又不无忧伤地说：“前年王崑到美国讲学，回来一病就死了。我刚从美国回来就病了。他是理科的代表，我恐怕要做文科的代表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连忙用话安慰他，说“不会的”，接着把话题叉开。先生问我《李贽年谱考略》何时出版，我告诉他我已看过三次清样了，先生说要催一催，使它快一点出版。先生还念念不忘他有一门《三礼》至今未传，说他打算出院后招一名《三礼》研究生，并说已拟好了招生计划。我多么希望医师先前的诊断是错误的，即使先生真的是患了不治之症，我也希望医生能妙手回春，创造奇迹，把先生从死亡的路上夺回来，让他得遂心愿，把《三礼》这门绝学传授与人，这样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就更大了。7月下旬，我为点校《杨龟山全集》到将乐、厦门去查书，原想早点回来看先生，不料28日下午在厦大一位教师家里，突从电话里听到了先生逝世的噩耗。我竟然不能再见先生一面而别！这太意外了，我太对不起先生了！于是我决定中止访书，第二天即从厦门赶到泉州，然后又从泉州赶回福州，参加社会各界为先生举行的葬礼。我含泪写下《哭吾师黄寿祺教授》一诗：“二月诗呈万里行，讵知今日哭先生。文章泰斗人归去，学术生徒孰作成！天地既经生大德，鬼神何遽夺精灵。春风桃李年年发，卅载深恩那忘情。”又写下挽联一副：“化雨特霑永怀手泽，春风长坐痛失良师。”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悼念与哀思。

先生走得太突然了，一切都变得太突然了。先生答应我要写的和诗还没有作，要书幅的大字还没有写，先生要传授的《三礼》还没

有开讲，先生的愿望还没有全部实现，先生哪肯离开人世！我又哪敢相信先生已经真的离开了人世！

意园灯火夜夜依旧，先生仿佛还在案上埋头董理旧业，仿佛还在窗口仰首吟咏新诗。先生没有死，先生永远是我心中不死的巨人。

1992年9月

林海权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永 久 的 怀 念

——忆黄寿祺教授二三事

王 惠 廷

黄寿祺教授是我的恩师，我不仅是他的学生，而且曾当过他的助教。恩师对学生的一片深情和他的崇高品德，令人终生难忘。

几十年来，黄老一直担任我们中文系的行政领导工作，事务繁忙，常是行走匆匆。他还亲自担任我所在年级的古典文学课，直至毕业。最难忘的是毕业前夕的那最后两节课，36年过去了，可至今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天，黄老提前来到教室（平时因行政事务忙，只能匆匆按时到教室），把我们已很熟悉的那个旧皮包放在讲台上，深有所恋地看着大家。钟声一响，他便深情地轻轻地说：

“同学们，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了。毕业后，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啊！”

说完，他便转身疾速地板书，继而如往日般细致地讲起课来——似乎是要把一生的渊博学识，在这最后的两课时里，全部灌注给我们。

疾速地板书，滔滔地讲述，一次又一次地交替着。

下课的钟声响了起来。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像都德《最后一课》里的汉麦尔先生下课时那样，怀着惜别深情，把教室里每张熟

悉的脸孔都审视了一遍，最后低声地说：

“同学们，教了你们3年，现在你们就要毕业了……”他哽咽了一会，接着说：“今天我是你们的老师，将来，我仍然是你们的老师。毕业后，你们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写信来，我将尽自己的余年帮助你们……”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赶紧转过身去，向着黑板，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痕，随即低着头，拎起皮包，匆匆地走了出去。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低下头难过地呆坐着，我旁边的女同学，偷偷地用手绢擦眼泪。

毕业分配前夕，我与前两届毕业留校的一位老大哥话别，不知不觉谈到黄老对待学生的一片深情。他说：“黄老的学问、道德，特别是对待学生的真诚爱护之心，永远也难忘怀。”接着，他不无内疚地谈到自己在学生时代因出于无知而曾有过的对黄老的错误认识。那是解放初期高校教师进行思想改造时的事，他和同学们曾把黄老的《周易》研究当作封建迷信来批判，甚至粗暴地用亵渎的语言曲解他的诗词，贬损他的人格，气得他几乎要跳楼。然而事过之后，虽然伤痕未愈，他却像被不懂事的孩子误伤的慈母，仍然倾注他的一片爱心，耐心细致地教导他们。那时会议多，他白天开会，晚上备课常至深夜或竟至于黎明。上课时，他倾全身精力，深入浅出地滔滔讲述；下课后，常见他精疲力竭，困顿不堪。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一种无限感戴之情，深埋心底。

因工作调动，我离开黄老30余年，但每有寸进，他便加鼓励。10年前，赶赴福州开会之机，我提前去看他。他硬要留我住在他的“书巢”里——万册书室中备有一床一书桌，室中满置书架，如墙而立，其中几个书架所放的多是已毕业的学生们的著作，是呈请老师“赐览”的，这其中自然灌注着黄老的心血。

黄老的卧室里也尽是藏书，书橱顶上还放着尺把高的几叠稿子，我以为是黄老自己的手稿。黄老告诉我，这是新老学生们的论

著和一些《周易》研究者送来要求披览的文稿。我说，那么多的稿子，您年纪大，怎么看得了呀！黄老笑笑地说：“尽力量吧。”

5年前，一位年过半百的校友来看我，闲谈中话题又转到黄老身上。他说——怀着对黄老的深切感激之情——3年前，他写了几十万字的《乐府诗研究》，完稿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寄了一大本给黄老，请他指正。对黄老会不会把这一大本东西拿起来看看，他毫无把握，因为读书时他不过是系里的一个普通学生，而学生很多，黄老未必认得；即使认得，20多年了，他老人家还记得住吗？况且黄老年纪大，又担任副校长，事务繁忙，即使想看，恐怕也很难挤出那么多时间。没想到两个多月后，黄老把原稿寄了回来，不只朱笔眉批，细细订正了论述中的错处，而且连错别字都一个一个地给纠正了。这要耗去老人多少心血啊！

黄老的品德同样感人至深。

黄老是国内外知名的《周易》专家，“文革”时自然成了突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关“牛棚”、罚跑、“请罪”、戴高帽游斗……每日里要写检查，汇报思想等等，日子很难熬。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有的人为求自己的解脱，常常委罪他人，把和自己有牵连的事推得一干二净，甚至搞“莫须有”的所谓揭发。黄老虽身受迫害却从不委罪他人，甚至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以减轻他人之苦。如有一次造反派审查一位姓郑的教授，说他解放前曾教过国民党的“公民课”，要黄老出来揭发，以便给这位教授戴上“反革命”帽子。可黄老说：“这不是郑某的责任，而是我的过错。那时因郑某家庭经济困难，我是科主任，为了给他增加点经济收入，便把每周两节的‘公民课’安排给他教。这责任归我，帽子只能给我戴。”

这是何等崇高的品德啊！

黄老和一位姓程的老师同关一“牛棚”时，这位老师素知自己的主任为人忠厚，常放胆抨击林彪、江青一伙的劣迹。造反派得知后多次要黄老出来“揭发”。黄老深知程老师是很有民族气节的爱

国知识分子，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因不愿受日本占领军的侮辱而遭毒打，身受重伤。黄老年青时也曾投笔从戎抵抗日寇，所以对程老师这样的部下历来关心爱护。这时尽管造反派施加种种压力，要他“检举揭发”，他不仅不说，而且设法为程老师解脱——说他精神失常。结果自己受到造反派的加倍折磨。

.....

黄老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前年黄拔荆同志作有《鹧鸪天》一词，道出了广大学子共同的悲戚之情：“思往事，不胜悲。中宵无寐起徘徊.....”

黄老对广大学子的拳拳爱心，黄老为人的崇高品德，后人将永记心中。

1992年9月6日于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王惠廷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烈士老怀伏枥骥，盛时利见在田龙”

——深切怀念恩师黄寿祺教授

彭 一 万

黄寿祺教授是我的恩师和挚友。

我是1954年进入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当时，黄教授任中文系工作组组长（相当于系主任），次年，亲自教授我们的古典文学课程。且不说他渊博的学识和讲课的艺术，令莘莘学子获得高尚的精神享受，单是他那诲人不倦的态度、望生成材的心情，就足令吾辈非努力进取、刻苦攻读不可。他说：“我老了，但希望做一架人梯，让你们踩着去攀登高峰，青出于蓝胜于蓝，早日来接我们的班。”何等感人肺腑的话语啊！

我与黄老的深交，是在我患难之际。

1957年6月，我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即受到留校监督劳动的处理。当时运动不断，反右之后，又是拔白旗，又是反右倾，我生怕连累黄老，所以，再不敢与他来往，向他请教了。有一次，在图书馆后面的偏僻小路上，我遇上黄老，正想缩身旁逃，不想已被他瞥见：

“一万，哪里去？”

“上阅览室。”

“最近干些什么呀？”

“养猪。”

“还有空余时间吗？光阴不能浪费，须知，知识总是有用的，可不能自暴自弃呀！你还年轻，将来还有光明的前途。”

我一听，冰冷的心房顿时涌进一股暖流，好久好久没听到这种不加呵斥而带鼓励的话了，我的眼眶湿润了。

黄老继续说：“你想看书吧？我那儿有，你还可以找找图书馆馆长金云铭教授，他也是个学问家，有问题可以请教他。我可以向他说一声，借些书给你看。”

从此，我得到一本《教工借书证》，每次可借书 50 本，借期半年。我把这些书搬到猪舍牛栏、山头田尾，一有空闲，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次，我借了 50 本书，放入装饲料的麻布袋，正背着走出图书馆大门，不想，一位管理“右派学生”的干部，冲了过来，一把拽住麻布袋，喝道：

“你偷什么东西？”

“我没偷，我……”

“没偷？这是啥？书！偷书！右派分子偷书，这可是反革命报复行为！”

“我，我，我……”我心慌意乱，一时无以对答。

这时，金云铭教授走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呀？”

“右派分子彭一万不好好劳动改造，却跑到图书馆来偷书。”那位干部厉声说道。

“噢，不是的，今天图书馆有些书要移动，我叫他来搬的！”金馆长解释道。

“可是，他干吗把书装在饲料袋里呀？”这位干部还是想找出岔子。

这时，黄寿祺教授也走来了，见状说道：“一万，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应该去拿新袋子装呀！去去去，快去劳动，听金馆长安排，

把书搬完！”

金、黄二老套双簧似地把我从窘境中解脱了出来。

事后，金馆长提醒我：“以后你再来借书，要拿只大书袋，小心点好。你的情况，寿祺老师都告诉我了，你喜欢读书做学问，他要我关照你！”从此，金馆长还特准我进书库，包括善本、孤本书库，并教我一些版本学、目录学的知识。

两位善良长者的义举，使我没齿难忘！

时隔 26 年，我在厦门市旅游局任副局长，每次到福州开会，我都要抽空去看望黄、金两位恩师。金云铭教授仙逝后，我就只能去请教黄寿祺教授了。每次，黄老都给我详尽回答，指点迷津，道出要害。有几次，问题涉及久远的年代和偏僻的典故，黄老为了准确无误地回答我的问题，竟不顾年迈体弱，搬椅叠桌，翻箱倒柜，找出资料或原书。这种严肃治学、老而弥笃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先后收到黄老寄来的几本著作：1984 年的《楚辞全译》，1986 年的《六庵诗选》，1989 年的《易学群书平议》等。1984 年，他为萨镇冰的诗集《仁寿堂吟草》作序，也将油印本寄赠。我为《六庵诗选》写了一封信给黄老，他也将之收入有关《六庵诗选》的通讯集里。

我在黄老家中看到他为友人写了一些条幅，也希望他慨赐墨宝。我返厦数日，就收到黄老寄来的挂号信，原来是他书赠的一幅对联：

一万老弟嘱书因录拙句

烈士老怀伏枥骥

盛时利见在田龙

六庵老人黄寿祺时为丙寅春月年七十五

查此联出自黄老 1958 年写的《赴京道中寄怀院中诸老友二首》之二，第二句开头原诗作“清时”。这两句诗是黄老自我写照，

也是对诸老友的勉励,更是对我的鞭策。每见此联,黄老的谆谆教导便在耳际回响,催我自省,催我奋进!

1989年,黄老应邀赴美国讲学,从香港乘集美轮返厦时,我到码头接他。想到他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顾年迈体弱,不恤旅途劳顿,不由心生钦敬;但见到他面容憔悴、肌体清瘦,又顿生不祥之预感。

不料,我的不祥预感竟成事实。不久,便传来黄老病倒省立医院的消息。我特地两次赶到福州探望。第一次是1990年6月间,我走近黄老的病榻旁,但见他从半昏迷状态中睁开双眼,说道:“是一万吗?你来了,我恐怕不行了,但有你们一辈辈学生成长起来,我可以瞑目了!”说着,真的闭上了眼睛。我噙着泪珠,轻轻地抚摸着他那骨瘦如柴、青筋暴突的手,伏在他耳旁说道:“黄老师,我希望你好起来,再……”他没睁开眼睛,只是微微摇摇头,泪水顺着黄蜡蜡的脸颊流下来。此情此景,我的心都快碎了。

恩师虽已仙逝,但他的优秀品德与丰厚的学术遗产,乃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也肯定能发扬光大,悬挂在我书房里的他的亲笔条幅,放在我的“作者赠书专柜”中的他的著作,便是明证。

安息吧,我的恩师黄寿祺教授!

1992年10月22日于厦门

彭一万 厦门市文化局局长

时光磨洗不尽的记忆

——怀念之六先生

季 仲

我于50年代中期考入福建师范学院。在我的记忆中，寿祺师是少数优秀教师中最优秀的教师。听他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是一种艺术享受；每逢他上课，100多人的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人们屏息凝神，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那时，寿祺师才过不惑之年，但已是在高等学府执教了近20年的资深教授。他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还亲自辅导青年教师进修和给低年级学生授课，工作相当繁忙。因而，他到了应当发福的年龄，依然矮小瘦弱。那年的仲秋季节，寿祺师第一回给我们授课，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纽扣扣得整齐严密，脚下着一双白底青布鞋，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课时音量高低适中，言止温文尔雅，脸上的表情和蔼可亲。这一切，似乎都是出于一种为人师表的自觉（寿祺师终其一生，无论是处世还是治学，都是如此执著严谨、一丝不苟的）。这第一次上他的课的情景，已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他每一回都是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笑容可掬地回应了学生的问好后，就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当日所讲的章节的标题——尚未开讲，而那几行工整刚劲的板书，已令人肃然起敬——接着

即开始讲课。他从来不翻阅讲稿和讲义。这些东西被推到讲桌的一角，暂时成为无用之物。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西晋的“竹林七贤”，从初唐四杰到唐宋八大家，他都熟悉得像自己的老友，能有条不紊、滔滔不绝地把他们的生平遭际、思想观点、佳作名篇乃至品性轶闻，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如果硬要对寿祺师的授课横加挑剔，那或许只能在这一点上：一讲起课来，由于满腹经纶和博识强记，那语言的瀑布和知识的大河便遏止不住地飞泻流淌，激荡奔腾，因此，他总是对急雨似的下课铃声充耳不闻，一直到下一节课的任课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才兴犹未尽地匆匆走下讲台。

寿祺师授课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不仅在于知识渊博，更在于对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倾注着深深的挚爱。这种感情贯穿在每节课的讲授中，朗诵名篇佳作时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寿祺师有惊人的记忆力。四书五经中的名言佳句或精彩段落，他信口拈来，如数家珍。就是像《离骚》这样艰深难懂的长诗，他也娴熟于心，能通篇背诵。寿祺师那时正当盛年，嗓音脆亮尖细，在课堂上背诵古诗古文声情并茂。我记得，他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时最为动人，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闪着晶莹的泪光。年轻无知的我，不理解寿祺师讲课为何如此投入，后来才渐渐悟到，他不仅对国学研究造诣至深，而且吸收了古人的道德精髓。我想，将他列作当代儒学传人的优秀代表，他应是当之无愧的。

仿佛印证我的想法，不久，我就听到关于寿祺师的一些趣闻。其一是说，党总支的一位负责人找他谈心，启发他申请入党。他考虑再三，写了一份思想汇报给党组织。其中说到自己还不够党员条件，不敢玷污党的光荣；说到老母健在，而孔子有训：“父母在，不远游”，担心入党后万一分配什么远行的差事，他放心不下高堂老母。

我当然没有机会见到这份思想汇报，但我相信此事绝对真实。因为这些话除了寿祺师自己说出来，谁都无法杜撰。寿祺师事母至孝，三餐为老母盛饭，早晚向老母请安，有事出门必定禀告老母而后辞别。在为人子之孝上，他处处遵从孔孟古训，实在迂得可爱。

其二是关于寿祺师与其妻子的爱情故事。据说师母读书不多，是个家庭妇女，一直没有工作，且体弱多病。但寿祺师待妻子情深意笃，伉俪相敬如宾。1966年师母猝然仙逝，这于寿祺师不啻是致命的一击：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皂衣素服，清瘦的面容更显清癯。听其他老师说，寿祺师卧室内一直悬挂着发妻的遗像，一只精致的脱胎漆器骨灰盒里，贮存着一撮白灰——珍藏着一份深情——一直安放在寿祺师卧床底下。不知怎的，我常常做这样的想像：每日，寿祺师在晨光熹微中睁开眼来，深情凝视发妻的遗容——该有许多温情脉脉的絮语；而当夜阑人静辗转难眠之时——他在用滚烫的灵魂拥抱另一个冰冷的灵魂吗？这漫长的终生厮守，是一曲多么动人的爱情绝唱！

大学几年时光一晃而过，在师生员工多达上千人的中文系，我自然没有更多机会见到寿祺师。毕业后分配在《热风》月刊社任编辑，与寿祺师的联系却日益密切。60年代初有一个文艺政策比较宽松的短暂时期，因报刊上陆续发表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词，文学期刊便也跟着，常发些名家著的古体诗。我当然首先想到寿祺师，请他赐稿。这期间寿祺师在报刊上发表不少绝句和律诗，如《赴厦车中作》：“十年三度到思明，水国风光倍有情。淡扫黛眉山远近，乱堆云髻屿纵横。人归瀛岛千重驿，车接京华万里程。都会东南雄镇峙，海门伫看怒潮平。”《观中央歌舞团长绸舞》：“春江花月夜何其，仙子凌波振舞衣，曳地长绸三百尺，霎时化作彩云飞。”文彩斐然，意象飞扬，在车载斗量的今人古体诗作中，无疑是上乘佳作。那些年我与寿祺师有较多通信，且常不揣谫陋把

自己的习作呈他一过法眼。寿祺师总是每信必复，对一个后学青年寄予殷殷厚望。我的习作或信札上偶有错别字，他便圈圈点点，予以订正。他曾告诫我：“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是作家的老师，文字根基不深，是当不好编辑的。”可惜小子愚钝，文学饭吃了多年，不见大的出息，真是愧对吾师于九泉！

像许多专家学者一样，寿祺师在“文革”浩劫中也不能幸免于磨难。那时内子还在母校中文系任教，常常带回一些惊心动魄的信息。听说运动初写寿祺师的大字报并不多。他历史上清清白白，教学上勤勤恳恳，是中文系第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人们自然不忍把他列入攻击的对象。后来上头一再发动，指向寿祺师的大字报才“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据内子说，那些大字报格外有趣。有人揭发他推销“师道尊严”，回故乡霞浦见启蒙老师行跪拜大礼；有人揭发他对助教要求苛严，讲古典文学专著常常夤夜不息；有人揭发他要求学生背诵《滕王阁序》，背诵唐诗宋词，“把人引入封建死胡同”。仔细推敲，许多人是正话反说，小骂大帮忙，如果去掉那些吓人的大帽子而留下基本事实，寿祺师不愧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品德完美的好老师！

对这些虚张声势的大字报，寿祺师漠然置之。但是，在一次大批判会上，当一位青年教师批判他“整天鼓捣易经八卦，是一个只会搞封建迷信的算命先生，不配当社会主义的大学教授”时，他勃然大怒，大声呼叫道：“是的，我只是一个算命先生，满脑子装着封建货色，你们快拿锄头来挖吧！”他满脸通红，涕泗横流。说实话，我们当时对寿祺师的失态和震怒未能理解。直至1989年读了寿祺师惠赐的一册50余万言的《周易译注》后，我始了然。《周易译注》前言指出：“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20多年前在高等学府召开的大批判会上，寿祺师面对的是一群近乎

于思想懒汉的人们——而且偏偏是他的帐下弟子，他有理难辩，有嘴难言，于是痛心疾首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十年一觉‘文革’梦，野火烧尽又逢春。”70年代末，已被砸烂的省文联重新恢复。从那时起，文联立下一条规矩，即每年临近春节，要分头到在榕的文艺界前辈名流家中慰问拜年。我对长安山有一份特殊的深情，每年都跑这条线路，到寿祺师、元桂师及谢投八、曾雨音等老先生家中拜年，十余年来从未中辍。这时寿祺师已迁住对湖路意园教授楼。学校给他安排的新居还算宽敞、舒适。但是，室内排设的大都是超期服役的老家具。摆在客厅里的小圆桌、小茶几和一对扶手沙发，木头开裂，油漆剥落；寿祺师的卧室中，一直使用最老式的三屉桌和最简陋的架子床。如果一个陌生人初到黄府造访，一定以为这里住着一位清贫的小学教师。但是，且慢！你应当到朝南靠东的房间去看看。这个十多平米的房间，被寿祺师用作家庭书库。房内竖立着十多个一人多高的双面开架的书架，为数成千上万的精装书、线装书像忠于职守的士兵在书架上聚集列队。可以想见，寿祺师晚年是怎样日夜不息地著书立说。每一回与寿祺师握别时，心中总油然而生万千感慨：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富有，既是许多前辈专家学者的生存状况，又是他们安贫乐道的人格骄傲！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吧，在寿祺师大限将至之年，我们竟有一次前所未有的畅谈。1989年8月中旬，我在平潭岛参加一个笔会，适寿祺师率领省政协几位老先生到平潭视察工作。我们都住在县台湾同胞接待站。不期而遇在客次之中，便有更充裕的谈话时间。寿祺师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叫到他的单人客房，悄声问道：“这次你没有什么事吧？”

当时，一场政治风波刚刚过去，寿祺师说的“这次”不言而喻指的是这件事。我说：还好，还好！没事，没事！他又问起郭风、舒婷、张贤华、陈章武、袁和平、朱谷忠等等他熟悉与不熟

悉的作家，我一一报了平安。他好像心上放下一块石头，脸上顿时露出喜色：“这就好，我就放心了！培养一个作家多不容易啊，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毁了一个人才！”他的话滔滔然有如大江大河，我感受到老人心地的善良与思想的深刻。

万未料到，这竟是我与寿祺师最后的一次长谈。时隔未足一年，即翌年夏天，忽然惊悉寿祺师身患绝症，住院治疗。我与文联几位作家立即赶往医院探望。寿祺师穿着一身白色的病号服，除脸色浮肿，未见明显病态。他还从病榻上起身，坐在沙发上和我们寒暄。同时吩咐服侍他的侄子，拿出笔记本登记探视者的名字。这一细节，足够让我惊叹一辈子！死神敲门算得了什么呢？一个悟透人生的学者，仍然那么从容，那么严谨，泰然处之，一丝不苟！

一周后，听说寿祺师已动过切除手术，我和章武兄再次到医院探望。他明显地消瘦了，脸色苍白，静静地躺在病榻上。他一定知道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却格外看重年轻人的生命——一只枯瘦的手轮番握着我与章武的手，轻声嘱咐着：“你们还年轻，有许多事要做，身体，要保重！保重！”我悲从中来，忍住急迸欲出的泪水，有许多话想说却不知如何说。寿祺师呵，这些话应该是学生早早对你说的啊！你自己怎么就不知道保重呢？

净心修炼功德圆满的人生尽头，佛家称作涅槃，道家说是羽化，辛劳一生律己极严的寿祺师溘然长逝，我想应是一种人生的尽美与致美，原不该有大悲哀。但是当噩耗传来，我与内子仍潸然泪下，唏嘘不已。追悼会上，更目睹了罕见的大悲大恸。我看见许多吊唁者在向寿祺师致礼诀别时，泪湿衣襟，敛声忍泣。在这个年头离开人世，能享花圈满堂的隆重葬仪之荣，并不太难，而要赢得人们真诚的眼泪，则实在不易。我恍惚觉得，寿祺师正是在泪作豪雨、愁似浓云的昏昏冥色中，踱着循规蹈矩的方步，从容不迫地走向极乐世界。

逝者如斯，奈何奈何！一晃间，寿祺师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但先生留给我的记忆，有如淅沥淅沥的春雨洒在土地上，我的心田是愈加滋润而肥沃了。如果我的田园还能收获一点果实，我得深深感念吾师之六先生。

1992年中秋节·云中楼

季 仲 福建省文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但求永保童心在 绝假纯真志不移

——深切怀念寿祺老师

林 景 华

可敬的寿祺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在我的脑际萦回。由于和寿祺老师有亲戚关系，1959年秋我考上大学来到福州的第二天，就到他家看望。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亦亲戚、亦师生的交往。有几个假期，我听从他的劝告，没有回乡，就住在他家中。我们经常同床而眠、同桌而餐，还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使我有了更多领教的机会。在长期的接触中，他以自己的言行、自己的道德文章，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如何重道敬业、为人民多做贡献。

寿祺老师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我们国家、对中华民族、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怀着深沉的爱。他经常对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真了不起！在汉唐时代，就创造了那么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有两次他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有空时一定得去找一找唐代西安的地图来看看。在一千多年前，长安就建得那么大、那么雄伟，街巷就那么整齐，道路就那么宽敞，真令人自豪！”他还经常跟我谈起历代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文天祥尽节柴市、史可法殉难扬州，以及郑成功驱逐荷虏、黄道周慷慨就义等等，并经常吟诵或书

写他们的诗作以自勉或勉励别人。他经常深情地说：“不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要想征服我们国家、征服中华民族，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一定更有作为！”他一生创作了近三千首诗词，这些诗词，有的激情洋溢地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的尽情地讴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歌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诗中称颂毛主席“伟略功无匹，雄文力寡俦”；称颂周总理“鞠躬尽瘁为斯民，奔走瀛寰六十春。举世同声齐赞叹，无瑕白璧一完人”，“功同河岳壮，名炳日星光”。他一直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愿望。他曾为此多次和我谈起如何办理入党手续等问题，对党的诚挚、眷恋之情常常溢于言表。1981年“七·一”前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日献辞》一诗中，以“周甲芳辰同庆祝，民胞物与日蒸蒸”的诗句，歌颂了党的丰功伟绩，表达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还直抒胸臆写道：“我已行年垂七十，何期能作党婴儿。但求永保童心在，绝假纯真志不移。”一个热爱党，以七十高龄成为“党婴儿”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深情挚爱，几十年来一直成为他立身处世的信条。

过去，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易》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术权威，黄老师曾多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尽管如此，我在与他的接触中很少听到他的怨言。他总是心存“以直报怨”之念，往往把委屈、痛苦深埋在胸中，而不传播给别人。每逢受到什么“批判”之类的磨难，他回家来也默然无言，只是在吃饭时常要喝上二三小盅红釉酒或自己酿造的土黄酒。只有一次他很伤感地对我说：“喝点酒，我蒙头一睡，好把白天的事忘了，不然这日子真有点过不下去！”

1976年秋天，他听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喜讯后，欣喜若狂，并立即邀我欢聚干杯。他涨红着脸（这是我平时很少见

到的)说：“这下我们国家中兴有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和我国广大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一方面，在福建师大副校长这个岗位上埋头苦干，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方面，他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入党。当被批准入党后，他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对我说：“共产党伟大，入了党，我此生之愿足矣！”当时很多人向他求字，他最爱题写的是“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来尚著花”，这副对联表达了他壮心不已、要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的心迹。

入党后，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党性修养。就在他逝世前半年，他应在美国校友的邀请，赴美考察、讲学。许多朋友、学生劝他就留在美国长期讲学或开办一个《易》学研究所，他总是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行动要听党的，现在没经过党组织批准，哪能自己决定行事！”以此一一婉辞，并按期回国。

寿祺老师以治学严谨著称。不论是在家中还是走在路上，经常嘴上念念有词，反复背诵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些作品。他曾说：“古典文学的许多重要作品，我不但能从头到尾一直背下来，就是你从中间抽出任何一句，我也能顺着背下去。”他不论备课写教案，还是写诗作文，从不写草字，总是端端正正，一笔不苟。他说，这是为了对别人负责，让别人能看得明白。写作时，为了查一个典故或寻一篇资料，他经常亲自查阅大量书籍，所以，他书房里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他还喜欢将自己新写就的诗文向朋友、同事乃至学生征求意见。当人们向他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供他参考时，他脸上总泛起天真的笑意。

重道尊师、诚恳待人，是寿祺师感人至深的好品格。刚考上大学时，我对读师范专业思想上有些动摇。他就现身说法，以自己几十年的教师生涯教导我要安心师范专业，热爱教育事业。他经常以崇敬的口吻谈起自己如何怀念往日关怀、培养过他的老师。直到晚年他还努力整理一些老师的遗稿。他的一位老师过世后，师母生活

有困难，尽管自己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长期定时汇款接济她。对朋友、同事、学生，他总是真诚相待，敞开心扉说真话。特别是对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他总是谆谆善诱，诲人不倦。在当中文系主任时，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古典文学专业水平，他利用晚上开设了《古文观止》、《十三经》、《文心雕龙》等专题讲座，经常讲到深夜。他常挤出时间为青年教师、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青年修改诗文。不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凡是有人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与之倾心交谈，来访者莫不满意而归。他为此经常忘了吃饭。师母生前曾多次对我说：“他是个‘长屁股’（我们家乡的方言，比喻久坐不倦），一同客人谈起话来，就把一日三餐给忘了！”正因为如此，当时我们班上一些同学都爱到他家作客，都受到他和师母的热情接待。他总希望青年人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为此他曾多次告诫我：“做学问和做人一样，要诚实，要戒浮躁，要不怕吃苦。”并举自己结婚后曾连续多年不回家、只身留在北京做学问的例子说：“年轻人要有抱负，要志在四方，我那些年在北京就多读了不少书，多结识了不少学者。我劝你假期也留下来多读点书，多做些学问。”正是在他的鼓励、劝告之下，我住到他家，接受他的耳提面命。他一有空，就检查我的学习情况，甚至为我改正错别字。他真诚地关心、爱护青年人，而且终身不渝，就在他病危时，我和一些同志去医院看望，他每次都还很认真地说：“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不要多来这里，以免影响工作。”

寿祺老师一向关心他人，对教师尤为关心。当我被调到党政部门工作后，他曾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当教师出身的，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教育事业还很困难，许多教师的生活、工作还有很多困难，你要多关心教师！”十多年来，他经常亲自写信或找人为一些教师排忧解难。仅经他手转交给我要求帮助解决困难的教师来信就有十多封。

寿祺老师很重视修身、齐家，他待人和蔼宽厚，从不变色训人。

平时在家里，他很孝顺老母亲。三餐吃饭，如有好菜，总要等老母亲下箸后自己才动箸。有时因为有客人，老母亲不愿同桌，他就特意挟些菜肴留起来给母亲。对子女，他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慈父。不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我从未见过他斥责孩子，他只是以自己的才学品德对子女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感染影响下，他的一子一女也都为人踏实忠厚，并选择了人民教师这个职业。他对师母严惠仙的感情更令人感动。师母比他年长，文化程度不高，但贤惠、慈祥、俭朴，完全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老师很敬重她，在生活上完全听从师母安排，并经常在客人面前夸奖师母的贤惠。他还深情地将师母的名字改为“严蕙心”。60年代初，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寿祺老师被选派到北京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每隔几天就给师母写一封信，并在信中要求子女好好伺候祖母和母亲。不久师母得病，他在京心急如焚。后来征得组织上同意，提前结业回闽。归来后他到处奔波为师母延医诊治，或亲侍床褥调理汤药。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物价昂贵，为给师母治病，他不但自己减烟节茶，而且卖掉了许多珍藏多年的心爱的字画、书籍。1966年师母不幸逝世，他悲痛欲绝。他长期将师母的骨灰盒摆在自己卧室里以寄哀思。1976年，他在纪念师母逝世10周年的一首诗里深情地写道：“与卿死别十年春，愁见春花又照人。昔日音容常在忆，几时魂梦果相亲。”情深意切，催人泪下。

寿祺老师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的学生遍及八闽内外。我和他的许许多多学生一样，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位学问好、为人好的好师长。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将永远鞭策和激励我们努力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能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的人。

1992年8月

林景华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魂牵梦萦忆恩师

施 议 对

我出身贫寒，无有家学渊源，但我的师生情缘不浅，从小学开始，就一直遇到好老师。这对于我的学习与深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的多位老师当中，霞浦黄之六（寿祺）、永嘉夏瞿禅（承焘）以及海宁吴子臧（世昌）是我最为难忘的。他们把我当作亲生子女看待，我也把他们当作父亲一样敬重。而三位老师当中，六师和我来往的时间最长，前后相加，将近 30 年。

一

我是 1960 年 8 月考上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到了六师门下的。那时，全年级 8 个班，300 多位同学；全系 4 个年级，同学千余人。六师是系主任，大家都称他“黄主任”。黄主任未在我年级任课，到了第二年，才代替另一位老师，为我们讲《离骚》，整整讲了一个礼拜。亲聆教益，印象良深。黄主任的声音很清脆，声调很优美，加上形象、生动的分析，授课效果非常好，令全体同学赞叹不已。同学们不仅钦佩其学识、才华，而且钦佩其为人师表。许多同学都将黄主任当作自己学习的楷模。

上三年级时，我突然产生了偏科思想：决定专攻宋词，报考宋词研究生，并且悄悄做了准备。但由于根基浅，学习很难走上轨道。在自个儿摸索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前去拜访黄主任。那是在 1963 年的 4、5 月间，由一位霞浦籍同学相陪，我诚惶诚恐

地走进了黄主任的家门，向他请教有关词的问题。黄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先和我谈家常，安定我的情绪，而后认真地为我解答问题。黄主任兴致很高，答完问题后，并将诗与词作比较，为我讲述词的特点以及词的早期发展情况。这是我从事词学专门研究的第一课。

此后，我继续读词和有关词学研究的书籍，并曾一次又一次地登门向黄主任讨教。那时，我虽未曾说明准备报考的事，但黄主任还是十分认真地为我讲述所有问题。到了1964年春，我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于4、5月间接到通知，被初录为杭州大学宋词研究生（导师夏承焘教授）。一声春雷，全系轰动。黄主任非常高兴，亲自担任指导老师，帮助我写作论文。从选题到草拟写作提纲，乃至整个写作过程，黄主任无不亲作指导。我写成初稿后，黄主任逐字逐句地细加批改，并且提请系中全体古典文学老师审阅，而后又逐条一一指导修改。为了这篇论文（题为《龙川词研究》），黄主任曾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甚至生病住院，也将我的论文稿带到病房审阅。这篇论文对我最终被正式录取为宋词研究生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这也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因此学会了怎样独立进行学术研究。

考上杭州大学研究生，这是我平生最快意的时刻。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全系同学都为我欢呼。临别之时，黄主任特预备家宴为我饯行。那一天，黄主任先为我书写条幅——毛泽东新发表的诗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我和黄主任的爱女幼严在一旁，帮助铺纸磨墨。黄主任兴致勃勃，所写的字既有力，又很潇洒，写完后落款压宝，颇有点踌躇满志，只可惜误将“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句中的“无限”二字写作“无数”。黄主任自己未察觉，等我告诉他时，已来不及了。我很喜欢这幅字，说错了一个字不要紧，而黄主任一定要重新写过，并说：“发现问题，要及时说出来。”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而黄主任并无怪罪之意。席间，有说有笑，十分愉快。临

行之时，我送毕业照给黄主任，他也命幼严拿来相册，由我挑选。黄主任并预备了几封信，让我带交瞿禅先生和他的老师朱师辙先生，好友吴弗之与蒋祖怡教授。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尊重老先生、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对于老先生的思想观点，不要随便批判，不然就不会教你。

二

到杭州大学后，从夏瞿禅先生学习宋词。但真正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先是接受“革命化”教育，嗣下乡搞“四清”，接着就是“文革”了。但我牢记黄主任的话，诚心诚意地拜师求学，获益仍甚不浅。

十年“文革”，从大串连直到后来的“斗私批修”，我都曾积极参与，但对于批判所谓“旧文化”、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我则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走出校门后，我仍记挂着我的老师——黄主任和瞿禅先生。

1969年间，我获知瞿禅先生在嘉兴农村，但未取得联系，直到1973年间才接到瞿师的信。而与黄主任则于1971年间就取得了联系。那时，黄主任下放周宁，曾寄给我《竹枝词》10首和劳动诗章若干首。我写了一首七绝寄奉黄主任，诗云：“最喜先生写竹枝，盎然情趣我能知。何当遂我归来愿，摘易（黄主任书斋名——笔者）更听唐宋词。”黄主任随即赐和一诗，云：“喜尔生花笔一枝，能溶古典写新知。老夫耕罢饶诗兴，日盼飞鸿寄伟词。”接到黄主任的信和诗作时，我正在福建省三明钢铁厂公干，似已在工农兵行列。但是，我始终不相信“读书无用论”，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归队”，再到黄主任门下，听他讲授唐宋词。不久，黄主任从乡下调返福建师范大学，重理旧业，闻之，我极感快慰。

1973年夏天，黄主任与师大中文系师生到三明搞“教育革命”，曾到我家做客。那时，我刚有个家，居住60余平米的套房，生

活条件比高校好得多。经过“再教育”的黄主任，曾悄悄地对我说：“要是我就不走啦！”不过，他一发觉我信念坚定、决心继续以往的诗书事业，就积极想办法帮助我调往师大。

1974年9月，我奉调入省注释法家著作，为“福建省李贽著作注释组”的成员（此前，黄主任已先到这个组。我之加入工作，是他为我最终调入师大而做的筹划）。注释组一共十余人，部分为厅级和处级的下放干部，部分为高校教师（工农兵代表是后来才进驻的）。明祖凡同志任组长，计克良同志任党支部书记。下放劳动期间，黄主任被人们称作“老黄”，在注释组被叫作“黄老”，而我和另外几位他的老门生，仍然称其为“黄主任”。黄主任担任注释组中一个小组的组长，该小组专门负责注释工作，我就在这个小组（另一个小组是理论小组，负责写作评论文章）。

黄主任对工作极端负责，所有查书、注书工作，不仅自己带头做好，而且非常注重对组中每一个成员进行具体指导。对我这位老门生，更是从严要求。我因为在基层呆了几年，心比较野，喜欢“走江湖”，以为“半部《辞海》通李贽”，做起注释来，往往非常迅速，没有问题，自己也不太在意。黄主任则很细心，往往为我找出许多问题来，并常常告诫我：要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趁现在年富力强，要抓紧学习”，最好从经史开始，再攻子集。黄主任还处处用自己的行为为后辈树立榜样。比如，我们有问题向他请教，能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决不敷衍了事，而常说：“我查书看看再说。”有一次，黄主任突然叫住我，告以某字应该如何如何解释、有什么依据，并罗列有关资料，一一指明出处，而我则一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稍为一想即猛然醒悟：原来这是我几天前所提出的疑问，我自己忘记了，黄主任却一直记在心上。黄主任视力不好，看书有困难，写字也慢，却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后辈，他的这种精神，令我们几个老门生十分感动。

当时，研究法家著作、“评法批儒”，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但黄

主任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认真地问我：“陈亮和朱熹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场斗争？”这是针对我的《南宋时期儒法之间的一场大论战》而提出的（因为我在这篇文章中，将陈亮和朱熹划归两个不同的阵营）。我回答说：“认线不认人嘛。”这是当时的政治套语。黄主任听了，微微一笑，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应该说，我当时的思想，受“左”的影响确实比较深，只是还够不上“左派”的资格罢了。不过，黄主任和我们几个老门生，其实都是些书呆子，亦即“儒生”，从根本上说，大家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我们常常利用工余时间，一起在党校的校园里做“百步走”，随意交谈。

过去，黄主任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几乎都受到冲击。唯独这次“评法批儒”，并未被当作“儒家”而遭到批判。虽如此，黄主任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并不因为儒家受批判而将儒家的东西说得—钱不值。他对“批儒”有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曲意苟同；对所谓“评法”，也不愿跟着别人瞎起哄。有一次，我在黄主任的书案上，发现—本很久以前出版的《周易读本》（这是黄主任所心爱的—本书，是“破四旧”时偷偷留下来的，在当时，是极少有人敢于问津的），我好奇地翻了几页，对黄主任说：“这本书原来竟这么有趣，讲得很有道理，很好。”黄主任即刻回答：“当然很好罗！”但除此，就未再说些什么，可能料想我也不—定有勇气看下去。1976年，“四人帮”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天，黄主任和我以及另外几位老门生—起“百步走”，边走边谈，不知怎么的，竟共同“创作”了—首“诗”——某人（忘了是谁）说了第—句“迟群不迟”，黄主任即接上—句“小谢不小”，第三句是“先念不先”（可能是我续的），而最后—句谁也不愿意说出来，心里则个个明白，那就是——“小平不平”。当然，对于此类颇为敏感的问题，是不能轻易为外人道的。

在注释组3年，与黄主任朝夕相处：—起吃饭，—起工作，—起“百步走”，我们的心是很靠近的。这是另—种形式的课徒受业，我

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三

“四凶”覆灭，我准备重新报考研究生。黄主任知道后十分支持，曾对其他门生说：“议对很有志气。”我在备考期间，又有机会听了黄主任的一堂课，那是他为三明市中学语文教师所开设的中国古典文学讲座。黄主任就中国古典文学的概貌，从头讲到尾，讲得很周全并很有系统；通过联想、思考，我的有关记忆也全部浮现脑际，我的思绪跟随着黄主任在古典文学的王国中周游了一大圈。有了这堂课垫底，我也就顺利地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次当上了研究生。这是1978年间的事。

在北京深造期间，我仍不断从黄主任那里受到鞭策与鼓励。198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被分配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次年夏，黄主任率研究生晋京作学术访问，曾与学生一起挤公共汽车，从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到我的住处看望我和我的妻儿。那时，我住在东直门外西八间房，从西到东，要转三四次车，但为不耽误我的写作（我当时正赶着写作《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一书），他老人家不辞辛苦，亲自来。黄主任说：“能写出书来，比陪我游玩更有意义，希望能快点看到你的书。”记得那天，黄主任和我们一家人一道，自己动手，吃涮羊肉，大家都很尽兴。此后，我的书正式交付出版，我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1983年秋第三次当上研究生。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黄主任为了替他的老师吴承仕先生整理出版遗著，曾多次晋京，亲自主持具体工作。他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招待所，业务上虽有助手帮忙，但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都须自己打理。有一次，我见他一个人在食堂排队买饭，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他一心为着老师的著作，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其时，黄主任已年届古稀，却像以前初入师门那样，毕恭毕敬、兢兢业业

地工作；在他看来，尊师重道，这是每个人所必须具备的美德。

黄主任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既重师道又重父道，把一切都奉献出来，而自身之所求则很微小、很微小。黄主任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女，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但他总是把教书育人的大事业摆在首位。在家中，黄主任是个大孝子，一直将老母带在身旁奉养。但因他一心致力于事业，家庭重担便落在了师母身上。师母严氏，知书识理，未曾参与社会工作，全力主理家政。国家困难时期，她凭着自己的好手艺，将每月国家供应给专家的极有限的黄豆等制成各式各样食品，让一家人度过难关。这件事，直到师母逝世后好几年，黄主任还常常提起。“三反五反”时，“运动员”集中在一起吃住，不得归家，而偏在这个时候，女儿幼严出麻疹，他无法回家照看。结果，师母因过度操劳，患上了不治之症，幼严也因麻疹未出好而遗留下致命顽疾。“文革”前夕，为了医治师母的病，黄主任曾忍痛出卖自己积存多年的藏书，任人从书架上挑取，一共卖了800元，但卖书买药，仍救不了师母的命。1976年，幼严肾病复发，住入省立医院，黄主任拜托朋友，四处求医，幼严仍未能逃脱厄运。

痛失爱女，黄主任晚景颇显凄凉。有次“百步走”，黄主任突然提起瞿禅先生：“夏老好得有吴闻，要不谁来照顾他呢？”当时，我并不领会黄主任的话意，后来到了北京，看到瞿禅师处处需要吴闻师母扶持之时，方才有所省悟。后来，听说有人劝黄主任续弦，他都婉拒了。他常对人说：我70岁入党，70岁才抱孙——决心把余生献给中国共产党、献给教书育人的事业，同时也为子孙尽责，对自己的事也就不愿意多考虑了。

我在黄主任的关怀和指导下，断断续续当了三次研究生（计达26年，可谓高纪录）。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牢记黄主任的教导，真心实意地向老师求教，老师们也真心实意地向我传授知识。在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时，夏瞿禅师也住在北京，十分关注我的攻读

情况，我的指导老师吴子臧师带病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直到一切手续办理清楚，才住入医院。两位老师重病期间，我曾日夜守候在病榻边上，直到他们谢世。但黄主任病重，我则未能随侍左右，也未及见上最后一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我和黄主任最后一次相聚是在1988年冬天。那时，我应邀前往泉州参加李贽学术研讨会，路过福州，就住在黄主任家中，并和他一起驱车赴会。会议期间，黄主任和大家一起在泉州、南安一带寻找李贽的遗迹，一起探讨问题。黄主任兴致很高，曾即兴挥毫赋诗，并给泉州开元寺留下了“金声玉振”四个堂堂正正的大字。同时，黄主任还和我以及黄拔荆几位老门生合照留念。大家都为黄主任有如此健康的体魄和如此充沛的精力而感到高兴。此后，黄主任并往东北、西北参加学术会议，作学术考察，每次出游，都寄给我一批别有情趣的诗词作品。1989年秋，我因事赴闽，正巧黄主任出游未归，不得相见。次年春，黄主任赴美讲学，但归国之后，即发现患了胃癌，而且住入医院即告不治。那时正是福州的大热天，黄主任对身旁的人说，“天太热，叫议对不要来”——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在为他人着想；而我又错失时机，未能在他离世之前赶去见上一面，以致给今日留下肺腑之痛。

来到香港，四顾茫茫，我最崇敬的三位老师都已离我而去，我也被迫为谋稻粱之计，“朝九晚六”，每天忙得团团转，但黄主任的身影，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曾做过一个梦：黄主任正在为一幅画题词，而且所题之词就是《离骚》上的句子）。在我心中，永存着老师所传授的诗书事业。我将抓紧利用工余时间，勤奋写作，将老师的未竟之业继续发扬光大，以此作为对老师的最好的纪念。

1992年9月9日于香港“之敏求居”

师生情 忘年谊

邹宗彬

与其说是师生情，不如说是忘年谊。

在那运动接踵、校园不靖的大学年代，作为69届学生，我始终未在长安山的教室听过黄老的课。我知道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年所以闻名省内外，是因为拥有不少有成就的教授、学者，而在他们之中，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学至尊、易学专家，尤令我肃然起敬。

忘年友谊是在闽北建瓯“南雅山居”时建立的。《六庵诗选·山居集》中收录的《与邹宗彬夜谈》一诗（“北来欢聚复经时，忘却星星鬓有丝。别后应教长相忆，寒窗剪烛夜谈诗”），真实地描述了1970年福建师院搬迁南雅、我们共处一室时的韵事，表达了他对畸型年代产生的这段友谊的珍惜。

那友谊像南雅的雾，湿、冷、浓、重；像建溪的水，清、蓝、悠、长。

我和炳泉老师等四人住在山边一座木屋的二楼，睡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我与黄老比席。他很满意那种生活，在《山居集》中写道：“建溪曲折下延平，南雅风光倍有情。远瀨传声知夜静，晓窗迎雾卜冬晴。上山伐木夸身健，傍岸濯衣喜水清。学习勤劳消暮气，工农方向是前程。”

在夜里，在周末，我们常盘膝坐于地铺上，喝茶，抽烟，享受从镇上买回来的光饼，就像小朋友“摆酒仔”一样，津津有味，漫谈开

去。

我每次向他请教，不论是一个字还是一个词，他总会慢条斯理地引经据典，娓娓道出其原义、引伸义和有哪些不同说法，见于哪些不同版本，以及他自己的理解与见解。我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他居然说得 Those 典故在有关书籍中的页码、段落，所以大家都把他称作“活字典”。

由于典故多是古诗词中的字句，我便向他请教作诗。他显得兴奋，虽然一脸刻着象征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苦涩的相，但我读得懂他的丝丝的笑慰。他教我平仄、韵律，练字、练意……

我爱上了古诗词，开始学写诗，偶索诗句，就请教他。他亦将自己的诗句读给我听，并讲解如何推敲“诗眼”。记得《南雅山居》一诗的第三、四句原是“远瀨有声知夜静，晓窗浸雾识冬晴”。他说改了三个字：“有”改为“传”，“浸”改为“迎”，“识”改为“卜”；并说出改的道理，教我细细咀嚼。

他很珍惜南雅生活的感受，很珍惜我们间的师生情谊，临别时嘱我要记住这段友谊，并答应我他会作诗纪念。果然不久，我在家中收到从霞浦寄来的、用宣纸挥毫的《与邹宗彬夜谈》。

1979 年底，我到了香港。我们仍常有书信往来，我曾在香港报纸上宣扬他对易学的贡献。

黄老是位完整的学者，为了排印桐城马振彪老师的《周易学说》，他托我查找他阔别了四五十年的同窗、香港中南银行的孙羽侯先生。他在信中说，很想在有生之年办成这件事。1990 年他带领助手善文兄等一行赴美国讲学，途经香港时，终于与孙羽侯先生会晤。我为他们的会面感到高兴，我想他的几十年愿望可以实现了。记得当时他说，这次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大家都安慰他说：今后会经常出国访问的。因为说实在的，虽然他糖尿病较重，但看来药物仍可控制病情，而且看来精神很好（仍有一大串治《易》的计划）。他自己也一定没料到会去得那么急。在香港时，

他住在善文兄的妹妹家里，心情甚佳。当时他说为了纪念这次香港会面，他回福州后会为每人写一首诗，包括善文兄的小外甥女……那又是件很美好的事，我企盼着他寄诗来，岂料，等到的却是他病重的恶噩！

1992年7月27日于香港

邹宗彬 香港中国通讯社采访部副主任

立身应世本真淳

——记六庵先生二三事

孔 庆 洛

作为教育家、学者和诗人的六庵先生，一生以赤子之心待人，以直道立身，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不断追求进步，用自己的心血培养育人，研究绝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先生平时常说：“做学问先要学做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叨为世交晚辈，40多年中我受到先生的熏泽极多。现就记忆所及，记述先生平生二三事，借以表达对先生的敬爱和追慕之情。

先生出身于书香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在中小学读书时，即以尊敬师长称誉于乡里。其后，即使游学京师，执教高校，对早年的老师仍念念不忘，偶有回乡，必专诚拜谒，执礼维恭。记得大约是3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先生从北京归来，探亲之余，专程顶着骄阳来看望我的祖父孔楚舟先生（他们有师生之谊），入门一见老人即屈膝请安，这使当时正随侍祖父身侧的我十分感动，也在我童稚的心里留下难忘的印象。就在这之后的某日，先生去拜访许献其老师，他们适在路上相遇，当时天下大雨，路上泥泞不堪，而先生坚执弟子礼，撩起长衫屈膝下拜，置衣裤沾污于不顾，一时传为美谈。先生长期在外地高校执教，但仍坚持岁时修书问候老师的起居，对老师的子女就学就业问题也十分关心，许献其老师的子女生

活困难，他不断给予资助。老师们逝世后，他或为之整理遗稿，或为之撰写传记，总是认认真真，惟恐不周。即使自己已入古稀之年，仍耿耿不忘师恩。他认为师道至尊，培育自己之功不下于父母，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报答。

六庵先生笃于朋友之道也是有名的。杜悦鸣先生（福鼎县人）是他中学时代的同窗。毕业后，他们一起去北京投考大学。杜体质素弱，路上因舟车劳顿，突染霍乱，上吐下泻，病势凶猛。先生不顾传染，一直精心看护，即被病者所呕污物沾染一身，也绝无怨言。大学毕业后，他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但鱼雁频通，唱和不断。杜先生有“六年形影共，万里梦魂通”句即记其事。40年代初，杜倦游归来，六庵先生即推荐他到福建师专一起工作。不久杜因久患肺病不愈在家乡逝世，六庵先生不但远道奔丧，为之处理后事，而且还促请校方编辑出版纪念册，为其整理和保藏遗稿，其后他还不断给杜的遗属以生活上的资助。他们情同兄弟，生死不渝，比之古人羊左之交洵不为过。

六庵先生一生从教，数十年间“及门弟子逾三千”，但他对校外青年，特别是家乡子弟慕名而来求教者，也总是秉着“有教无类”之旨，乐于指导和帮助，为此往往牺牲有限的休息时间，甚至更深入人静时还为他们找参考资料，解答难题，批改作业。我有次去探望他，他特地问起一个过去曾写信向他求教、后来中断联系的南乡小学教师的情况，要我查查这位教师后来没有给他写信的原因。对于每一个愿意进取向上的青年，六庵先生总是这样地寄予关心。几十年来，他除了在学习上给我直接指导外，自己有文章发表或有专著问世，均亲自寄来给我。但由于自己学不努力，终无所成，真觉愧对先生。

先生的真性情还表现在他不畏权势，嫉恶如仇，思想与时代俱进。1935年，他大学毕业后初次回乡，被新开办的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延聘为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为了家乡教育事业，他放弃了

北京某中学的教职，欣然就任。时适县里兴建城关至盐田的公路，学校师生参加了义务劳动。上作文课时，他给学生出了个《修公路记》的题目。学生陈子英（后参加地下党，1948年牺牲）听说县长张灿等一伙人在征用土地雇用民工中有克扣补偿费和工酬以中饱私囊情事，极感气愤，就在作文中提出批评。先生阅后大为赞赏，当即加上“指陈时弊，痛苦流涕，可谓年少贾谊，允为诸生冠冕”的评语，并把这篇作文张贴在校内橱窗中。张灿获知，恼羞成怒，遽赴学校敲破橱窗撕碎作文，并妄加六庵先生以“赤色分子”罪名，勒令校方解聘，而且想进一步加害。先生经许献其先生等师友掩护和资助，得以脱身，辗转重返北平任教。先生临行前书写一副对联给我祖父，用的是杜甫的诗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其心情的愤懑于此可见。我祖父及朱蓬斋先生（亦六庵先生小学时老师）均赠诗加以慰勉。朱先生有句：“千金骏合市燕台”，用典十分贴切。

六庵先生于1945年回乡时，曾应邀参加了地方上的一次集会，以有慨于当时吏治败坏之日甚一日，在即席发言中，他希望地方有为之士特别是青年人，要有“獬豸触邪”的精神，敢于起来反对腐败的官风，振兴地方事业。作为一个人们公认的恂恂学者，敢于在公开场合说这番话，完全是出自于一个爱国教育家的良心。

以上所叙只是六庵先生早年的一些事，而且仅限于个人所知所见，不无疏漏，但已可见先生人格精神、道德风貌之光辉。

六庵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真淳为人和他精湛的著作一样，将永远垂惠后人。

1992年8月

党心国心 永沁后人心

——纪念黄寿祺老师逝世三周年

金 学 渊

黄寿祺老师用一生的主要时间研究易学，从事教育，作诗赋词，成为一位驰名海内外的易学家、教育家、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主义者。

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黄老建国前在福建师专任教时，就十分向往进步事业，爱护、支持进步学生。他的一些得意门生不少是我们地下党的领导骨干。后来我同他接触时，也经常听到他赞誉这些地下党学生的学识，并介绍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他赞扬我们党会集了中华优秀儿女，不但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也一定能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成功。

1978年以后，我同黄老接触较多，在筹组省社科联和首次组织制定与实施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时，更是经常联系。每次见面时黄老总是慈祥地和我畅谈一番，从他的话语中，我发现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特别有感情，特别充满信心。他多次说，现在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期，应该多作贡献。我从黄老乐观的谈吐中发现他更加贴近党，而且已经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经不断努力，他终于实现了夙愿，于198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自豪地说：加入党的队伍是我一生最重

要的追求，应该在余生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黄老在夫人、女儿去世后，身边只有一位男孩子。在他担任师大副校长时，正值孩子在师大中文系毕业，好友们劝他把孩子留在师大，既可作为他研究易学的助手，又可就近照顾他的生活。黄老却谢绝说：“我是党员校领导，不能带这个头。”最后还是让孩子分配到福州师专工作。黄老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足以让人敬仰。

黄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值得敬佩。他热爱祖国首先表现在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易经》汇集了我国古代人的朴素辩证法观点，黄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毕生主要精力研究这一祖国文化遗产。黄老常说，易学有丰富的古代朴素辩证法，要努力发掘，古为今用，弘扬中华文化；但《易经》是以宗教迷信为外衣的，因此同时要注意避免其副作用。

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他不卑不亢，更不为私利，而是一心通过科研成果的交流和广交朋友，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为振兴中华作贡献。就以他离世前到美国讲学为例，对那些有损国家利益的高额聘金，他不屑一顾，视为粪土；而对任何能藉以宣扬祖国优秀文化、赞颂祖国建设成就的机会，则一次也不放过，不论是讲学还是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总是理直气壮，侃侃而谈，一言一语，都饱含着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黄老还把关心、爱护、培育年轻一代，使其健康成长，视为爱国的实际行动。他常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热爱祖国就应该爱护青年人，关心其成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我在《福建日报》上看到某青年司机在黄老的帮助下自学成才、成为易学专家的报道时，深为黄老一心培育后学的精神所感动，对他这种爱国行动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黄老数十年如一日，不图名，不图利，为了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为着培育青年人而发奋工作，其事迹令人叹服。写到这里，不禁

想起鲁迅先生的传世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以为，这两句诗所体现出来的爱憎分明的情感与精神的、人格的力量，不也在黄老的一生中熠熠生辉么？只不过今天“横眉冷对”的是西方霸，“俯首甘为”的是党、祖国和人民的老黄牛。现在黄老虽然已离开我们整整2年了，但他这种忠诚于党和热爱祖国的党心国心，将永远沁润着在世的后人，并将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直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成和共产主义的实现。

1992年7月

金学渊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副教授

春风细雨忆红楼

王 筱 婧

如果真有“时间隧道”，能倒回到 1983 年，重历那一段诗情洋溢的生活，该多好呀！可惜这只是在科幻影视中才有的事，在 20 世纪的今天，还远未能成为现实。

当我偶有一缕诗情泛上心头，回忆便往往沿着一条时隐时现的思路，飞回到出差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一段如坐春风的日子，记忆中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和感激。

那是 1983 年。北师大要整理出版吴承仕先生的遗著，作为当年的吴门高弟，黄寿祺教授理所当然地成了主持这项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北师大便设法借调黄老北上。当时，我们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易学研究室”一共就 3 个人：黄老、张善文君和我。主帅出征，左右自当追随。4 月份，我们一行 3 人便首途晋京了。

我们住在北师大“小红楼”一号楼的楼上：东南角的一大间作为黄老的卧室、办公室兼会客室，紧邻着善文君的房间；我则住在通道尽头东北角的一个小单间里。这里环境幽静，不同于校内的其他招待所。

我们都埋头在自己屋里的办公桌上，不多外出。但善文要跑外勤，必须常去图书馆找资料。我则除了参加我们的集体活动外，不常有单独出游的兴致。说真的，此番重到京华，无复昔年初出校门首次入都时那样的兴奋了，前度刘郎，心弦上弹拨出的已多为苍凉

感慨之音。我原也希望能邂逅几个当年的同事，看看久别之后他们变得怎样了。遗憾的是，一个也没碰见。其实就是碰见了也未必相识——20余年的雨雪风霜早已把我们的鬓发容颜都化了妆，已非本来面目——所以我也懒得为追寻旧时踪迹去挤电车了。黄老更是少出，他老人家镇日伏案，而且夜以继日，晚间工作累了，就关灯睡上一觉。往往到夜阑人静，正是大家要歇息的时候，黄老的房间里却亮起了台灯——他又起来执卷握管了。

一个静谧的周末之夜，黄老打发善文君来唤我。

黄老正在灯下补书，善文在旁帮着。

“黄老，什么事？”我一进屋就问。

“没什么事，今晚是星期六，休息休息。你最近有写点什么吗？怎么？现在不写诗也不填词了？”老人家今晚似乎心情特好，一边糊补着破书，一边慢条斯理地说。

我愕然了。是的，这些年来，我似乎灵感枯竭了，诗情消失了。由于命运的捉弄，我一直被困在一个可怕的梦魇里，现在好不容易才挣脱恶梦的魔爪刚刚醒来，还没回过神呢。哪来吟咏的闲情？

“清明早过去了，春天也结束了，过些天我们该去陶然亭走走，怎么样？”黄老边补书边闲聊，同时低声地吟哦起来：

“听风听雨过清明，……底下是什么？”

“愁草瘞花铭。……”我机械地接了下去——我向来不大爱读梦窗词，但这首《风入松》是名作，所以勉强还记得。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还有呢？”黄老吟声断续，又在发问。

底下自然就令人想到那句了：

“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

背完《风入松》，黄老依然手里不停地摆弄着纸、刀和浆糊，修补着书页，口里也不曾闲着，又哼了起来：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

噢，这不是过去广为流传的陶然亭香妃冢的铭文么？大概刚才提到要去陶然亭，所以先生的思绪就飘到那儿去了。只听黄老又问道：

“底下还有什么？嗯？”

“郁郁佳城，中有碧血。……”幸亏这是我青少年时期背熟了的，至老未忘，不然真要接不下去了。我一直背到“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才停下。

这是怎么了？今晚把我唤来，就为了背诵这些？干吗老背书？哦，是了，我终于明白过来，这也是一种“考核”嘛；而更主要的是，黄老在设法带我进入前人的作品，好让我在这些作品的艺术氛围与境界中得到美感的滋润，以唤回自己心中似已消逝的吟情。啊，黄老，谢谢您了，尊敬的良师！

星期日，小红楼周围悄无人声。我坐在自己房中临窗的桌前工作。此时细雨初歇，空气像被洗过似的清新。窗外树影参差，浓荫摇绿，枝头鸟语啁啾，十分悦耳。轻风挟着残春留下的余寒，也捎带着花木的清香，徐徐吹入，令人精神一爽。蓦然间，一种沉浸溶解于美的意境中的感受，衍化成一股缥缈超脱并带着些铿锵音律的思绪——有点像是永叔所谓“细似轻丝渺似波”者——竟汨汨而来，仿佛从遥远的天际沁入心坎——被昨晚吟诵梦窗词所牵回的一点诗情，在我心中激荡回旋，渐渐地涌向笔端，化作稿纸上的一些零词断句，把它串起来后，却成了一阕《浣溪沙》——

时鸟枝头送好音，廉纤雨歇薄寒侵，湿云风约酿轻阴。小院春归花寂寂，红楼人静思愔愔，京尘不到玉壶心。

词固下里之音，不足道，但这是另一回事；我在词中所要表述的是：黄老那种别致的富于启发作用的诱导方法，就像那当春好雨，润物无声。此后我陆续寄情楮墨，略有吟咏，每当把笔之顷，心中总因深受引导之惠而充满对先生的感激之情。

黄老极忙，不但忙于伏案，还要忙于接待来客，难有闲情做诗。记得大约就在上述那次“背书”后不久，承段亦凡老师（黄老早年执教京华时的女弟子）盛情，约请我们3人去陶然亭吃午饭，归来后，黄老立即紧张地工作起来，一改过去每出游必有诗的老习惯。我看着颇觉纳闷，忽然有了个主意，也想激发激发他老人家的诗兴，于是便胡乱诌了几句，呈与黄老博哂，也不知可否充为引玉之砖——

春归无处听莺啼，闲踏城南旧雪泥。见说陶然亭上事，不堪重记壁间题。

往事无痕水逝东，笼纱题壁已成空。名园生色知谁待？好句长留待六翁。

黄老看了，无奈地一笑。吃饭时，他皱着眉头叹口气道：“咳，我白天黑夜脑子里想的都是吴先生的文章，竟然一句诗都没有了。”话是这么说，但他毕竟是诗坛宿将，在休息的间隙，到底还是“挤”出了一首纪游的七律来（后收入《六庵诗选》）——虽而老才思犹捷，于此可见。

北国春迟，南方已是初夏，而春明门内，却才见飞花落絮。北师大校园中有一条柳径，柔条夹道，翠色氤氲。值此东风作絮时节，你若漫步园中，那片片团团因风起舞的柳絮，白如雪、软胜绵、轻似梦，蒙蒙漫漫，将扑在脸上，沾在衣上。一时间，古人词章中所有描绘飞絮的清辞丽句，都一齐奔凑到眼前来，即使你不是骚人墨客，也会感到，此情此景，分明不是诗中，便是画中。然而丹青妙手，从来难写杨花，它的风致虽不能入画，却能引发诗人的灵感。作为一个易学家，黄老年年月在探研阴阳之理、乾坤之秘，但他同时又是诗人，自然尽可能不失时机地捕捉周围环境所启迪引发的创作灵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黄老虽然工作繁忙，少不得有时也要忙里偷闲，把眼前风物所传递的唐情宋韵、逸致幽怀都拾掇起来，纳入诗囊。

岁月如飞，一晃就过去了9个春天。又到了满园桃李成荫结子

的时候,又是轻寒漠漠、细雨潇潇的光景,不由得又记起那明窗净几、树色迎眸的小红楼,黄老补书曼吟的情景宛然在目。可是,真不愿相信他老人家已西归天上,这么快地匆匆远去了。

黄老走了,走了近二年了!无边丝雨,细织着无尽的哀思和忆念,但愿能随风吹向那渺茫遥远的世界……

1992年黄梅时节脱稿于“五凤楼”

王筱婧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追 念 黄 老

林 玉 山

黄老走了。他老人家是在1990年7月28日上午9时20分走的，然而我得知这个噩耗时已是中午了。我立即赶往省立医院，去和他告别，去瞻仰他的遗容。他还是生前那样安详、慈祥、和善，但再也听不到他谆谆教诲的话语了。我内心阵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眼前的一切，顿时模糊起来。

黄老病重住院期间，我曾去医院看望他几次，但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那时，我曾和陈庆武老师商量，带个照相机，拍下黄老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些镜头，以作纪念，但他却匆匆地走了，好悔改呀！

我和黄老交往的时间不长，但感情非常深厚。我在上海获得硕士学位后，1981年分配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福建师大几位老师在我们辞书编辑室出了一本《古代汉语习题集》，我们请黄老写序。现在我还保存着他1983年3月19日手写的序，字体是小楷书，非常工整，表现了他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他在序文中倾注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此书之可以供中学语文教师、高校中文系学生以及社会青年自学古代汉语之用，固无疑也。余幸获见此书之成，而又喜得先读也，奚为之序而归之。”

1988年，我和编辑张仰望同志组织编写一部向学生介绍诗歌的工具书《学生古今诗词鉴赏辞典》，请黄老领衔编撰（他写了《离骚》等篇）。后又请李乡浏老师代向他求篇序文，他也欣然同意，于

1988年7月12日写来了序言。序言中说：“这些鉴赏文章，既言简意赅，有的放矢，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本书对于广大青少年学生，无疑有其指导和启迪的意义；对于社会自学青年，对于喜爱文学的读者，同样也会有所裨益的。”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之情，跃然纸上。

1988年底，我开完全国第二届辞书出版规划讨论会回来，准备按会议精神，与几个辞书界的同志筹划成立福建省辞书学会，我想请黄老担任学会顾问。黄老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忙，但为了支持福建的辞书事业，他还是答应了，并在成立大会上写了首贺诗：“闽中昔号辞书府，著述人才会更多。开拓继承相炳耀，永留鸿业壮山河。——福建省辞书学会成立赋此庆祝。”黄老这短短28个字的诗，表达了何等丰富的内容——有对福建辞书历史的回顾，有对福建当代辞书界的赞扬，更有对发展福建辞书事业的厚望。

黄老常对我省辞书工作者说：“辞书是一大建设工程，有志者多多戮力，出些好工具书，对于社会，对于读者都有裨益。”黄老是我国知名的易学专家，他曾述及“要编一部《易经辞典》，我们闽版辞书应有闽地特色”。在我们辞书编辑室的选题里，就有《易经辞典》这个题目。但是，黄老精心构想、矢志主编的《易经辞典》还未能成编，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省辞书事业的重大损失。

1990年7月16日至20日，省辞书学会举行辞书选题、辞书学研讨会。18日下午，学会负责同志和一些会员，以及应邀与会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省辞书学会副会长刘学林先生，一起到省立医院看望黄老。黄老挣扎着颤颤巍巍地从床上坐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我们向黄老汇报研讨会情况，他聚精会神、饶有趣味地听着，说学会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预祝学会组织编纂的《辞书学概论》能成功编纂面世，为学术界填补一个空白。他还拿出一本刚从北京寄来的厚厚的辞典给我们看，这部《中国历代诗歌名篇鉴赏辞典》是由他和楚图南、赵朴初、臧克家、周振甫同志任顾问的。他还

表示,只要身体稍好,还要再编新辞书,特别是《易经辞典》。我们都劝他好好休息,保养身体,并祝他健康长寿。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想下床送我们出去,我硬是劝阻了他。他一直向我们挥手告别,并要他的家人送我们出去。黄老对学问总是孜孜以求,永不知足;对人总是热情谦逊,彬彬有礼,哪怕是在生命垂危之际(离他逝世只10天)。

黄老的追悼会,我们辞书室的编辑和省辞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参加了。编辑室和学会都送了挽幛、花圈。学会还送了挽联:“眷眷传道授业,呕心沥血,扶掖后生,堪称是鸿儒风范;孜孜论易改诗,继往开来,从肩前贤,无愧为一代宗师。”表达了我们黄老的深切的悼念和无限的哀思。

黄老和他的著作、他的精神,永存于我省辞书工作者心中。

1992年9月

林玉山 福建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

留取丹心照后人

——忆六庵老人

李悦照

我挚爱的老岳父、可敬且可亲的师长六庵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那一桩桩往事，令我难以忘怀。他50年如一日在教坛上辛勤耕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是珍惜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致力整理祖国的文化遗产，培养“四化”人才，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几至忘我的境界。我记得，1990年3月底，他访美途经香港回到福州，时虽已重病在身，但顾不上休息、诊病，即着手整理访美材料，起草给上级党委的请示报告，紧接着又抱病出席省政协会议，准备会上的发言稿。万想不到就在会议期间，正当他老人家忙得不可开交时，却被送进了医院。只短短的3个多月，一位壮志不减的老教授，在亲友、弟子的百般依恋中与世长辞了。亲情、师恩，更加深了我的哀思与怀念。

六庵老人是我在师院中文系读书时的系主任，在系里深孚众望，时常听到师生对他的赞佩之言。1970年，我同他的女儿幼严结婚后，于节日常回到他的身边。1976年幼严不幸病故之后，我遵照老人的意愿，依旧常去探望他。20多年来耳濡目染，身感心受，使我受益匪浅。他老人家对祖国、对人民的真诚热爱，他那竭诚关怀青年、致力育才的奉献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1970年，他已年将六十，却手持藜杖，被下放到闽东山区的周宁县碧岩村。他在偏僻的山村同农民一起生活了近3年，对山村和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六庵诗选》中的《山居集》便是这种情感的真实流露。其中《茶广山居即事》一词中的“春望秧苗早绿，夏期稻穗匀黄。时时农事关心事，祈雨复祈旸”及“采茶初了追肥急，又见打虫忙”等句虽简明无华，却让人真切感受到他老人家对农事至真至诚的关心、对农民艰辛耕耘的赞叹之情。

1972年秋，他从农村调回了师大，离开了碧岩村后，他依然心系农民，情依山庄。节假日相聚时，我经常听到他津津乐道碧岩村的轶闻趣事。他告诉我，有一次，两位农妇从小镇回村，走在前面的丢了一双旧拖鞋，找不着，说后面那位脚上穿的拖鞋就是她的，两人争执不已，告到了生产队里。他对丢了拖鞋的那位妇女说：“不要争，我出钱，你去买一双新的好了。”又有一次，一位农民来告状，说晒在外面的一条旧短裤被邻居收去了，而对方却不承认。他对丢失短裤的农民说：“我出钱，去买一条新的好了。”有人批评他是“和事佬”，不抓阶级斗争。而他却认为农民实在因为太穷苦，若不然，怎么会去争一双旧拖鞋、一条短裤呢？这不过是两则近似于戏谑的生活趣闻，可是他每谈起来，却总是那么顶真。他那息事宁人的处理方法，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的年代里，显然不合时宜，但至今回味起来，就犹如一泓清水，让人感到那么温馨。他还说，那时候农村瞎指挥、强迫命令风行，碧岩村一带高山峻岭，上级却下令一律种双季稻；而他从山区实际出发，暗地里让村干部自行决定种植品种，上级来人检查，他就打掩护。对此，他深有所感地说：“农民祖祖辈辈种田，辛苦啊，他们在行；而我只不过是书呆子。”话语中流露出对农民的无限深情，他那精神焕发的脸上仿佛透着丰收的喜悦。事实证明，山区光照差、气温低，在有些地方种双季稻确不如单季稻产量高。现在看来，这算是平常事，然而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候下（他又是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去接受改造

的)，他却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行事，确是难能可贵。所以当他调离碧岩村时，村民们都自发前来送行，挥泪道别，有位五保户还把自留地里还未成熟的花生拔起来煮熟了送给他，流着热泪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这几颗嫩花生，只是我的一点心意。”浓浓的乡情，他娓娓道来，是那样地真切感人。

他数十年如一日，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培育人才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为青年教师、研究生审阅、修改论文、书稿，经常通宵达旦；为了准确注明或核对出处，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去为他们查阅书刊资料，态度之认真、作风之严谨，着实令人钦佩！凡有青年学生或社会青年来信向他请教，他都能及时一一复信。有时我见他写到半夜三更，提出由我代写回信。他总是说人家从老远的地方写信来，不亲自回信感到没尽到责任。在长期的育人生涯中，他一向重视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他经常对学生说，要当一名教授、学者，就不光要有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知识，更要有良好的思想品质，不然写的文章再好，别人也不服气。他反复提醒弟子，文章要讲质量，要注意社会影响，切忌改头换面，一稿多投。发现学生的缺点、问题，他总是及时提出批评，不讲情面。即使在身患癌症、靠挂瓶维持生命的日子，对前往医院探望他的青年教师，他还反复叮嘱他们必须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在心力已接近衰竭、呼吸十分困难的时候，他还硬撑着同一位青年教师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再三教诲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应注意哪些问题，肺腑之言催人泪下。我在一旁听了，悲恸心情难以抑制，不由地想起了发生在“文革”后期的一件事：

1976年初“四人帮”刮起“批邓”的妖风，某教授写了一篇“批孔批邓”的长文，把邓小平同志与孔子连在一起批，得到“四人帮”的吹捧，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四处作报告。而六庵老人在中文系领导研究“评法批儒”的会上义正辞严地说：“我认为对孔老二要一分为二，这位教授的批判文章歪曲历史事实，一派胡言；邓小平

是共产党员，把他与孔老二连在一起批更是荒谬！”他还说：“我今天讲的话你们可以记录下来，以后再批判我好了！”回到家里他仍然愤愤不平。鉴于当时政治气候非常紧张——敬爱的周总理刚刚去世，邓小平同志再次遭到迫害；“四人帮”一伙“棍子”乱打，“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我们担心他老人家会再次遭到冲击，劝他讲话要注意，有些事不要太认真。他气愤地说：“我看到如此糟蹋历史，非常痛心。作为一个教授、学者，首先人品要正派。如果为了个人的目的而昧着良心去歪曲历史，他就是历史的罪人，应当受到谴责。”我想，他当时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维护历史的尊严，除了具有渊博的学识外，要主要是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正义感。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在关键时刻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从历史上许许多多正反面人物的行迹中悟出育人的道理：进行德育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远比传授专业知识更为重要、更为艰难。因而，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始终如一，念念不忘。

六庵老人在我省教育界、文化界有很高的声望，然而，他为人十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名人、老教授的架子。他是福建诗词学会会长，当他听说有些人不让别人修改自己的诗文作品时，曾感慨地说：“哪能不允许别人修改自己的作品呢？要发表就得让人家改，不然设编辑干什么用？我发表的文章、诗词被改动的不少，多数都改得很好！”是的，他写的文章、诗词稿，经常拿给我们晚辈看，还要我们坦诚地提出意见。因他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人便以为他受封建意识的影响一定很深，说不定还是位热衷于维护封建礼教的“老夫子”。这完全是误解。实际上，他是位非常民主、开明、感情丰富的老人，无论家里家外，可谓是尊老爱幼的典范。就拿处理子女的婚事来说吧，他的儿子高宪结婚前，他老人家一再对我们讲：“弟弟的婚事由他自己决定，家里人不要干预，只要他们两人满意、合得来就行。”我同幼严结婚前曾问过她：“我是农民的儿子，你父亲会同意吗？”她马上回答道：“我爸爸曾多次讲过，我的婚

事由我决定，他和家庭不干预。”事实也确如此。我们婚后，他老人家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1976年7月，幼严因肾衰竭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4岁。他老人家膝下只一男一女，幼严是他的掌上明珠。10年前老伴病故，离他而去，现在爱女又夭亡，其悲痛凄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曾在《哭严女》一诗中写道“坚忍哪知事可哀，掌中珠竟化尘灰。夜台好去寻慈母，为报阿爷也快来。”诗情凄惋，亲友们读之，不禁潸然泪下。然而就在幼严病故的第三天，他就强忍哀伤劝我：“幼严已死，你赶快重新建立家庭，你需要有人照顾。”尔后，我每次回去看望他老人家，他都一再催促我，并四处委托亲友为我物色对象，费尽苦心。后来见我拖了一年又一年，他生气地说：“幼严已死多年，你的婚事为什么一拖再拖？你可知道，我心里十分不安啊！”在他的亲切关怀和催促之下，我终于在1982年重新建立了家庭，他才了却了一桩心事。多年来，他对我和我的家庭关怀备至，把我们视为亲生子女，真是师恩难忘、亲情永存啊！

1981年，他在古稀之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他的儿子高宪也加入了党组织。他高兴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家里有三位党员，可以成立个家庭党小组了，你党龄最长，就当组长吧。”我笑着应道：“你是校长、师长、家长，我怎么能当组长呢？”他挺认真地说：“伙夫还当毛主席的党小组长，毛主席还向他汇报思想呢！你是政工干部，怎么不能当？今后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要指出来，不能讲面子呵！”。

六庵老人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祖国、对人民、对青年一代的一片丹心。

1992年9月

闽中宿学 陇上遗踪

——记随六庵师西行

郭 天 源

“何幸暮年能出塞，扶筇揽胜到三危。”这是六庵师以 75 岁高龄讲学西北期间，赴敦煌莫高窟时所作的诗句。1986 年 8 月，应西北师范大学的邀请，六庵师不辞辛劳，西上讲《易》，时随行者有我与其研究生郭建勋君。此次西行，是六庵师晚年的重要活动之一，其中包括实现了敦煌之旅的夙愿。

时序初秋的西北师大校园里，远道而来的南北两地专家，为新学年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气氛。来自北京的有，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袁行霈、现代文学教授谢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枫。而六庵师远自东南海隅之西北高原，行程最长，年事亦最高，且讲学内容是博奥艰深的古代经典《周易》，故备受人们崇敬。

六庵师治《易》数十年，早已享誉于海内外。能聆听六庵师比较系统地讲《易》，实属难得，尤其能仰见他晚年在讲席上的风采，更是不易。西北师大颇珍惜这次机会，希望让有关的中青年教师 and 研究生们多领受一些《易》学知识，安排课程的郭晋稀教授，事先转达了这个愿望，并征求意见。当我们正为六庵师的身体是否能适应较长时间的讲课而提出协商时，六庵师则当即很爽快地表示乐意多劳。事后，他对我们说，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讲学，不能有负人家的

一片诚心。我知道，有求必应是六庵师的一贯作风。从福州启程，途次上海时，六庵师就曾不顾暄气未收的炎热，欣然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请，为编辑讲述《易》理。初到兰州，又只稍事休息，就上了教席。

在一个多月的讲学中，六庵师以其精辟的解说和广博的征引，以及富有哲理的比喻，深深地抓住了听众的心，教室里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雷动，每堂课莫不如此。对于《易》学的源流派别，尤其是历代《易》家及其著述，六庵师如数家珍，并论得失，听者至为钦服。述及《易》学群书，六庵师择举精要，以示初学，认为：《十三经注疏》乃读《易》最要之书；次之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系辅导之本；再次有邵雍重于象数的《皇极经世》，程颐以王弼用老庄学说解《易》谓为非正统儒学的《程氏易传》，朱熹兼取邵、程之说的《周易本义》，以及李光地熔程、朱于一炉的《周易折中》等。同时他还指出，除来知德《来氏易传》有所突破外，其余均袭上者。关于学习和研究《周易》的方法，是六庵师讲学的最精华处，实际上也就是他长期研《易》的经验总结。其重点是，从源及流，强干弱枝，以传解经和明《易》例、揲蓍。六庵师特别强调干与枝的关系，提出学《易》首先要通读本文，然后遍览诸家古注、义疏、经说，并注重以象阐理，这是主干。至于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和其它自然科学与《易》的联系，统统属于旁及的枝叶。六庵师进而谓要搞清《易》理，明《易》例是其关键，如卦时、卦位、卦主和各爻之间的承乘比应等，此可先读王弼的《易略例》。而之所以产生老阳为九、老阴为六、少阳为七、少阴为八的揲蓍法，亦应了解，以助于认识《周易》的结构体系。六庵师的成功讲学，给西北师大带来了一个《易》学热。课后，在他下榻的专家楼客房里，执经求问者络绎不绝，六庵师都不厌其烦地予以热情解答。作为随行，我和建勋君在共同分担生活杂务之余，也有幸成了一名“旁听生”，还偶应提问。有时，亦充当一名业余“助教”，协助绘制课堂上用以示意的

《易》图。

此次作西北之旅，六庵师还怀有一桩积年的心事。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六庵师就读北平中国大学时，与一位年长他 11 岁的西北同学相友好，这位学友即后来成为甘肃教育家的李行之先生。两人初识于 1929 年，后在中大国学系同是系主任吴检斋教授的高足。西去的列车上，六庵师感慨地说：“50 年前，行之先生于兰州师范校长任内，约我前往执教，想不到当初未能成行，而 50 年后会去兰州讲学。若行之先生尚健在，那么今年已是 86 岁的老人了。”怀旧之情深切感人。许久，我才顿然领悟到此行的双层含义。

六庵师笃于师友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抵兰州的第二天，兼任西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的郭晋稀教授，应我的请求，专门安排了一个下午到该所参观、座谈。我在与副所长路志霄教授的交谈之中，知其曾受业于行之先生门下，于是即引见六庵师。从志霄先生那里，六庵师始悉行之先生已于 16 年前不幸殁于文革之难。不日，志霄先生遵嘱与行之先生后人及其门人联络后，陪同六庵师前去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凭吊行之先生。这天，座落在松柏丛中的陵园似乎格外肃穆，在行之先生的骨灰盒前，六庵师失声哭道：“行之兄，我太迟来看你了！”一时间所有的陪同者都为之动情，不禁泫然。这种感人的真情，使我更加仰慕六庵师身上所具有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德学品性。晚上，六庵师怀着悲痛的心情为诗一首，诗中写到：“恨我迟来十六载，临风雪涕赋《招魂》。”自是，六庵师始终关心着行之先生遗著的出版，再三敦促其门人尽快整理刊布，以慰亡灵。1988 年，由李鼎文教授等整理的行之先生生前力作《陇右方言发微》一书，正式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书首刊有六庵师所撰一序，其中亦记述了早年与行之先生交往的经过。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大型石雕“黄河母亲”像就竖立在市区河岸。9 月间，在西北师大和甘肃省文联的安排下，我们随同六庵师开始了难忘的敦煌之旅。由兰州至敦煌，有航空、铁道、公路三线。

对六庵师来说，无论是身份还是年龄，都理当乘坐飞机或火车软卧，但他选择的交通工具却是往还须行驶6天的汽车。六庵师似无长时间连续讲学的倦意，以学者的执著和诗人的激情，踏上了旅途。

汽车横跨黄河，沿河西走廊一路奔驰。车内，满头银丝的六庵老人神情专注，望着窗外的景致，随而口占一绝：“轻车冉冉出兰州，喜赴河西作远游。千里川原浑在望，寒云晴日水悠悠。”此前，六庵师虽未到过西北，然对这里的人文情况很熟悉，途中他不时对我们述介古代边塞诗人的作品及其轶事，并以亲历其境、情景交融而诗兴勃发。最见豪情的是，在嘉峪关，六庵师迎着塞外的秋风，登上了这座长城西端最雄伟的城楼，披览壮阔的风光，感而有作：

层楼杰阁耸云烟，天下雄关在眼前。

巍巍祁连峰上雪，滔滔讨贼峪中泉。

长城东去如龙体，远客西游正虎年。

俯仰山河今胜昔，登临能不赋新篇。

这首诗深为同行者所颂，研究唐诗的袁行霈教授尤以“长城东去如龙体，远客西游正虎年”赞为佳句。是日晚，《嘉峪关报》记者赶到酒泉宾馆采访，还录下了六庵师以高亢之声吟唱此诗的磁带。受之感染，我也率尔操觚，用此韵聊缀56字：“危楼拔地入苍烟，气壮雄关要塞前。戈壁黄沙融碧汉，祁连白雪映清泉。边墙断续留遗迹，卧石残横纪昔年。更有诗翁心不老，登高豪放唱华篇。”总之，一路上丝绸古道的驼铃、武威墓葬的铜马、酒泉汉军的传说，还有那莫高窟辉煌的文化和鸣沙山神奇的风谷……都一一移入了六庵师的诗笺，真可谓路行千里，吟唱不绝。

自敦煌的归途中，我们再度夜宿酒泉。六庵师仍诗情未已，灯下又乘兴作一绝句：“看罢敦煌窟莫高，浑忘千里路疲劳。酒泉重酌三杯酒，绝胜芸窗读楚骚。”按原定计划，返回兰州后，六庵师还要利用一些时间，为研究生们讲《楚辞》。诗云楚骚，即由此联想而成。

次日路过凉州，大家下车小憩，六庵师像是还在思索着什么，只见他翘首仰天——一群列队的大雁正徐徐而去，稍顷转身笑曰：“正为构思中的一首诗缺末句而发愁，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了。”随即出口吟诵：“西行两度过凉州，犹冀他年再远游。铜马凌空思壮志，心随大雁入高丘。”

1989年10月，六庵师的部分西行吟稿和我的几首拙作，同被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陇上吟》诗词集。谁能想到，尚不及一载，六庵师竟匆匆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后来一直与之保持联系的陇右友人。与六庵师告别那天，我在挽联上泣道：“讲经劳跋涉，每怀附骥辄深哀”——倾注了不尽的哀思并表达了对这段经历的永志不忘。今天，重读《陇上吟》中的作品，当年随六庵师西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因又“每怀附骥辄深哀”。一位友人曾这样对我说过：相信六庵师所希望的不是悲哀，而是他的精神能长存于敬爱他的人们心中。是的，六庵师的一生，真正地实践了《易传》上“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千古名言，他的精神与我们长在；那“讲经劳跋涉”的足迹，也深深地、永远地印在西北高原的土地上。

1992年10月

郭天源 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略述黄寿祺教授对语言文学教育的贡献

张 均

敬爱的黄寿祺教授逝世已经两周年了。但任凭时光流逝，他的师表风范，已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诚如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为编辑黄寿祺先生纪念文集征稿启》中所说的，黄老是“杰出的汉语言文学研究家、教育家，古典文学专家，又是功力深厚的诗人”。他的诗作，俞元桂教授和陈祥耀教授曾撰专文评论；他在“易”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福建师大张善文副教授也写过专文评介。我这里仅就黄寿祺教授在语言文学教育方面的成就作些回忆和叙述，遗漏在所难免。

我和黄寿祺教授相识是在解放后的1953年，那时我已从一个市属机关调到福州第九中学，担任文秘工作，并教高中语文课。我在大学里读的是法律系，在教学中常因感缺乏系统的语言文学知识而苦恼。因是语文教师，有带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育实习生（1953届本科生陈少卿等）的任务，而黄老那时是师院中文系的负责人，由此得以与黄老相识。我向他吐露自感知识不足、而想系统进修又受条件限制的苦恼，表示想到师院中文系旁听一些古代、现代文学和古汉语的课程。黄老欣然应允，并说：“条件差不要紧，只要肯苦学。汉代哲学家王充年轻时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就在洛阳书肆中看‘白书’，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写了著名的《论衡》，这不是一个好榜样吗？”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到师院中文系用了几

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俞元桂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黄寿祺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学语文课古代文学作品讲析”，以及张贻惠老师的“古汉语”等课程，得益甚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感激黄寿祺教授和俞元桂教授的知遇栽培之恩，如果不是他们大力扶植、谆谆教诲，我要想涉足语文学界，当何其难矣！

我庆幸自己能忝列黄老门墙，聆听他的教诲。我总感到，听他的课真是一种精神享受。他讲着讲着，便把人不知不觉地带进了作品的艺术境界。也许是他青年时期在北平住过多年，那略带闽音的京腔普通话说得清亮动听，朗读起作品来，抑扬顿挫，让人听得入神。至于他严谨的教风，就更让人敬佩了。有一次上《楚辞》课，黄教授讲《国殇》，讲到“车错毂兮短兵接”时，还把古代战车的车轮子的各个部位画了出来，指明那贯轴的地方就是“毂”，听课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很重视对作品思想性的讲解，结合文章的评析来进行思想教育，可是他从不架空说教，而是紧密结合作品内容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来讲。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在讲《国殇》里的诗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时眼眶充盈泪花、声调昂扬激越的神情；他的讲析，使我受到了一场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黄老的讲学，真如春风化雨，涓涓滴滴滋润学子的心田啊！

黄寿祺教授把教师的表率作用看得很重。他常说：为经师易，为人师难；教师要重视自己的学习，自己先学好，然后才能教好别人。当听到有人说自己学习条件不好，或没有时间，或地处僻远、求师不易等等时，他就举他的老师吴检斋先生的例子说：章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关在牢里时，吴先生当时是“法官”，竟到监狱里拜“犯人”为师，学而不倦，还将学习所得整理写成《葑汉微言》一书。黄老在课堂上讲过这个例子，在关于如何自学古典文学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个例子，在晚年所写的诗文中也多次谈到这件事。他在1982年10月写的《感赋》（绝句四首）中的最后一首里写道：“曾为葑汉记

微言，风谊当年世共尊。”在纪念吴先生的《关于先师吴承仕先生的材料》中这样写道：“……据此，则章先生正在幽囚作犯人时，而吴先生以‘朝元’兼法官身份，竟就狱中拜犯人为师，其好学笃志与高风亮节，实堪为当世师范，后生楷模！”

黄寿祺教授非常重视中学语文教育。他认为，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系既把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作为主要培养目标，就必须面向中学，联系实际，为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作贡献。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只要有所请求，黄老总是不顾工作的辛忙，为中学教师开讲座，做辅导；无论识与不识，凡是来信问疑，他一定有信必复，案无留牍，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

他常常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接受组织上临时交给他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教研、评卷、教材编审等任务，而且总是愉快接受，积极参加，乐此不倦，做出成绩。1959年11月24日到1960年初，教育部将全国中学和师范的语文教材的审订工作任务交给福建。省里成立了语文教材审订工作组，由萧文玉、陈以一同志领导，开展工作。黄寿祺教授担任高中语文教材审订组的组长，他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细，而且以他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渊博的学识受到大家的尊敬。一次在讨论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时，有的同志提出，这篇文章议论居多，不是典型的游记，是不是调换一篇记游的文章。黄老说：选择散文不要有太多的形式框框，更不要只限于写景抒情的。《游褒禅山记》议论精辟、富于哲理，而且叙事清晰、文字简炼，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宜选入课本让学生精读。黄老的话使大家信服，这篇文章终于保留在这套教材里，而且后来一直被选用。

每年高考评卷，他从不嫌弃那些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总是任劳任怨，善始善终。他觉得为国家选拔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每见到高考试卷中好的作文卷子，他总是高兴地向评卷老师推荐，说：“这真是一篇好作文，写得好！你们看看。”

有一年，高考的作文题是《记大跃进中的新事物》，一位考生描述了他家乡的山、家乡的路、家乡的人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文质并佳、感情深挚，黄老看后啧啧称赞，并叫人把这篇作文卷打印了分给大家传阅，建议评给高分，生怕这位考生的才华被埋没了。巧的是，这位考生后来也成了他的学生，毕业后黄老又推荐他往另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当助教。于今此君已是福建一位很有名气的散文作家了。当时我参加了评卷委员会作文组的工作，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由于他的课讲得生动深刻而富有吸引力，他的许多当了中学语文教师的学生，都殷切希望他介绍语文教学经验，尤其是中学古典文学教材的教学。1961年9月26日至10月12日，福建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学院在厦门国际旅行社召开省语文教学座谈会，特邀黄老莅会指导并在会上就此作演讲。他收集了许多材料，在会议作总结的那天（10月11日）上午，以《漫谈“如何研究中学古典文学教材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为题作了4个小时的发言。会后他又广泛征求大、中学教师的意见，对讲稿作了两次修改补充，在同年12月下旬写成论文，1962年3月又加以修订，发表在《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关于介绍作者生平及时代背景方面，第二部分谈关于解释课文题目与讲读课文方面。它是一篇语文教育研究方面的力作，至今仍富有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

黄老还多次在省政协会议上发言，以引起人们对加强语文教学的重视。例如他出席福建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就以《谈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各级学校语文教学质量的问題》为题作大会发言，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提高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他提出要从几个方面去做，首先要提高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师资质量，同时调整充实中学语文师资；要鼓励在职教师参加函授学习或参加业余大学学习、或脱产进修等，以弥补知识

缺陷。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寿祺教授的身心备遭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他不顾年老体衰，精神焕发地积极工作，说是要夺回丧失了的时间。他除了在福建师范大学担任副校长、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省政协、省文联、省社科联的会上，为开放改革、建设四化献计献策，其中心仍是谈人才的培养。如他在省文联及各协会拨乱反正、正式恢复活动的会议（省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曾大声疾呼要加快培养青年力量。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教育改革，粉碎“四人帮”后福州一中搞教改，曾试行自编语文教材。黄老撰写的散文《漫话福州》（发表于《旅行家》1980年第1期），被选入该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他十分高兴，多次谈及，并嘱我要来一本教科书看看。

黄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作的两次重要学术讲演及在讲稿基础上写成的两篇论文，也都是有关语文教学与研究方面的。

其中一次重要的学术讲演是在三明地区部分语文教师座谈会上作的，以“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学与讲授”为题，由三明师专中文专业的老师根据录音整理成稿；后来他据此改写，又在厦门、福州各讲一次，最后又经过认真修改，删去了关于“讲授”部分的内容，以《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学问题》为题写成论文，在学报上发表。这是1978年的事，距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后来我省《高教自学》杂志（中文版）负责人向他征稿，他又写了《漫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功问题》，分期刊载在该刊1987年第10期和第11期上面。

他的另一次重要的学术演讲是在龙岩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的讲话，题目是《漫谈福建历代著名的语文学家》（黄老很关心语文教学改革的乡土教材问题，他认为引导学生热爱乡邦先贤、热爱家乡，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后来他在原稿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以同样题目在福州师专作过一次学术演讲，由福

建师大中文系唐主华硕士根据录音整理(此文迄今尚未正式发表)。我曾亲聆这次演讲,它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条分缕析,黄老又讲得生动具体,使后学获益匪浅。

有的同志曾经表示过惋惜,认为以黄老的学术造诣,如果不把时间花在给许多人复信答疑、看稿改文和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等“琐事”上,他一定可以腾出时间写出更多的学术专著。但黄老从来不以此为悔,而一向认为这些工作是有益于人民的“基础工程”,并非“小事”,“没有铺路的碎石,何以成坦荡的大道”,他愿意为此作出奉献。

黄老一生著述丰富,我上面所提到的所作讲演及由此而产生的文章,仅是他所作所撰的极小的一部分。除“易”学论著外,黄老在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育方面也写了不少文章。黄老的诗文和学术著作固然令人钦佩,而他治学的精神更令人钦仰。他从不为研究而研究,也从不孤芳自赏。他关心的是他的学问是否对人民有益,并愿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与能够利用它的人分享,无论识与不识。

在黄老生前,我曾建议为他编辑一部《黄寿祺语文论集》交出版社出版。他表示同意,并将一些论文的校改本放在我处。黄老的文章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如果“论集”得获出版,我想是会受到他的学生和广大读者欢迎的(只是时下学术著作出版难,不知出版家有意事之否),它不论是对中学语文教师、文科大学生还是对中学生乃至自学者,都富有参考价值。学习中国语言、文学,读他的论著可以少走弯路,较快登堂入室。

黄寿祺教授的业绩与风范永存于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1992年7月12日

张 均 福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老树当风叶有声

——记黄寿祺教授

俞 元 桂

“秋田经雨禾添实，老树当风叶有声”，这是1961年黄寿祺教授《赴厦车中作》的诗句。我酷爱这两句诗，因为它既是写实，也含有哲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象征，也是颇可品味的；这不恰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吗？黄老在高校执教40多年，“老树当风叶有声”，这是人所易知的；“秋田经雨禾添实”，则未必为人们所了解。我与黄老共事多年，风谊在师友之间，乐于把我所知道的他的有声之实，撰文献诸读者之前。

黄老是福建省霞浦县人，生于1912年。幼年就接受了我国传统的古典文献教育，12岁，读毕《诗经》、《孝经》、《四书》、《左传》、《纲鉴易知录》等书。1929年进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再升本科，先后在学6年，师事行唐尚秉和、霸县高步瀛、歙县吴承仕、武陵余嘉锡、黟县朱师辙、长沙杨树达、瑞安林损、盐城孙人和、桐城马振彪、建宁范毓桂诸先生——多是一代宗师。比如尚秉和教授，原是光绪癸卯进士，桐城派古文家的后劲。宣统元年为京师大学堂教习，曾著《辛壬春秋》、《古文讲授谈》、《槐轩说诗》等书。60岁以后，深研易学，著有《周易尚氏学》、《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诸子古训考》等书，还著有诗集、文集、笔记、说部凡数十种。他尚精研禅宗，擅绘事，旁通医经及五行方技，文章美富，学术赅博，一时罕与伦比。高步瀛教授也是桐城派的古文家，所著《文选李注义疏》、《唐

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至今还是学人的必备书籍；他的唐宋诗文集注，博采众家，持论时有创见，引用历史事实、地理沿革、典章制度，态度谨严，材料翔实。“名师出高徒”，在经学、史学、诸子百家以及历代诗文、戏曲、小说等方面，黄老在大学时受到了良好的培养与熏陶。他在学6年，心无旁骛，未尝涉足剧场。直至毕业后，在学友的怂恿下，才去观赏了一次京剧。

黄老之于《易经》，本有家学，执贻尚先生之门，自然更为精进。他协助尚先生整理撰写《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左传国语易象释》诸书，并为《焦氏易詁》作序。他的三礼之学，则是受之于吴承仕先生的。故他又曾与尚先生和吴先生一起，为续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撰写“易”类和“礼”类的提要。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序言在述及此书的编撰者时，就把黄老的名字列于其中。1937年5、6月间，他在《北平晨报》发表《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这“三书”是他青年时期发表的最早论文，颇为学术界所重视，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博士所著《变化的书》，曾把这“三书”列入参考资料目录。这“三书”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的质疑问难、探求真知的精神。诚如尚先生答书所云：“然非执事，孰能有此疑，孰能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哉”（《答书一》）；又云：“易经既深有所入，即当继续用力，成此绝学，甚善甚善”（《答书二》）。这种师弟间有疑相稽、有失相求的精神，在他《与范秋帆先生毓桂论周易解卦上六爻辞书》中也有所论列，书云：“于先儒之说，近师之论，心有所未安者，亦不敢盲从附和，诚窃欲究明圣经之本旨，非敢师心自用，有意菲薄先儒，尤不敢故违师说以自立异。”这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抱负，允为学者的本色。

黄老的易学，有家传，有师承，更重要的是有着自己的创获。他最重要的著述是《易学群书平议》，此书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读一书撰提要一篇，先述书名卷数版本、作者事略，次及全书内容，最后论辨该书的是非得失。取材以原四库总目未收者为限，虽

已收而版本不同者亦间为论列。于教学之余,以 10 年之力,成稿 134 篇,厘为 7 卷。其师尚先生序云:“吾友黄君之六,从余游学十余年,于易攻研最久,所得亦最深,尝匡余之不逮;又尝慨易注之滥,作《易学群书平议》,凡解易之书,经黄君商订、解剖,其是非得失,判然立明,如镜之鉴物,妍媸好丑,毫无遁形,学者苟由其说以求之,绝不至有面墙之叹、歧途之入也,岂不懿哉!”序言评语是公允的,实非溢美之辞。《平议》于易学群书,搜罗宏富,辨析明确,扬榷是非,厘订得失,足见黄老壮年时渊博的学识和精审的功力。所以 1940 年,日本桥川时雄在所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对黄老当时的易学研究,有“精苦刻铭”的赞语。

对于易学,黄老原有志于著述《周易通考》、《周易集解义疏》、《周易正义》三书,以人事控僇,心愿未能完全实现,但已成的除上举的《易学群书平议》7 卷之外,尚有《六庵论易杂著》1 卷、《六庵易话》1 卷。其它如《历代易家考》、《历代易学书目考》、《汉儒说易条例》、《尚氏易要义》等,南旋后原稿均已散失。近年来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有《汉易举要》、《周易名义考》、《论易学之门庭》等文,并编有《易学初阶》讲义。黄老治易,有两大原则,他说,“一、从源及流。首须熟读经传本文,考明春秋内外传诸占筮,其次观汉魏古注,再次观六朝隋唐诸家义疏,最后始参稽宋元以来各家之经说。不从古注入手者,是为迷不知本源。二、强干弱枝。须知《周易》源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义理象数为主干,其余涉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炉火、禅家妙谛,与夫近世泰西科学者,皆其枝叶。不由根干而寻枝叶者,是为浑不辨主客”(《论易学之门庭》)。兼综汉宋,网罗古今,辨源流宗派,知家法师承,明主宾本末,这是黄老治易的特点。

黄老在经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于“礼”,有《丧服浅说》4 卷、《六庵读礼录》1 卷,还有《群经要略》14 卷(今唯后两种尚存)。其它尚有《宋儒学说讲稿》13 卷、《明儒学说讲稿》7 卷、《闽东风俗

记》10篇、《阿比西尼亚王国记》12篇等，惜今俱散佚。他对于每一种学问皆寻根究底，研典籍、释名义、知作者，进而阐大旨、述源流、辨同异、明功用、论文辞。因此，他的经学著述成了学人的津梁、深造的阶梯。

由于师承的关系，黄老学术上受清代的徽州学派影响较大。他致力于古籍整理，重视考据，溯源追流，辨析严密，“不好与先儒立异，亦不欲为苟同”。故能发挥师说，时有创获。他学识广博，基础扎实，施于教学，用于研究，故能左右逢源，广征博引，40多年来，深受学生爱戴。自然，由于受老师宿儒和流派的影响，黄老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有鉴于此，黄老在古稀之年，本着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于整理旧著之余，还带他的研究生，一起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周易》，发表了《“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一文，标志着他在易学的研究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黄老自1938年在他的母校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起，直到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在高等学校已连续服务了40多年。解放前，中文系科的学生人数有限，解放后，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而数量大增。1956年，他在《赴京道中寄怀院中诸老友》诗中，以自豪的心情写道：“及门子弟追洙泗，开国文章迈汉唐。”这绝非修辞上的夸饰。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当时黄老的“及门”何止此数。许多早期从学的青年，如今都已双鬓斑斑，他们回忆起如坐春风的岁月，神往眷恋之情不禁溢于言表。

勤于职守，乐于育才，是黄老教学的基本态度。据说解放前有一次，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缺少一名国文教师，他表示愿意承乏，这是一般教授所不屑为的，而他却乐于为之。他在高校讲授过《周易》、《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经史子集各项专书专题，以及《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和《诗选》、《词选》等各种课程。解放后，他长期担任系主任职务，每学期还要教两三门课程。后来，因年龄的缘故和教学力量的增强，他不用上第一线了，但他还定期在晚上给

青年教师讲授专书，常至夜分，孜孜不倦。

实事求是，是他的一贯学风。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是：一、文学所以言志、抒情、咏物、写景、记人、纪事，而最终目的在乎明道济世；二、温故知新、承先启后，有所革亦有所因，故一切学术均应虚心研究，继承优良传统并加以发展变化，以适应新情况、新要求；三、文附质，质待文，故文学作品要求内容形式并美。评价古今人物及著作，应在精研深思的基础上，不虚美，不隐恶，舍短取长，实事求是。黄老在课堂讲授、研究著述和问答解惑中，无不遵循这些观点。他教育学生：做学问要脚踏实地，要善于联系实际。

黄老讲课，精彩之处，对听课者来说，几乎可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享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细致的讲解和广泛的联系。有人回忆说，黄老上的《楚辞》课使他毕生难忘，因为黄老的讲授，实在是到了至详至善的地步（对《离骚》一篇，更是精讲细析。因为全部了解《离骚》的句义，对学生来说是最基本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达不到这点，就谈不上什么分析研究）。还有黄老的广征博引，也使听者极有兴味——它开阔了视野，增进了知识，有助于触类旁通，给培养自学能力以广泛的天地。

对学生极端爱护，严格要求，始终如一，这也是黄老教学的特色。学生的作业，他总是精批细改，蝇头小楷，工整秀逸；即使是白发萧疏的老学生的诗文，仍然费心推敲，从不马虎了事。为了解决某些问题，代学生查阅类书、工具书，总是不厌其烦。他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勇闯新路。自己的作品，更是传观斟酌、从善如流，树立榜样。对于来信请益者，不论识与不识，有信必复，凡是有助于人的，他总是不吝自己的精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黄老毕生的愿望。他的辛勤劳绩已结出累累硕果，八闽大地，教泽宏敷，面对成荫的桃李，老园丁感到无限的快慰。

黄老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以诗言志，寄情吟咏，写下了大量

诗词，已辑成的有《六庵吟草》，包括《北学集》（1932—1941年，内兼收少数少年时期之作）、《南旋集》（1941—1944年）、《海疆集》（1945—1949年）、《朝阳集》（1951—1970年）、《山居集》（1970—1972年）、《华香园集》（1972年以后）等，共收古今体诗千余首，又有《蕉窗词稿》一卷。我们从这些诗篇中，可以感受到黄老的内心世界，那就是他浓厚的国家民族之情、师友之情和对大自然的愛。

黄老在北平勤奋学习的6年，正值强邻虎视、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中，血性男儿，哪能心安理得。《瑞安林公铎先生辞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南归，赋此以送》（1932年）一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妖风起幽蓟，沙石蔽苍冥。日月晦光彩，山岳被膻腥。”他对侵略军蹂躏我国东北表示了无比的痛恨。国势阽危，使他深为忧虑，《不寐》（1932年）一诗云：“夜深不寐独徘徊，家国沉忧志未灰。明灭寒灯万籁寂，月钩一角过墙来。”我们从这静极的诗境中，不是可以感受到诗人胸中跳动着一颗热烈的报国之心吗？他在《丙子除夕得甘翁寄怀诗，赋五律四首答之》（1936年）中的一首写道：“昔日金汤固，于今破碎频。白河饮胡马，黄屋几生尘。苏武终臣汉，辛垣欲帝秦。鲁连今不作，蹈海说谁陈。”忠奸之辨，忧国之忱，跃然纸上。

事情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曾在《从军行》中吟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可谓石破天惊，出人意表。1936年8月，黄老也毅然投笔从戎，当时他虽在壮年，但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因此事属意外，但又非意外，这正是“夜深不寐独徘徊”的结果。他以甲等第三名考取冀察政委会大学毕业生训练班，在南苑接受军事训练4个月，结业后分发于第二十九军参谋处服务，专以收集有关抗日的资料为事。当然，他的报国壮志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供职半年之后，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经业师吴承仕、孙人和教授等的推荐，他回到母校国学系任讲师，在围城中恢复他的书斋生活。

1939年，他写了一首《秋怀》，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时代动

荡，抒发了自己的内心矛盾。这首五古稍为长些，但对了解黄老是有帮助的，所以照录如下：

流光疾如驶，倏忽又秋风，
波涛万事变，顾影尚飘蓬。
忆昔我生初，四海方困穷，
义旗举汉水，一旦树奇功。
清鼎既已移，民物庆大同，
岂期转瞬间，阊墙又兴戎；
自伐无已日，外侮亦交攻，
遂令民瘼丧，寰宇渐鸿蒙。
我生为男儿，岂无忧国衷，
百怀莫一遂，咄咄徒书空。
思随赤松去，栖迟碧山中，
犹怜头未白，不甘草莱终。
尚觊下邳游，幸遇黄石公，
汗马不辞劳，非为已穷通。

这首述怀诗，感慨良深。军阀混战，外患交侵，国步艰难，民生凋敝，他深怀不满，但无能为力；而归隐碧山，又非所愿。他爱国伤时，虽寄身学府，仍然不忘效命沙场。如果不读他的诗，谁能料到这个恂恂学者，竟怀有如此炽热的心。

1941年，他间关南归，执教南平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及仙游国立海疆学校。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环境至为艰苦，时局令他愁怀百结，而当政的腐败，更使他愤慨万分。《次三十感怀韵答卓剑舟陈吟秋》（1941年）中有句云：“空对青编怀彩笔，谁能赤手挽银河。伤心身世飘零久，到眼乾坤感慨多。”《次韵新月答槐轩先生》（1944年）中有句云：“别来罹百忧，万言难一布。执笔泪酸辛，启口恨凝互。观政祇货财，用人随好恶。万钱市片肉，千钱买一芋。颞首顺受之，敢笑不敢怒！水火予遗民，谁能乐生趣……”至全国

解放之后，他忧伤的诗情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躬逢盛世，黄老心情振奋，兴高采烈。这里选录两首，以见一斑。

述学衡文孰可宗，工农方向应追踪。
伟词自铸古无有，说论常聆愚亦从。
烈士老怀伏枥骥，清时利见在田龙。
休将衰鬓羞明镜，京国观光兴尚浓。

《赴京道中寄怀院中诸老友二首之一》1958年

下放言旋更岁月，州庠犹见旧楼台。
故人欣得仓山聚，新雨喜从浙水来。
脚底昔曾凌海岳，笔端老欲挟风雷。
休明鼓吹吾曹事，把盏联吟亦快哉。

《余从周宁下放归来，……喜而有作，次笠山韵》1972年

黄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情见乎辞。第一首写于“大跃进”期间，后一首写于“文革”末期。他虽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然报国之心并未稍减，坚信祖国必有光辉的前途，所以他以“休明鼓吹”作为自己的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颂诗就写得更多了。

如果说黄老解放后所作的诗只是一味的“休明鼓吹”，那也过于简单化了。他对一些“左”的偏向还是有所感受的，所以有些诗婉而讽，如袭用传统评语，可谓深得风人之旨。请看这些诗；

剑浦记初晤，榕城瞬十秋。
一见垂青眼，相看渐白头。
事同春意闹，闲忆少年游。
何日交心罢，西湖共泛舟。

《交心会议坐上初见展怀白发即席有作》1958年

经岁东归岭峤间，婆娑林壑亦闲闲。
喜无车马门前过，爱逐鸡豚栅里关。

积案有文谁共赏，充盘兼味固多艰。
故人天末还相慰，一读新诗一破颜。

《次韵答确斋》1971年

刺桐三度见花飞，愁坐晴窗对翠微。
何日书成了一事，呼朋痛饮笑谈归。

《感怀绝句》1977年

第一首曾被看做是对运动不满的诗作，因之不免产生许多是非口舌。把交心说成“春意闹”，在交心会上又心不在焉。故在朋辈中颇为流传，引为笑谑。第三首与第一首异曲同工：在“文革”中，他应召参加批儒评法写作班子，为李贽著作作注，竟然发愁，还想早了一事以解脱。第二首纯为实写，有些自我解嘲，读后不免令人若有所失。这些诗显然都有点皮里阳秋。当然，我们不能说黄老对当时偏向已有所洞察，但至少可以说，他写出了他对这些事的无理解。从这些细微处，都可以看到黄老性情的“真”。

黄老笃于师友情谊，数十年不衰。吟稿中，与业师尚节之先生和友人杜悦鸣、包笠山、黄荫亭、王确斋、陈喆庵等赠答之作甚多，遣怀述志，砥砺德行，遥寄相思，情深意切。如《次韵和笠山》（1945年）：“携手同登最上楼，爱将别绪话从头。忧时每觉乾坤窄，传业羞为升斗谋。却盼双鱼来朔地，愁听孤雁唳清秋。故园风物如无恙，欲整归装买桂舟”；《叠韵再和确斋》（1971年）：“操履平生慎染丝，盍簪丽泽又何时，常怀夜雨巴山句，愧读春晖寸草诗。轩冕浮名原可弃，钟彝盛业岂能期，征文考献谁同调，翘首桃林有所思。”两诗各有其时代背景，一作于解放前，一作于“文革”下放期间，诗情虽抑郁不舒，但均以事业操守相期，流露出来的是最诚挚的友情。

山水之作，吟稿中也不乏佳篇。解放后，组织上多次安排他至名山疗养，匡庐之秀、武夷之奇，长篇短杂、丽句清辞，充分表达了黄老对大自然的爱好。1961年夏，我与他同住武夷山疗养院，傍晚沿溪漫步，他即兴立成《晚眺三首》，其三云：“夕阳红映并莲峰，天

末霞光似醉容。吟眺浑忘归路晚，一钩新月上云松。”所写尽是眼前景物，他稍加点染，自然浑成，景色如画，心情闲适，悠然意远。时隔20年，诗的境界犹如仍在眼前。

黄老为友人诗集作序，往往自谦不善为诗。就我看来，他能为嗣宗的忧愤，少陵的沉郁，太白的飘逸；又能为牧之的清丽，石湖的平易。他的诗，接武前贤，义归雅正，才兼众体。黄老还著有《六庵文集》，与《吟稿》对应编集，他的古文受桐城的影响较大，这还是师承的缘故。

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人，许多人走着学者、教师兼诗人的道路，黄老就是这样，他热爱学术、热爱教育、热爱祖国，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堪为仪型。他的学术为人所敬仰，教学为人所赞誉，诗篇为人所传诵，由教授被选任为高校副校长，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恰似“老树当风叶有声”吗？他的成就，又和老师的教诲、学生的质疑、与朋友间的切磋，以及时代的严峻考验分不开的。他坚实地、稳步地、努力地走着漫长的人生的路，不断取得进步与成就，我看这就像“秋田经雨禾添实”。实至而后名归。他下放周宁茶厂时，叠韵和喆庵的诗至于六答，中有押“真”字句，如《三答》云，“学术端宜辨伪真”；《四答》云，“宅心处世但存真”；《一答》云，“短句犹能见性真”。学术的“真”，处世的“真”，诗情的“真”，这一“真”字又是他的“实”的灵魂。时代不同了，人们将经由新的道路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但黄老的求实、存真、立诚的精神，已在他的友人和学生的心田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不断地激励着他们前进。

1982年春

俞元桂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记与黄寿祺教授共事的岁月

吴 修 秉

这本《易学宗师黄寿祺》付印前，我读了全部书稿。由于我与黄老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一读就不忍释手；再则极愿此书能及早与世人见面，所以我搁下手边另外的事情，尽数日之功，一口气把它读完。这些书稿，都是黄老门生故旧所撰写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黄寿祺教授生平治学授业、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而至处理身边琐事的感人事迹，集中地、典型地再现了这位老学者迈步于人生旅途所秉承的诚实坚凜的气质。我读着、读着，在某些章节中见到生动体现这种可贵气质的文字，简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由得使我不时抽出手绢，去抹一抹自己眼角的潮湿。

我与黄寿祺教授交谊不算很长，但他却是受我尊敬的一位长者。“文革”后，福建省政协恢复工作秩序，他即被任为第四届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此开始，我与黄老有较多的工作接触。常于几席之间，共同探讨如何开拓人民政协文史工作新局面有关的诸问题。自第四届至第六届省政协，在这十余年中，黄老都是文史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每次开会，他都必到。在听取文史工作情况汇报时，他总是在本子上记个不停。他对文史资料的组稿工作，特别表示关注，总是尽其所知，从各方面提出组稿线索，供文史办公室参考。他曾说：抢救文史资料，是最基本的任务。要串门入

户去寻找组稿对象。中国是史料的大国，几千年来，流失掉的史料不知有多少？到现在能留下的那些杂说、琐谈之类的书，都被史学家视为宝贵的资料。而况今天人还在，一定要想法把他们身上的史料拿到手，我们于心始安。我曾向黄老征求过稿件，请他写自己立身治学、成为当代知名学者的丰富经历。我说这对教育青年一代，是个很好的教材。他却谦逊地说：“区区不足为人道，请假以时日吧。”我想，黄寿祺教授如果还健在的话，以其一贯重诺的精神，必定会为文史资料增添黄氏可贵之篇。

我与黄寿祺教授往来渐密，是在省诗词学会成立前后。我们几位都是创立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中华诗词学会宣告成立，黄老是学会的顾问，我是常务理事（当时每省有一个常务理事）。当我们着手筹备成立省诗词学会时，陈祥耀、蔡厚示、陈景汉、赵玉林和我等人常在仓前山意园，与黄老商谈筹备工作。1988年5月15日，福建省诗词学会成立，全省各地代表一致推选黄寿祺为会长。他广孚众望，领袖福建诗坛，是理所当然的事。自1988年5月至1990年1月，学会共举行过8次常务理事会会议，黄老都亲临主持。他对振兴中华诗词、繁荣诗词创作和开展诗词评论等问题，作过这样的综述：历史上，福建是诗乡，历代诗词家辈出，流派多，诗风也好。今天，党号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诗事大盛。福建得风气之先，全省各地成立了很多诗词组织，创作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作为省诗词学会就要很好地团结他们，共同促进诗词创作的繁荣。作品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别，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为了提高创作水平和篇什质量，就要很好地开展诗词评论。爱国主义是古典诗词承先启后的优良传统。运用诗词形式去着力反映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现实，反映改革开放的蓬勃景象，反映海峡两岸同胞期望祖国统一的心声，这实质就是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当然，诗词取材可以相当广泛，风花雪月，小桥流水，无一不可入诗，只要情调是健康的，艺术也过得去，能使自己和读者都会感觉到有审美的价值，这便算是

好诗。其实一次创作，能出一二首好诗，也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总是希望好诗将逐渐多起来，这正有待大家的努力，也包括学会诸君。从这些谈片中，人们感受到黄老与大家是坦诚相与的，他对追求某种希望的实现，总是以勉人自勉的语气出之。

1988年6月16日，省诗词学会举行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学会接受陈振亮副会长的邀请，把会议移到长乐下沙省司法厅干休所去开。自福州同车前往的有黄寿祺、陈祥耀、陈振亮、陈景汉、蔡厚生、赵玉林、李可蕃、吴修秉等人。当时下沙是新开辟的海滨旅游点，干休所有个涛声楼，是会客议事之所，楼立沙岸，颇有壮观。那晴朗辽阔的沙滩，一望无际的汪洋，湛湛水色，渺渺涛痕，鸥翼帆影，交错其间，所有海上的风景，尽被涛声楼延揽无余。会后，大家随兴作诗，黄老静坐于楼廊远眺，久久地面对大海洪波。忽然，转过头来，发现我也伫立在这里，他便点头示意。我说你该沉浸在诗情画意中了。他随口念道：“闲随诗侣到江田，议政谈心意泰然；坐对风光如画美，愧无好句答群贤。”接着说，好景难得，人生能得几回这样静静地观海呵！可惜我还没有把海写出来，以后再补吧。

省诗词学会成立之前，黄老的诗词选辑《六庵诗选》出版了。1987年初，他赠给我一本，嘱咐我读了写一篇文章，我说且试试看吧。但良久未着笔。过一些时日，我收到一本由王筱婧辑录的有关《六庵诗选》的来信评论资料。黄老在辑子封面上亲自用端楷的字写下：“吴修秉诗老惠存，祺奉。”并署87年8月23日。当时我甚感不安，读完赶紧挂电话给他说，谬呼“诗老”，实不敢当。这本辑录对《诗选》作了很好的评价，言皆中肯，我确有同感。

1989年4月，黄老偕赵玉林赴河南郑州出席黄河诗会，先至西安稍作勾留，然后联袂赴会。他们回到福州后，把旅途唱酬之作，辑成《秦豫行》唱和集。黄老向我索题，我勉呈七绝二首：

八百秦川眼底过，骊山雁塔任婆娑；
长安遗事知多少，风雨依稀入浩歌。

快趁花朝并臂行，中州盛会壮河声；

唱酬风致追元白，更喜诗盟似弟兄。

过了几天，黄老见到我时，劈头一句话便是：“你这个‘兄’字却把我难住了。”随着，他把和诗寄了来。句为：

秦豫山川十日过，乾陵铁塔一婆娑；

剧怜时事多纷扰，犹对朋侪作啸歌。

幸与诗翁共远行，黄河盛会发金声；

吴郎险韵多奇思，老笔难酬愧作兄。

黄寿祺教授赴美讲学的消息，早些日子就透露出了。他说办出国手续真够烦够难。他对办事效率之低，颇有微词。经周折辗转之后，终于成行了。1990年2月17日自福州抵达洛杉矶，对美国几所大学作“易学”巡回演讲，4月初自美国回到福州。此时适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开会，没料到他也来参加。他清瘦多了，神色也不好。他在会上扼要地谈了访美的情况。他说，在美国生活过不惯，吃的喝的大都是冷着冷饮，弄得肠胃不适应。他还说了一个笑话，有人上门来，请他用卜卦算命。黄老说，这些人以为易经就是“卜卦经”，岂不大谬！他对干谒者说，“我是相信无神论的，不搞那一套”，以此婉辞了。大家听着都笑了起来。

接着，省政协举行常委会，黄老到会只两三天，就病倒在宾馆里，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他送入省立医院住下，经检查确诊为胃癌，动过手术后稍好。我们去探望时，他还问起诗词学会的事。告辞时，他还记下来访人的名字。原来他只要勉强能提笔，每天都要写日记。他的“病房日记”当亦可观。这以后我还数度去探望他，病情迄无好转，见他有痛苦之色。

黄老病情恶化时，我又去看了他。病人瘫卧不能转侧，费力地张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医院能让我‘安乐’地去吗？”黄老自知无望，发此绝词，闻之令人酸楚！

1990年7月28日，当代易学宗师、著名诗人、古文家黄寿祺

教授终于离开了人世！他是多么艰难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党和人民，告别了他终生为之淬厉的未竟的事业，告别了所有钦仰而敬爱他的人们！在悲痛中，我写下这首悼诗：

重洋飞渡乐传薪，访美归装尚有尘；

一夕士林风色黯，失声无计赎斯人！

吴修秉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寒 灯 冷 雨 忆 恩 师

——记随之六夫子学词三四事

黄 拔 荆

一

记得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时，余始学填词，自知浅陋，除与林炳煊、何可辉二人吟诵传阅外，从不轻易示人，然班上同学知之者甚众。后游叔有师闻之，始转告之六夫子。临近毕业时，一日至花香园探望之六师，问及填词事，遂呈《满庭芳》、《江城梅花引》二阕求教。师阅罢大加赞赏，谓声律虽未尽谐，而韵味却佳。旋即擢朱笔细加圈点增删，并作评语云：“格律虽未稳，用字虽未精，而神味却似，继续用功，他日必为词家射雕手！”余从此兴趣更浓，信心更足，创作日繁，每有所得，必呈送求正。师亦常为此寒夜挑灯，埋头批改，蝇头小字，朱墨点评，乐而不疲。数年间，修改稿积案成叠（可惜“文革”抄家时均付诸一炬）。由此观之，余所以能词，实与师之鼓励扶持分不开。饮水思源，启导之功，终生未敢忘。

二

1960年8月，余从北京大学进修返校不久，某日深夜，到施埔寓所拜访夫子。夫子问：“近来填词否？”余将新作《满江红》一阕呈

上。师阅罢顿时敛容，指其中“基隆阙下终擒虎”一句问道：“‘阙’是何意，汝知之乎？”答云：“‘阙’者城楼也。”问：“为何不用‘城’字？”答：“城字太俗。”“城与阙区别何在？”余不能答。师云：“想必平日读书不肯用心，故有此误。‘阙’虽也指城楼，但多用在帝王所居之处，基隆何地，岂能用‘阙’？”随即挥笔改为“鸡笼山下终擒虎”，并郑重告诫：“基隆境内有山，形似鸡笼，‘鸡笼’、‘基隆’谐音，故而得名。今后读书应留心字词含义，凡遇疑难之处，应随时翻检工具书，切不可望文生义，强作解事，更不能一知半解，妄加臆测，慎之，慎之！”一番教训，刻骨铭心。夫子治学之精深与一丝不苟，教诲之耐心与循循善诱，对学生晚辈要求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三

1962年3月，福建日报副刊《海潮》首次刊载拙作《浪淘沙·远眺闽江》、《菩萨蛮·校园小景》、《如梦令·机群》三阙，之六夫子见到之后，立叫人通知余到系主任办公室。一进门，夫子便将报纸递余，边吟诵，边评论，喜形于色，情不自禁，连声叫好，接着嘱余更加刻苦用功，切不可骄傲自满。其后又转告系内其他老师。

适逢当日傍晚，系里几位教授用政协“优待券”在政协小礼堂宴请系里教师。席间，夫子又与荫亭师交口赞扬余之三首词，两人商量之后，定出等第，谓：《菩萨蛮》最佳，为“元”；《浪淘沙》次之，为“眼”；《如梦令》再次之，为“花”。言笑融融，满堂欢洽，如坐春风。其奖掖后进、关怀爱护，可谓一片苦心。思之，令人感泣！

四

1963年岁末，余作《采桑子·山村杂咏》十二首求斧正。六师阅毕称赞不已，并云“汝将稿子留下，容我细读，明日来取。”是夜，通宵达旦为余视草。翌日取来一阅，见逐章均有眉批，密圈繁点，朱墨琳琅，篇末更加总评：“清词丽句，绘出山村如画，读之令人神往，

想是近来填词大有进益。昔欧阳公见苏东坡曰：‘老夫当放此人，让其出一头地！’仆虽未敢比永叔，望君能为子瞻。六庵题此共勉！时癸卯祭灶前一日凌晨。”

余读罢，感激不已，久立案前，不忍离去。

写于 1993 年春节之夜

黄拔荆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六庵之诗及其诗学主张初探

王 景 提

六庵老人黄寿祺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古典文学专家，又是素享声誉的诗人。他在研《易》之余从事诗作，数十年间录存者达千余首，行世的《六庵诗选》收诗 610 首，附词 22 首。

六庵之诗继承风骚以来中华诗学之优秀传统及闽中前贤之诗风，而又能“自铸美意伟辞”，发时代之新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本文试就其诗艺特色、诗学主张及诗艺与诗学主张的渊源作一探讨，并就正于同好。

一、诗艺特色

六庵之诗可以“真”、“爱”、“美”三字概括。诗人以实诚立身，故其诗以求真显其本色，所谓“真”，可见于诗中的抒情真挚，状物真切，记事真实，述理真深。所谓“爱”，诗人爱国、爱人之心跃然纸上；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忧乐的情怀，洋溢于长篇短制之中。爱国主义精神可说是六庵诗之主旋律。所谓“美”，见于诗的情志统一，情境交融，情理贯通，情文并茂，余味无穷。“求美”正是六庵诗之艺术追求与艺术功力之所在。下面试以原诗作引证。

（一）“真”。桂堂先生评六庵诗，认为从他叠韵答喆庵诗中的“学术端宜辨伪真”一句，可见其“学术的真”；“宅心处世但存真”一句，可见其“处世的真”；“短句犹能见性真”一句，可见其“诗情的

真”。此评已大体揭其“真”的底蕴。如将其押“真”句细作胪列，还有“绝假纯真志不移”（《建党60周年献辞》），此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之真也；“肝胆轮困见性真”（《山居集》）。以下凡出处仅注集名者，概见《六庵诗选》，此待人至诚之真也；“伊雒渊源得本真”（《朝阳集》），此学理之真也；“我写竹枝非苟作，山歌樵唱本风诗”（《山居集》），此写作之真也。六庵是志洁行芳的老实人，一向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写老实诗，故其“胸怀常磊落”，即使在下放山居之日，亦能随遇而安，以其豁达的胸怀赋出“养生端不藉参苓”、“竹雨松风足养真”（《山居集》）等句，足见其性情之真了。六庵既以求真为本色，对违真失实者自极其反感，或给予劝戒或给予谴责。如其《刺桐吟》云：“泉城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寄语州人勤补种，好教万树灿朱霞”，是为希望名实之相副；《重谒李贽故居》云：“曩岁曾来访故居，歌功争赞在非儒。向声背实成何事，重谒偏教万感俱”，是为批评不实事求是之风。

（二）“爱”。六庵爱国、爱党、爱师、爱友、爱生，一生充满爱心，既见于言行，亦见于诗篇。他的“敬老尊师志不移”（《山居集》）的品德，早年已在家乡传为美谈。其纪念吴检斋先生之诗云：“绛帐风徽忆昔时，白头弟子感相知。五千里外来追念，四十年前事足悲”（《华庐集》），尊师爱师之情何等深切。《别悦鸣权厝》云：“昔日为兄弟，今看委草莱。……有恨随秋至，无魂入梦来。抚棺一洒泪，欲去首频回”，敦于友谊之真情挚意跃于行间。《哭孙业英》云：“……好学如君少，相亲恨我迟。文华思妙笔，玉树想清姿。一棺竟长掩，凄绝凤山陲”，对学生、后学之爱何等深厚。至于爱国之情则诗中随处可见。六庵自幼景仰屈原、杜甫、陆游、谢翱以及林则徐等爱国诗人，深具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1932年就有“夜深不寐独徘徊，家园沉忧志未灰”（《北学集》）之慨叹。1936年曾一度“投笔从戎”，后因报国之志难遂，只好重返母校任教。日寇侵入东三省，后又发动七七事变，他抒发了“东望辽阳四塞秋，白山黑水不胜愁”、“我亦天涯悲

作客，第余热泪洒神州”（《北学集》）的悲伤与忿愤；北平沦陷南旋福建之后，则又有“怀人望北常无寐，倘得河清岂厌贫”（《南旋集》）与“回天无力孤臣泣，长忆遗民沧海君”（《海疆集》）之忧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他扶今追昔，既“多难万方悲往事”，又“却欣垂老际明时”（《朝阳集》）。其晚年爱国主义思想融入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向往共产主义的内容，更加丰富而深刻了，他的诗句，如“休明鼓吹吾曹事”（《华香园集》），“凌云壮志未曾休”（《将飞兰州讲学》），“歌颂党功情不已，宣扬文化乐无涯”（《纪念国庆40周年》），“延安革命精神好，元旦雄文意味长”（《华香园集》），“曾经文革难为乱，伫望从今乐泰丰”、“力将四化完成好，定见中华早复兴”、“但愿神州臻统一，追随老马共扬鞭”（《均见《华庐集》），“但愿家乡勤建设，精神物质两丰收”（《重游三沙》）等，均洋溢着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激情。他于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非偶然。

（三）“美”。对于诗艺术美的探索与追求，是六庵诗的一大特色，其诗感人之深，究其精髓，实以情为网结点，以其渊博的学识、豁达的胸怀、丰厚的阅历、丰富的想象和丰赡的辞藻，作清真雅正、风华俱茂之抒发，因而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具有审美价值。

（1）情志统一。抒情述志乃六庵诗美之精髓，故其诗思想性特强。他以“诗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为其论诗所本，融“言志”与“缘情”于一炉。“诗言己志合芳坚”、“从来言志贵情真”（《华香园集》），其“咏吟所发，志唯深远”。述怀诗如《戊午春节咏怀》云：“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述其暮年壮志，抒其献身党的教育事业之衷情。纪游诗如《古田会议遗址》云：“屋后松杉长拱翠，青山永护此红旗”，把青山人格化了，以抒其对革命圣地景仰之情与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之志。咏史诗如《次〈地下宫〉韵》云：“世上群黎愁露宿，一人地下设行宫。何年海宇真平等，万众歌声乐不穷”，既给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以揭露与鞭挞，对世

界上“愁露宿”之贫民寄以同情，又抒发了“愿普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的愿望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田园诗如《咸村早稻珍珠矮大丰收，喜作二首》：“咸洋六月水如汤，地暖田肥稻早黄。获得珍珠千万斛，半年辛苦未空忙”、“头季丰收乐岁穰，更期晚稻早登场。农家衣食能充足，夏日炎炎也自凉”，对农村丰收的喜悦心情跃于行间，与农民甘苦与共、忧乐相关之志溢于言表。由此可见，六庵之诗实具情真志洁之美，诚如刘勰所道，乃“述志为本”、“吟咏情性”、“为情而造文”之作。

(2)情境交融。六庵发扬了“物感”说传统，“触兴致情”，“体物写志”，既给物以生气又借物以寄情，常把自然人化，把主体对象化，故其诗能“宛转附物”、“怛怅切情”，形象鲜明，感情丰富。其于“境”，则凡所经历与观览，无事不可入诗，无物不可附意。《赠平潭岚涛诗社诸吟俦》云：“文物山川尽入诗”，《题王卉画师〈南行诗词集〉》云：“好山好水留题遍，新人新事入咏多”，认为山川、文物、人事皆可入诗，皆可托情寄意——即“物华俱有意，何事不宜诗”（《山中逢兴》）之谓，足见其审美对象之广泛性与审美情趣的多样性。情境交融之作，在其吟草中比比皆是。如《鼓浪屿千休所高亭远眺》云：“独上危亭望远洋，云帆片片似旗张。岸沙浪洗秋霜洁，山岫烟横翠黛长。风静涛声成节奏，波明眼力倍精详。双双白鹭翔天际，顿忆伊人水一方”：前两联直写眼前登眺之景，寓热爱祖国之情于不言之中；颈联亦写眼前之景，而以“风静”、“波明”寄寓对祖国大好形势的喜悦之情；末联则笔锋一转，直抒由眼前之境所触发的情思，盼望祖国早臻统一、亲人回归团聚。统观全诗除结句外，基本皆景语，而句句景语皆情语，诚乃情景交融之佳构。《晚登开元寺镇国塔》云：“凌云高塔列西东，镇国攀登势更雄。千里泉南浑在望，晚霞明照万山红”，对祖国山河之爱、对崇高志向的景仰与珍惜“晚情”之情，皆见于言外，实臻融情于景的境界。此正是刘勰所谓“状溢目前”、“情余词外”、“物色尽而情有余”的杰作。

(3)情理贯通。古人之于诗尝主情理并举,如刘勰曾云“理融而情畅”。六庵更作深化之阐发:“哲理诗情共贯通”(《赠何为同志》)——诗应能使人透过其所表现的艺术形象,见其情之徜徉与哲理之潜发;至此境界,方乃艺苑之翘楚、诗美之极致。六庵作诗即孜孜于此。如《赴厦车中作》乃记行之作,写在车上览途中之景,然其运用比兴手法,而使诗情哲理均融于眼前之景中。在“秋田经雨禾添实,老树当风叶有声”一联中,“经雨”、“当风”实为点睛之笔。两句所状乃是人人可见可知的即目之景,所寓却是诗人喜悦与自豪的心情,其喜悦之情正与上两联“难得”、“乍晴”、“波静”、“云开”等语所寓的情怀相映衬。这一联中还深蕴哲理,桂堂先生谓此两句云:“它既是写实,也含有哲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象征,也是颇可品味的,这不恰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吗?”(本文所引桂堂先生之语,均见其《老树当风叶有声》一文)所云颇为精当。如果“秋田”是象征诗人自身,“禾添实”喻指其学术成就,则“经雨”就恰如桂堂先生所指的“老师的教诲、学生的质疑、与朋友间的切磋,以及时代的严峻考验”等等了,自然也与“却欣垂老际明时”、“时逢盛世人多乐”分不开。但“秋田”还可以突破诗人自我的范围,用以象征整个学术论坛与艺苑文围,从而进入更深的层次。至于“老树当风叶有声”,自然具有历风霜而不凋残的老而弥坚之意(即桂堂先生所指的经历了“时代的严峻考验”);但也具有沐春风而焕生机之义,两义相并,作为诗人形象的再现,是再好不过的。其《题吴忠翰同志〈古榕新姿长青不老〉版画》云:“……辛勤镂刻五十年,不因困厄失所守。及今老乃益坚强,独出心裁无与偶。……时逢盛世人多乐,荒郊今亦不寂寞。遂使古树焕新姿,榕叶长青永不落。我题此诗非苟作,羨君学殖日广博。技进乎道更可嘉,老树当风君无忤”(载《长溪诗讯》第5期),恰是自己对“老树当风叶有声”句作的注脚。“秋田”、“老树”一联,虽刻画了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但其所指喻之义是基本一致的。

(4)情辞并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此刘勰之所称道，亦为古人所追求。六庵之于诗亦主质文并重，故其诗不仅情真志洁，且多清辞丽句。如“霜劫几经不坏身，同欣日月已更新，祝君彩笔凌云健，长写江山万里春”（《次韵奉和殷孟伦教授》）和“心能旷达宜身健，诗入精微与道通。雁字来时传秀句，如闻玉佩响玲珑”（《叠韵寄健行先生》）等皆情感丰富、词句清丽自然，堪谓情辞并茂。其诗工于声律，信有“风静涛声成节奏”之音韵美，从奉怀喆庵到答喆庵诗竟七叠其韵，足见其用韵之功力。其于对偶不仅工整而且自然，无凑合之痕迹。如“才如向日花争发，人似经霜叶更红”（《赠何为同志》）、“诗同碧海新潮涌，人似黄花晚节香”（《西湖赏菊》）与“木棉花放明似锦，海峡桥横望若虹”（《赴厦道中作》），可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常怀夜雨巴山句，愧读春晖寸草诗”（《叠韵再和确斋》），不仅对偶匀调，且见“用人若己”，正如其《（抗倭集）题辞序》所云：“运用古人成句，自然吻合，工整贴切，不啻若自其口出，绝无矫揉牵率之痕迹，可谓难矣。”

二、诗学主张

在中华诗学优秀传统长期熏陶下，在常年不辍的吟咏与鉴赏实践中，六庵早就形成了他的审美理想与理论主张，但因忙于“笺玄注易”，故未见他有系统的诗学专著问世。其论诗主张大多散见于一些论文、题辞、序跋以及诗句之中。现将笔者管窥所获略述于次：

（一）“妙契文心与道心”。这是六庵诗论的重要主张，他认为，这是诗美的基本前提。“文心”与“道心”的“妙契”，即正确的思想内容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六庵继承与发展前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的理论主张，认为：既要重诗歌的艺术形式美，更要重诗歌思想内容中情感之真挚与思想之纯洁。“文心”即刘勰的“为文之用心”，包括艺术想象、艺术构

思与艺术表现等方面,与作者的“才、气、学、习”等诸多因素有关。“道心”,亦即刘勰“原道心以敷章”的“道心”。但六庵赋“道心”一词以新意,并非指“文以载道”以宣扬、维护封建道统的“道心”,而是指用以指导创作并贯串于作品之中的、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正确思想与高尚情趣。他主张诗歌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与高尚的情趣,故以“志洁”、“行芳”作为诗人素质的基本要求。《苏渺公遗诗题辞》云“一代才人兼志士,天生侠骨与豪情”,将才人之“豪情”与志士之“侠骨”并举,亦体现文心与道心妙契的思想。他说的“浩歌以写怀”、“寸笔写骚心”,亦都是指文与道的关系。他强调要“细论文心与道心”(《山居集》),赞赏“诗入精微与道通”(《山居集》)的作品。总之,他认为只有以凌云健笔写高尚情怀,才能创作出真正美好的诗篇,他的创作实践正体现了这一审美理想。

(二)“春梅秋菊竞芬芳”。六庵论诗不囿于门户之见,认为不论朝代、体制、风格,只要“妙契文心与道心”,便能“千载有辉光”。就朝代来说,他虽推尊盛唐、有“盛唐气象自严严”(《读沧浪遗著》)之句,但他并不排斥其他朝代,曾云:“最怜秀丽绵芊处,佳句时时似晚唐”(《华香园集》),认为晚唐诗也有可取之处。《次韵寿确斋》云:“诗风端不逊同光”,对晚清“同光体”也有推崇,亦可见不贬宋诗了。在体制方面,不论是古诗歌行或近体五七言律绝以及词曲,概未轻加轩輊。对人们不很重视的排律与竹枝,他亦颇加赞赏,如《读君述(西安行)排律赋赠》云:“排律精工今已渺,审音要妙世难期”,《续茶广竹枝词》云:“我写竹枝非苟作,山歌樵唱本风诗”。对于集句诗亦颇为赏识,如《〈抗倭集〉题辞》云:“集句荆公首创新,文山才调信无伦,何期绝响垂千载,更有禅心继后尘。”对于不同艺术风格的诗词,他认为只要都写得好,就可以并世流芳,如《济南谒李易安纪念堂》云:“一代词宗说二安,齐名谁继信才难。未缘婉约殊豪放,珠玉同留千载看。”总之,他不拘一格,主张群芳竞秀、雅俗共赏。《郑化平诗集题辞》云:“今古陶镕岂一方,庄谐并出亦何妨”,

《住院杂咏》云：“凤尾鸡冠齐秀发，岂徒丛菊耐秋霜”，《谢凤林老人李若初先生寄赠〈春秋鼎盛图〉》云：“春梅秋菊竞芬芳。启予诗思，驰骋入遐荒”，都体现了这一理论主张。

(三)“文运推移随世变”。六庵精通《易》学，能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在诗学方面亦继承刘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的“文变随时”的思想，主张有因有革、继承与创新并重，诚如其在《题吴秋山〈茅青词选〉》中所谓：“文运推移随世变，独弹古调谁听？继承创造赖群英。”他还本于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寿确斋七十》所云“物理推移后胜先，古不如今乃正道”，正说明他的学古不泥，勇于创新。他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而是主张“不薄古人爱今人”，但也提倡对古人要有所超越，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新松〉创刊号题辞》云：“参军晞发富名篇，补阙高风千载传。文运推移随世变，后生岂必逊前贤”，正体现了这种理论主张。所以桂堂先生赞其能“温故知新，承先启后，有所革亦有所因”，能“继承优良传统而加以发展变化，以适应新情况、新要求”。其《贺福建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云：“……启后多耆宿，承先盛俊英。兴观明奥旨，风雅发新声。百尺竿头进，繁英局再呈”，表达了以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开创八闽坛坫繁荣新局面的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因革”、“通变”的美学观。

(四)“道义担当赖铁肩”。六庵认为文艺创作不应该存在个人的功利性（“不为功利计”），但必须具有社会的功利性，即社会效益。他“弘扬诗教承传统”，明“兴观”之“奥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在“文章华国犹余事，道义担当赖铁肩”（《山居集》）中，把“担当道义”看作是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这正是对刘勰“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他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但更强调诗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在解放之后，他的这一观点中融进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思想，故益显其可贵，故能

“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的感情融铸在诗篇里”（《楚辞全译·序》中赞屈原之语）。其诗云：“休明鼓吹吾曹事”（《华香园集》），“歌颂党功情不已，宣扬文化乐无涯”（《福建中华诗词学会通讯》（3），以下简称《通讯》），“白头相对怀先烈，青眼高歌勸后尘”（《华香园集》），“非徒怀往昔，亦欲勸今贤”（《山居集》），都体现了这种高尚情怀。他写了很多歌颂党、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新事，歌颂革命圣地、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歌颂祖国壮丽山河与优秀文化传统，以及歌颂先贤先哲与仁人志士的诗；同时，亦有不少明辨美丑妍媸与匡谏时弊的作品，如《住院杂咏》云：“高楼东畔住名公，绣幕银屏不透风，谁识临盘诸少妇，呻吟反侧走廓中”，以及“得贤如庆三春雨，好事常愁一阵风”、“漫说诗声鸣老凤，莫教才用叹潜龙”（《华庐集》）等皆是。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989年4月《河觞》颇为“行时”、那场政治风波行将发生之际，他同赵玉林先生一道，畅开歌喉大力歌唱黄河，创作了《秦豫行》诗集，表达了热爱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怀，“担当”了捍卫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义”，也证实了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的一致性。其诗云：“浮天阁上生浮想，遥望中原亿万家。千里迢迢来此会，岂图只看洛阳花”、“伫望黄河千里远，方生春水喜开颜。岩峽大禹山前立，顿想寻源一往还”、“千里黄河流滚滚，平原润泽好深耕。昔资华夏开文化，今为人民利厚生”，直砭“觞”论；至于“堂堂大国称华夏，共感黄河哺育恩。广布谰言夸百害，不须一笑与除冤”，其针对性更为明显。此外，还有“大禹山高雄崿崿，黄河水永惠元元”、“行吟不觉心如醉，人在黄河哺育中”等，亦是佳句。他还在“剧怜时事多纷扰，犹对朋俦作啸歌”（《次韵和答修来同志》）一句中表露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忧乐常关家国事，定留风范在文林”（《通讯》（5））称之，当是“无作”的。

（五）“祝君绮思美如诗”。六庵认为诗思和诗都应该是美的，诗

必须具有审美价值，“一篇如发一枝花”（《秦豫行》）。至于诗如何才美，他早于1937年撰《北游吟草序》时，就已形成自己的观点，按其意可概括为：“其景切”、“其情真”、“其词雅驯”与“其声宏远”，他认为诗能至此，方“足以言功”（《北游吟草·黄序》）。观他所论，则颇同于刘勰论诗美特贵“物”（景物，事物）、“情”（情志，情理）、“辞”（体势，言辞）、“文”（音韵，骈偶）四要素，亦可归之为“华实相扶”、“文质相称”、“衔华而佩实”。

六庵关于“情”的看法，上已论之，这里谈谈他对“物”、“辞”、“文”的观点。先谈“物”。六庵深受《周易》“观物取象”美学思想之影响，认为《易·系》所说的“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其所“观”之“物”，乃是自然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所“取”之“象”，则是模拟这些具体事物成为象征意义的“易象”（《“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进而认为一切文学艺术形象的创作，无不“以现实生活为直接源泉”（同上），继而作论说：“刘勰在文中所强调的文学本乎自然的说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的观点（《〈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从这种审美观出发，他强调诗歌创作要多从“观风”、“体物”的生活实践中广泛吸取养料。《仙人洞》云：“未能临胜境，那得别仙凡”，《次清明寒雨韵……》云：“雨村学稼又观风，诗思如泉幸不穷”，《叠韵答喆庵四绝》云：“田园四季饶佳兴，天与安排好写诗”，都说明深入生活实际同艺术创作的关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饶佳兴”，只有“饶佳兴”才能“好写诗”。但“观风”、“体物”不能浮在上面，而必须深入下去，只有“体物深”才能“状物切”，所以他一再强调“深”字。《奉怀喆庵南埕……》云：“学农不厌入深山”，《叠韵再答喆庵四绝》云：“九曲寻春不厌深”——只有“寻春不厌深”，才有“景物感人深”；只有这样，才能进而作“无限登高怀远意”、“但凭寸管写骚心”（《山居集》）之抒发。这正是“池塘活水有来源”（《朝阳集》）之谓。

在“辞”与“文”，亦即艺术形式美方面，六庵也深具见地。他深

知：在文学创作中，只有做到物情结合（心物交融），才能创造艺术意象；但是，在诗人脑海里的艺术意象，还有赖于美好的艺术形式，才能使其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因此，他对艺术形式也颇为重视。故在“景切情真”之外，还求词之“雅驯”与声之“宏远”。对于艺术形式美，他不仅有“才擅雕龙美”（《华香园集》）之说，而且还有“先贤设教风徽美，今人留题韵味甘”（《通讯》（2））之赞——此联是对偶句同时也是互文，意为不论先贤或今人的佳作，都兼具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与饶有韵味的艺术形式。《次韵和答永安黄瑞盼女词人》云“一笺遥和，藻丽谢精工”，《郑平化诗集题辞》云“挥洒深惭绝妙辞”，虽都为谦语，但亦可见其对艺术形式美的重视。他重视炼字与修辞，评诗时常有“佳句”、“秀句”与“妙笔”之誉，并云“诗到常钦一字师”（《朝阳集》）。他还认为诗歌创作除必须具备形象思维这个艺术特性外，离藻布文、结辞树体还须符合逻辑。《参加“形象思维”讨论会》一诗中，在谈到“形象思维好写诗，游心艺苑撷芳姿”之后，又云：“若无逻辑相参预，恰似离缰马乱跑。”他还指出刘勰所说的“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是说明“诗歌创作要有头有尾，层次井然”；赞扬刘勰运用《周易》卦爻辞“臀无肤，其行次且”来“喻指写文章开头色彩斑斓，末尾颜色憔悴，以至‘余风不畅’之弊，实为妥切”（《〈周易〉对〈文心〉的影响》）。可见其重视篇章整体结构之美。此外，他还认为“丽辞”与“声律”也是构成诗歌艺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曾云：“排律精工今已眇，审音要妙世难期”（《华庐集》），这正是对“骈偶美”与“音韵美”的赞扬。

三、诗艺与诗学主张渊源

（一）家学乡学影响。六庵诗学造诣之深，有其家学渊源。其祖黄金铭兄弟三人及其父黄韶皆晚清秀才，擅文工诗，课子弟甚严。先生5岁即受《三字经》、《千字文》之启蒙，6岁进私塾开始学对句，8岁学《毛诗郑笺》、《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10岁上即能

诗,被塾师誉为“千里驹”。12岁起进县城读书,历时五载。霞浦古称长溪,后为福宁府治,乃闽东首县,南宋著名诗人谢翱即长溪人。他就学县城之日,正是霞浦重振诗风之时,长溪吟社常年吟咏不辍,中小学教师多饱学之士,常指导诸生习作古文、诗词,他因擅文工诗而受到老师和诗人的爱接。长溪吟社主政者王瑾卿,著有《小辋川诗集》,“诗主性灵空依傍”,与六庵成忘年之交。王逝世后,六庵曾为其编辑《小辋川诗选》,尚秉和为之写序。被尚秉和誉为“以诗名于闽东”的王廷玖(清末秀才,六庵之师),著有《窥云楼吟草》并纂历代《律诗选粹》,论诗不拘朝代,兼集众长,主张情文并茂,且重声律对偶。六庵于1936年曾有怀王师之作,其诗云:“摩诘风流空复存,诗家后事不堪论。故侯曾散千钟粟,谁向门前报感恩。”另一著名诗人叶嘉贞(亦六庵之师),著有《倚树斋诗稿》,亦主性灵诗风,“其诗平易其意深邃,颇多忧国忧时之作”,1939年逝世时六庵送挽联云:“少日从学乡校,属望无穷,岂意长来成梦境;近年迭遭家忧,伤怀未已,可堪今又哭师门。”上述这些诗人对六庵诗风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名师益友薰陶。六庵于1929年秋入北平中国大学,与杜悦鸣、张永明等出入槐轩(尚秉和)门下达6年之久。槐轩老人亦一代诗人,诗作重对偶匀调,声律自然,“于诗探溯源流,辨析雅俗,口讲指画惟恐不详”,师友之间“投赠和答来往频频”,六庵诗学于是益进。南旋之后,犹常录所作邮呈先生审阅。此外,他也受到精通诗学的高步瀛等先生的薰陶。六庵诗友甚众,早年尤与杜悦鸣最为知音,同学同事达18年之久,相互切磋唱和酬答不辍。杜以排律见长,尚秉和赞扬其诗“尤超逸俊拔”,“长篇动至数十韵,纵横捭阖蔚为大观”;六庵亦赞其“凡所过山川景物与其悲欢离合之情一一寄之于诗,其景切其情真,其辞沈实高华、典雅俊逸”。六庵诗风与其颇多近似之处,彼此间相互影响甚多。(引语皆见《北游吟草》“尚序”、“黄序”)

(三)继承诗骚传统。六庵对《诗》、《骚》是兼尊并重的。他童蒙时便学《诗》，后又讲授过《诗》，“深得风人之旨”（桂堂先生语）。其诗云：“兴观明奥旨，风雅发新声”（《通讯》（1））。就是指继承与发扬《诗》的传统。他对屈子及屈赋亦推尊备至。他长期讲授过《楚辞》，并与其门人梅桐生合著《楚辞全译》。他认为：屈原不仅是最重要的楚辞作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认为屈原“对各家的学说都有所采取，也有所摒弃”，指出他“运用比兴的形象是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的”，赞其能“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的感情融铸在诗篇里”，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认为，屈原的诗篇做到了“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把“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同时还“把华美与质朴的语句恰当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并“运用积极的修辞手法，锤炼对偶句，美化诗”，“故其艺术形式美也是十分突出的”。总之，他认为屈赋和楚辞“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给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引用刘勰之语），“至今还是不可比拟的典范”。从上述可以看出，屈赋和楚辞对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明显的影响。（引语均见《楚辞全译·前言》）

(四)深得《文心》奥旨。刘勰的《文心雕龙》（简称《文心》）也是对诗骚兼尊并重并深受易理影响的。六庵是易学家兼诗人，他的诗学观必然要受到易学哲理的影响，因而对《文心》奥旨深有领会。他肯定《文心》“是一部空前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赞扬刘勰不仅“深得文理”，而且也“精通易理”，并能援易以论文——“在论述其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周易》的各方面的内容”，“既使一部专论文学的著作，充满了深邃的哲学意义；更使古奥的哲学著作《周易》的诸多内容，影响及于文学理论领域”。同时，六庵也尝“切当自如地”融《文心》的理论观点及用词于自己的理论著作乃至诗篇之中，其诗学主张不仅是发《诗》《骚》之新声，同时也是发

《文心》之新声。

(五)发扬闽派流风。六庵是爱国爱乡之人,他热爱八闽,也热爱八闽前辈诗人,上自薛令之下至同光三陈,大都受其赞颂,如赞薛令之、谢翱云:“补阙参军诗笔健,开唐结宋几人齐”(霞浦建县1705周年纪念《诗词特辑》),“晞发参军薛明月,是吾乡哲亦吾师”(《华香园集》);赞严羽云:“逋客诗功最不凡”,“水月空音论入神”,“剑歌雷斧感人深”,“犹见衰年烈士心”(《读沧浪遗著》);赞黄石斋云:“遗像曾端拜,残篇每细吟。悠悠四百载,谁不见丹心”(《长溪诗讯》第7期);赞同光三陈云:“同光坛坫说三陈,听水诗名孰与伦”,“诗功应许继三陈”(《朝阳集》)。他认为闽派之形成可上溯至盛唐,其后,历代名贤辈出,光照诗坛,有着自己的优秀传统,其有诗云:“闽派流风溯盛唐,名贤辈出焕辉光”(《华香园集》),“残脂剩墨亦留香,化作闽诗万丈光”(《朝阳集》)在《福建诗词创刊号题辞》中,他在提出要“学习海内作家优秀风格”的同时,还强调要“发扬闽中诗派悠久光辉”:既主张学习闽中历代诗人的爱国主义传统与高风亮节,亦倡导借鉴他们丰富多采的审美情趣以及艺术风格与创作技巧,以发时代之新声,开创八闽坛坫繁荣的新局面。他对后人的这一期望,也正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

(六)博采众家之长。六庵的诗艺及其诗学主张的渊源是多渠道的。他不但赞扬空海《文镜秘府论》“论诗集众长”(见《长溪诗讯》第2期),而且本于杜甫的“转益多师”、刘勰的“弥纶群言”,博采众长,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诗风亦能才兼众长,千姿百态,不拘一格,绚烂夺目。诚如桂堂先生所说,“能为嗣宗的忧愤,少陵的沉郁,太白的飘逸;又能为牧之之清丽,石湖的平易”,此外,也不乏陶潜的平淡自然,王孟的幽雅闲适。但其风格之变化乃基于时、境之异,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解放前万方多难之际,其诗以忧愤沉郁为主;建国后欣逢盛世,则以飘逸清丽居宗。下放山居之日,其田园、竹枝之诗多近恬淡自然;登临游览之作,则颇见幽

雅闲适。不论为何时所作，都能与当时处境及心态相妙契，毫无矫揉造作之迹象。

总之，不论是在诗的创作实践上还是在诗学主张上，六庵先生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当然，他的诗也难免有局限之处——他早年颇受儒家伦理观念及诗教之影响，以“忠孝仁义之性，温柔敦厚之情”（《序杜琨〈北游吟草〉》）接物处世，因而即使是感事愤时，所作仍颇近“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但这和他当时所处的时地有关，是不能苛求的。

笔者才疏学浅，所“探”不过门外之谈、瓶管之识，志在抛砖引玉，敬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1990年12月16日

1992年10月8日修改

王景提 霞浦县离休干部

先师黄寿祺教授治《易》成就述略

张 善 文

先师黄寿祺教授，以精深广博的中国古代学术的功底，在高等学府的教学与科研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学识遍及群经、子史、历代文学各领域，素有“通儒”之称。尤其在《易》学研究方面，以严谨厚实的研究风格与精辟深刻的独到见解，蜚声于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当代“易学宗师”的美誉。

推究先师的《易》学成就，固有早年秉承家学及青年时期北上受业于尚秉和、吴承仕诸大师的学术渊源所自，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他数十年博览群书、潜心研讨所取得的各方面创获。正是这些创获，使一代老师宿儒为之赞叹，同辈学者为之倾倒，并成为后学之津梁而不断启迪来者。

笔者随侍先师十有余载，所受教诲既多，对先师《易》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也稍有感悟。今谨以肤学浅受之资，恭拟数端，略述如次，藉以缅怀先师德绩，亦可请益于学术界的同道学者。

一、穷究经传 博稽群籍

先师治学，无论哪一种学问，皆是穷尽心力，寻根究底，严谨不苟。对于《周易》学说，自也如是，务必深入探究经传奥义，辨明学术本源，然后分析思考，创为己见。

南宋朱熹曾有“《易》难读，不比他书”（《朱子语类》）之叹，可见

古人对《周易》之艰深也颇有感触。先师的《易》学功底，在幼年时代因其父所授即已打下了初基，后来考取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又以10余年之力，研读《易》注数百种，参稽考核，融会贯通，终于形成了他宏深坚实的《易》学体系。

先师研治《周易》，自幼熟诵经传本文，详记卦次，其记忆之强，老而不衰，在当代治《易》学者中，实为罕见。由于熟记经文，胸有全豹，故阅读一切有关《易》学论著，都能居高临下，由整体看局部，没有迷茫、滞惑之弊。他把经传要义比为《易》学之“源”，主张一切治《易》者均当“从源及流”，才能把握《周易》学说的本质。当然，研讨《周易》经传，离不开考索历代《易》家的各种旧注，从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所收汉魏古注和六朝隋唐诸家义疏，到宋、元、明、清历代学者之经说，先师莫不兼稽并考，全面研索。他既精读《四库全书》所收《易》类著作，又博览《四库》未收的《易》学著作。他所著的《易学群书平议》即为《四库》未收的130余部《易》学书籍的提要和评议，其眼界之广，用力之勤，一般治《易》者诚不可及。他熟诵本经，博览群籍，精研传注，曾深有体会地指出：“不从古注入手者，是为迷不知本源。”（《论易学之门庭》）

对于纵贯两千多年的纷繁复杂的旧注，若没有精深的鉴别能力，不从学术源流上区而别之，则必然陷入食古不化的泥坑，终归徒劳无获。先师以其敏锐的见解，提出“强干弱枝”之说，认为要抓住历史上最主要的两大《易》学主干——象数派与义理派，作为研讨的重点对象，而以其它旁支末流为研讨的次要对象；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易》经传的研究沿着扎实的方向深入拓展，并进而取得超越前人的独到之见。

然而，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本身又因时代的差异、学术承传的不同而存在至为复杂的“家法”问题，这又是许多治《易》者望而生畏的“拦路虎”。先师对此曾作过一段精辟的分析：

故学《易》者，当以汉《易》还之汉《易》，以宋《易》还之宋

《易》。而就汉《易》之中，亦当以孟、京者还之孟、京，郑、虞者还之郑、虞。宋《易》之中，亦当以陈、邵者还之陈、邵，程、朱者还之程、朱，李、杨者还之李、杨。其余众家，亦莫不就其家法师承，为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以明其本来之面目。夫如是，则家法可明，而条理必清。（《论易学之门庭》）

这节论述，至为明确地提出了对历代《易》说不可“混淆家法”的观点。文中所举“汉《易》”的孟喜、京房、郑玄、虞翻诸家，皆属象数派，而说《易》条例各具特色；所举“宋《易》”的陈抟、邵雍及程颐、朱熹、李光、杨万里诸家，前者为象数派，后者为义理派，各家的解《易》角度也各不相同。面对交错万端的现象，治《易》者若不能分派别流地审别条绪，无疑将坠入五里云雾之中而无所断制，莫知其向。显然，先师这段辨析，虽仅是就“家法”问题作了一番提纲挈领似的梳理，却令人体味到有如廓清云雾般的豁然开朗，不仅展示了先师的浑厚功力，更对研《易》者具有指点迷津的重大作用。

先师穷究《周易》经传，详探历代学说，所创下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他在这方面突出的著述有《易学群书平议》7卷、《汉易举要》5卷（残1卷，载《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六庵易话》1卷、《历代易学书目考》1卷（佚）、《历代易家考》5卷（佚）、《尚氏易要义》2卷（佚）、《周易要略》1卷（稿存《群经要略》中）、《周易名义考》及《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佚）中的许多论《易》杂著。这些著作虽然有不少因抗战或“文革”之乱而散佚，但目前仍存的手稿及已经正式出版的许多作品，实已有力地展示出先师对《易》学的显著贡献。

先师的《易》学著述，往往在精约的文字中包含着极大的学术容量，决非夸夸其谈而空洞无物者可比。如《周易名义考》一文，虽仅是一篇三四千言的短论，却涵盖了上下数千年有关《周易》命名之义的历史发展，并归纳出对《周易》名义的科学结论。

先师晚年曾与笔者合著《周易译注》一书，此书虽由笔者写成

初稿，但自始至终是在先师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并经其修改定稿。书中的许多为学术界所肯定的见解，无不是依先师多年的言传口授而提炼出来的。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弘三人在其合著的《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指出：“《周易译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翻译《周易》经传本文，并对其要理进行系统阐释的高水平的专著。”此书曾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并被台湾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重印出版，产生了颇为广泛而良好的学术影响。笔者认为，《周易译注》的成功，进一步展示了先师深厚的《易》学功力，并显示其治《易》思想已经在当代学术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二、精研象理 不废术数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不少学者因师承之别、治学途径之异，而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门户之见，以流派、学说之不同而相互攻讦，不肯有丝毫苟同融通。在《易》学领域，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就其大端言之，或有专治“象数”《易》者，则不涉“义理”；或有专治“义理”《易》者，则不言“象数”；或有专攻阴阳术数之《易》者，则兼象数、义理而并弃之——乃至派系愈分愈细，而《周易》之本旨愈失愈远。

先师治《易》，极力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既不孤陋寡闻，又能独有建树。他至为钦服宋人胡五峰“学欲博而不欲杂，守欲约而不欲陋”之说，曾指出，“故余之于《易》，亦深愿能博读古今《易》家之书，而不愿糅杂众家之言；愿各守各家之家法，而不愿株守一先生之言”；并提出治《易》的崇高境界：“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挥斥百家，包扫一切，冥思独运，卓然自树，而成一家之言，上既无所依傍于前贤，而下且足以梯航乎后学。”（《论易学之门庭》）

本着这种思想，先师之《易》学遂能旁通博取，于象数之学研精

覃思，于义理之学融会淹贯，于历代术数之道亦兼采而不废。

先师对《周易》象数学的攻研，历时最久，约始于他青年时代受业于尚秉和先生之时。尚先生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儒，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以精通《周易》象数学知名于世。先师作为尚氏高足，从学既久，对象数之《易》所得最深，曾协助尚先生整理《周易尚氏学》、《焦氏易林注》，并为先生的《焦氏易詁》撰写序言。这三部书皆是反映尚先生《易》学精华的传世大作，在现代《易》学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学术地位。30年代，先师曾撰《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专就“象数”问题与先生展开讨论，对先生《焦氏易詁》所举虞翻逸象、《九家易》逸象的某些例子提出质疑，具有深刻的见解，以致尚先生称赞道：“非执事，孰能有此疑？孰能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哉？”（《答书二》）尚先生还将《三书》连同自己的《答书》一起交投北平《晨报》公开发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后来，先师又著《尚氏易要义》、《汉易条例》两书，也均是有关象数《易》学的专门著述。因书稿亡佚，40年代中，先师重撰《汉易举要》5卷，细密考辨了两汉象数《易》学五大家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学说，对清代学者惠栋的力著《易汉学》颇有补正发明之处。此书虽又因“文革”而亡佚，但从已发表于《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的《孟氏易举要》这一卷中，仍颇可窥见先师在《周易》象数学方面的精深造诣。

先师对《周易》义理学的研讨，与他精研先秦两汉诸子哲学和宋明理学有着内在的关联。他把《周易》看成一部早期的哲学专著，认为《周易》“原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对《易》学之哲理内涵也至为重视。他曾指出：“夫宋儒之说理，动欲以危微精一之谈，施之于《易》，借以发挥其身心性命、圣功王道之学，诚往往不能免于空虚，要其立言之大者，间亦有合于洙泗，未可偏废也。”（《易学群书平议》卷五）这里一方面指明宋儒义理学的通病，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其可取之处。先师又云：“然《易》之本在乎象，故曰‘《易》也者，象也’；其要在以明天地阴阳，故曰‘《易》以道阴阳’。是故言《易》者必

本象数以发为义理，必原天道以推人事。言义理而舍象数，则为无本；推人事而遗天道，则为一偏；是二者皆未得也。”（同前卷四）这段论述，则揭明对《易》学之“象数”、“义理”，应同时并重，不可执之一偏。先师晚年撰《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一文，根据《易传》所引孔子言论，评析了孔子关于品德教育、智力教育、体育教育、交友教育、处世教育、治民教育和哲学思想教育及学习与施教、语言文学修养等方面的理论，这显然又是对《周易》义理学的一个重要发挥。

中国古代的象数《易》家，由于研治者的特定倾向及主观发挥，兼之时代学术风尚的影响，往往有流入阴阳“术数”之途者。对此，先师并不赞赏，但同时认为，它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学术现象，也应当对之进行冷静的探讨，明其是非，辨其真伪，考其得失，决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而一概排斥。尤其是对“术数”学说中的可取者，先师更认为必须慎而择之，不应听其废绝。如汉魏期间，《易》家好言灾异，多含阴阳五行占验之术，其中间有可据以考察古代礼制、政治思想者，更有直接关涉到解说《易》旨者，先师以为皆值得汲取参考。他曾在论述西汉京房《易》学时指出：“然而，《洪范》演五行，《周官》设眡祲、冯相、保章，《左传》载鲁梓慎、郑裨灶、晋卜偃、宋子韦之言讥祥祸福，著乎天而应乎人，人主因之恐惧修省。……《易》道之大，无所不该，王弼以道家言解《易》，杨简以佛家言解《易》，尚得名家，况京氏为汉《易》之宗，听其废绝，不可惜哉！”（《易学群书平议》卷一）又对清代张惠言斥干宝以术数言《易》为“颠倒乖舛”之论论曰：“然纳甲为汉儒所通用；五行坎水、离火、坤土、震巽木，于《蛊》、《巽》言‘先甲后甲’、‘先庚后庚’，于《革》言‘己日’。是以干支、五行说《易》，未足为干氏之病。惠言所斥，不为尽公。”（同前）

这两节论述，以扎实的例证、透彻的辨析揭示：京房、干宝诸家虽以术数言《易》，然其说亦颇有可取而不宜简单排斥。这是一种求实的观点，由此也可见先师治《易》兼收博取风格之一斑。

三、树立良风 启迪后学

作为一位数十年服务于高校的学者、教授，先师的《易》学成就不仅仅体现于他自身的学术创获，又体现于他继承传统的优良学风，为启迪后学而精心培养学术人才。

先师自早年即长期接受传统学术氛围的良好熏陶，形成了至为严谨的治学风格，其中，乾嘉学派注重名物考据的“朴学”之风，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他所师从的名流学者中，除尚秉和先生之外，章太炎的高弟吴承仕先生也对他十分赏识。先师从吴先生身上，既继承了他最为精湛的《三礼》学说，也继承了章氏门下的治学之风。此外，对马振彪、高步瀛、杨树达、范毓桂、余嘉锡、孙人和、朱师辙、林义光、唐兰等学术界卓有成就的学者，先师均曾执弟子礼。转益多师，这对于先师的既坚持正统而笃实的治《易》态度、又不拘一家之见的治学精神的形成，显然产生了极其有益的作用。

当然，先师严谨不苟、注重考据的治《易》之风的真正形成，又与他丰富扎实的学术实践关系至大。30年代末，先师曾随尚秉和、吴承仕两先生参加《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撰稿工作，先后撰成《易》类提要130余篇、《礼》类提要60多篇，并负责整理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这次学术实践，使先师接受了最为严格的传统治学方法的全面训练与考验。他后来把所撰《易》类提要编为《易学群书平议》7卷，全书在考辨周密、体例谨严、论断平允方面，均可上承《四库全书提要》而补其未备。尚秉和先生在《序》中称：“凡解《易》之书经黄君商订剖析，其是非得失，判然立明，如镜之鉴物，妍媸好丑，毫无遁形。”

先师所撰诸多《易》学著述中，无论是一部专著，还是一篇短文，都体现着一以贯之的考据功力与严谨之风。他博通《易》学群籍，而不为哗世取宠、无根附会之曲学；他既精象数，又不为违反科学的迷信之说。更为可贵的是，先师努力以自己的这种学风培养下

一辈学生，毕生为启迪后学而不惜耗费自己大量的精力。他的《论易学之门庭》、《周易名义考》及《易学群书平议》等著作，都足以使研《易》者汲取诸多有益的学术养分。

先师长期执教于北京、福建高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中，以他精湛的《易》学成果与严谨的治学风格，培养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周易》研究人才。凡有人求教《易》学问题，不论其是来信或是来访，亦不论其资历高低，先师均尽心尽力予以周详备致的解答。对于亲自培养的学生，更视同自家子弟，尤其注重在治学方法上给予严格的指导，虽至晚年，其志弥笃。

笔者曾是先师门下的首届研究生，对先师呕心沥血地培养后学之大德感受至深。记得我与先师合撰《周易译注》、合编《周易研究论文集》之时，他已是年迈体弱的老人了，但每当我把某一阶段完成的文稿、编稿交奉他审阅时，他总是夜以继日地精批细校，有时为了考证某些疑点，还不辞辛劳地查检大量的学术资料。至今，翻阅当年先师批校过的旧稿，每看到那或红或绿的蝇头小楷——往往署着“六庵老人某日凌晨某时校迄”——老人家为后学成长而彻夜不眠、伏案劳作的情景恍若就在眼前，不禁潜然泪下。更令人感动的是，每当我在《周易》研究领域获得微小成果，先师总是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对我多番嘉勉与鞭策。我深深感到，我所以能够取得一些学术成果，是与先师的精心教诲分不开的，它们都是先师以精粹的学术传统启迪后学的思想结晶。这一点，或许是所有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先师门墙下的学生们的共同感受吧！

先师在《六庵易话（二）》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余所知历代《易》家，寿最永者，无过邵宝华；命最短者，无过江承之。宝华，清嘉庆间人，西平布衣，著《周易引端》，卒年一百又三岁。承之，歙人，从学于张惠言，著《虞氏易变表》，殒时年仅十七。然承之书，奥行闳深，非专门者不能通其意。而宝华竟不知《乾凿度》为何物，书中屡称“乾氏日”。余尝谓以宝

华较之承之，则宝华真枉活百岁，白吃了许多馒头，诸生为之哑然。世之欲以年资骄人者，观于承之，宜知所愧也。

此论虽含某些诙谐色彩在内，然先师在学术上寄希望于年轻一辈，不“以年资骄人”，甘为后学铺路垫基的崇高品格，油然而现于字里行间。

总而言之，从先师博究《周易》群籍的深厚功力到一贯坚持严谨细密的传统学风的治《易》精神，从他精研《周易》象数、义理之学而又不废术数学说的大家气度到他努力奖掖启迪后辈的无私品格，人们不难看到令人景仰的一代《易》学宗师的学术成就与崇高风貌。《周易》的《系辞传》云：“苟非真人，道不虚行。”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进程中，我们要永远记住为传道授业而奉献毕生心血的前辈学者。

1992年11月初稿

1993年2月再稿

张善文 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副所长，中文系副教授

黄寿祺自传

闽东霞浦县西南，有一个依山傍海的小市镇，名为盐田镇。1912年农历八月初四日，我就出生在这里。这一年，正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年，即民国元年。

我父亲名韶，字凤石，是清朝末年的文秀才，一生以中医为业。他替我取名寿祺。我幼年时读《诗经》至《大雅·行苇》篇，见有“寿考维祺”之句，曾问父亲：大人为何名我“寿祺”呢？是否取这句诗的意义呢？他老人家说：你的名字，自然原本于此诗句。但是在清代乾、嘉年间福州有个名叫陈寿祺的，是我省著名的大学问家，在全国也是有名的，我希望你长大以后也能成为像他那样的学者。后来，我到福州读书，就注意寻求陈左海父子的书，这和我父亲的教育是有关的。

我的太高祖曾从宁德县的石堂乡迁居霞浦，所以我家在霞浦县算是“客籍”，当时屡受本地大族的欺凌。我祖父名金铭，字谨三，他决心振奋自强，发誓要教育子孙读书上进，亲自督教，要求甚严，他这种思想对我也是很有影响的。

真正开始我的启蒙教育的，是我祖母毕氏。我5岁那年，她教我认字，诵读《三字经》、《千字文》。6岁时，我入家塾就读，塾师是我祖父丈何子硕（宗乐）先生，塾址设在我家厅堂。3年后，读完《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并读了

一些短篇的古文，也学做了许多“对子”，对写字颇有兴趣。

何子硕先生于1920年正月病故，祖父就送我到城内的圣教小学读书，编在初级小学三下。我因年纪太小，不会自己管理生活，全身长满虱子，时常患病，只半年，祖父又命我辍学回家，由他自行授读，除重温《孝经》、《四书》外，增读一些古文。次年春，祖父又命从塾师何树人（宗楷）先生受业，读了《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3年中习作文言文数十篇。当时我甚为何先生所钟爱，何先生常在我祖父、父亲面前夸奖我为黄家的“千里驹”。

1924年，我13岁，何树人先生病逝，祖父遂再送我到城内县立第一小学读书，从此结束了7年的私塾教育。到了第一小学，我便从高小一年级下期读起。那时改行新学制，高小改为二年毕业，并用白话课本。但小学教师均是前清老秀才，他们都喜爱有古文基础的学生。我曾在私塾读过一些书，会写一点文言文，又喜欢写字，因此很为教师们夸奖。在纪念20周年校庆时举办的成绩展览会上，我的作文和书法都以全校第一名获奖。

1925年夏，我高小毕业，考进福建省立第三初级中学。中学的国文教师，又都是前清的举人、贡生，他们也喜欢教古文。特别是福鼎县的陈筱猷（咸熙）先生，他是林琴南（纾）的崇拜者，我受他影响很深，开始阅读林琴南的各种译文、著作，对桐城派古文家甚为向往。

我在初中期间，有两件事记忆最深：一是霞浦县志局正在纂修新县志，参加者多是我中小学的老师，而我父亲和岳父严寅川（恭之）先生也都担任了采访工作，我曾被找去帮助抄写和校对，这引起了我对地方文献的关心。二是我在读初三时，按当时的规定，毕业班学生可以外出修学参观，我因而得偕同班同学去福鼎县及浙江省的平阳、瑞安、永嘉等地中学参观，并游览了闽东的

太姥山、浙南的雁荡山等名胜风景，写下了一本旅行日记。回来后，学校竟把这本日记油印成册分送给校内的同学及省内各中学的图书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的文字，也使我体会到外出游学的乐趣。

1928年秋，往福州投考高中。考上福建省立福州第一高级中学。该校分师范、普通、商业三科，我报师范。但因师范科每月有助学金，外县人争不过福州人，录取时却被分配在商科，我因而生气不念，即再去投考省立福州第一高级中学第一分校（不久改名为福州理工中学），录取后读理科化学组。当时名为学理科，实则大部分时间仍在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那时我翻阅过大部分的《正谊堂丛书》，手抄过元末明初理学家吴海的《闻过斋集》，这就培养了我后来研究宋元明哲学的兴趣。同时，我找到了陈左海父子的一些著作，特别喜欢读左海所著的《东越儒林传》、《东越文苑传》。是年，《霞浦县志》出版，我17岁，对此书并不满意，想加以订补，便根据闻见所及的闽东旧资料，写了《霞浦县志文苑传补》十多篇，今原稿已不存，只记得有一二篇后来在《北平全民报》副刊发表过；又写了一册《福宁人士记》，现原书亦不存，只记得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东坡有言：“先生不述，后生何传？”余今日之后生也，传先生之所述；后之生者，又将传余之所述。立言不朽，有志未逮，噫！此其所以为记欤？此序极为国文教师林宗炎（炳昆）先生所激赏，评为：“斐然有述作之志，慨乎其言之也！”我之有志从事著作，实自此时始。

二

1929年秋，与同学杜悦鸣（琨）赴北平投考大学预科。因高中一年级功课结束得晚，又因家里筹措经费耽搁了一段时间，到北平已是旧历八月初一日，国立大学招生已过，只得投考私立中国大学文科预科。录取后在学两年升入本科国学系，又4年毕业，

得文学士学位，时年 24 岁。

在中国大学学习 6 年，所从游的老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章太炎（炳麟）先生的弟子，他们的学问，大体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传统，以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目录、校勘，以及三礼名物的历代典章制度为主，遂使我接受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的影响；一类是吴挚甫（汝纶）先生的弟子，以写古文和旧诗为主，使我接受了桐城派文风的影响。其中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共有 5 人：

马岵庭先生，名振彪，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古文大师马通伯（其昶）先生的侄儿。他除继承桐城派“学行踵程朱、文章继韩欧”的衣钵外，更潜心研究佛学。他一面在中大教授，一面在北平弘慈佛学院讲学。因此，我在中国大学作正式生时，又在弘慈佛学院作旁听生，使我得以交了一些和尚朋友。

尚节之先生，名秉和，自号“滋溪老人”，学者称为“槐轩先生”。他是吴挚甫先生的弟子，不仅擅长诗、文，兼通史学，对《易》学研究尤深。他著书数百卷，最著名的有《辛壬春秋》、《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周易尚氏学》、《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周易古筮考》、《易说评议》等。我研究《周易》，主要是得到他的传授。他所著《焦氏易詁》是我协助写成的，他并命我为写一篇序文。他还精研禅宗，曾教我读《法宝坛经》和《五灯会元》等书。

高闾仙先生，名步瀛，河北霸县人。他也是吴挚甫先生的弟子。以研究《昭明文选》及唐宋诗文著名，他后来出版的《文选李注义疏》、《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等书，有的我曾为抄写，有的曾为校对。

林公铎先生，名振，浙江瑞安人。他是永嘉学派的继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常不满胡适的言论，为胡适所排挤而南下就中央大学教授，抗战期中逝世。我学习宋元哲学，注意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的研究，是受他的影响。

吴检斋先生，名承仕，安徽歙县人。他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弟子，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以精研“三礼”著名于世。他对我的学习成绩颇为赞赏，当时我除在课堂听讲外，并承他之约每星期五上午到他家里面授半天，若是者历时3年，给我以极深的教益。

中国大学老师对我有影响的，还有长沙杨遇夫（树达）、武陵余季豫（嘉锡）、盐城孙蜀丞（人和）、黟县朱少滨（师辙）、胶西柯燕舲（昌泗）、恩县任泽普（化远）、闽侯林药园（义光）、秀水唐立厂（兰）以及沔阳陆墨庵（和九）、陆颖明（宗达）诸先生。

此外，非中国大学教授而有影响于我者，则有建宁范秋帆（毓桂）先生，他曾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和私立四存中学任教，于《周易》及《左传》用力甚深，也都有著作。他又曾参加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凡入声之部，皆先生一手所辑成。

在大学6年，我从未涉足歌楼舞榭，甚至名噪国内外的京剧也未曾看过一次。当时被同学们笑为“大书呆”，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够呆了。

年轻的时候，易萌自满情绪。记得预科毕业那年，曾将20岁前所作的旧诗200余首抄成一册，定名为《霞山诗草》，送呈尚节之先生审阅，他阅后在书皮上批道：大诗读毕，用朱墨为识。大抵今日之所惜，他日虽欲存之而不能，此不能强，时至自知。这给我很大教训，打垮了我一向自高自大的心理，后来作诗文，便不敢随便乱凑了。本科以后所作的诗，曾删存为《六庵吟稿》（后来定名为《北学集》）一卷；又有古文数十篇，定名为《六庵文稿》；此外还写了《闽东风俗记》一册，包括岁时、冠笄、婚姻、丧葬、祭祀等十篇。这三种稿件均曾在北平《中和报》文学副刊发表过，其中诗文只零星登出，《闽东风俗记》则连篇刊载，但未曾登完，原稿一册后被人借阅亡失。

三

1935年7月大学毕业，由尚节之先生介绍入北平私立燕冀中学和嵩云中学任教。这时，我拟归乡探亲后再回北平教书。不料到家后被地方人士挽留任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兼文史地教员。但不久因表扬当时的进步学生陈子英（陈后来成为烈士），为县长兼校长的张灿所斥责，为其所解聘，并勒令出境。因此仅在职4个月，即复往北平。

重返北平后，即往嵩云中学任国文教师。仍从尚节之、吴检斋、高阆仙诸先生受业。

当时全国抗日思潮高涨，1936年8月，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下令考选平津保各大学毕业生，以培养抗日干部。我在吴检斋先生的鼓励下报名投考。榜发后，取500名，我以中国文学系甲等第三名录取。主考刘哲（字敬舆、东北人）将我在3小时内所作的两篇文章送北平《晨报》发表，并加总评云：“两艺文笔简练，末幅尤为警策，足徵积学之士。”主考在报纸上公开地给我这样的评语，使我在同学间威信颇增，这对我后来回到母校当讲师，是不无好作用的。

录取后要到南苑受军训4个月，我当时还顾虑体力吃不消，吴检斋先生又来鼓励我要去受军训，说锻炼后身体才会好转。又说训练班主任是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他和佟将军认识，佟虽是行伍出身，但有爱国思想，为人甚慈祥，军中号为“佟菩萨”。他还说要为我介绍。我才决心去受军训。佟以我年最少，竟以高第录取，又承吴先生介绍，对我很照顾，告队长班长等人要原谅我体弱，允许我唯力是视，不大受军训的严格管束。佟将军还在课余之暇叫我讲《周易》哲学的原理，并请我代作过一些应酬诗文。此时我除读军事书籍外，还翻阅过《王阳明全集》，其中《传习录》一书则曾精读。当时并写了《南苑受训杂录》一册，可

惜七七事变时亡失了。

军训毕，分配到冀察绥署参谋处当“服务员”，处长宋梅村派我在第三科（总务科）工作，负责统计处内人员的出勤率。在军事机构中缺勤是很少的，所以我等于无事可做，终日伏案点《十三经注疏》，并为同时分配在一处工作的训练班同学张达夫讲《周易》。当时中国大学孙蜀丞先生到民国大学兼国文系主任，曾来信约我兼任“作诗法”课程，每周两小时，我向处长宋梅村提出要求，宋不准在外兼职。但此事却使处内外人员对我另眼相看，认为我年纪不大却配在大学教书，大概总是不错。参谋处第三科科长卢凤策（自介是清代著名学者卢见曾的后人）常见我在读《雅雨堂丛书》，就对我说：“这是我祖辈所刻的，原刻板还存在我家祠堂中。你能读这种书，足见程度是很好的，叫你统计出缺席，难怪你无聊。”他因此建议宋梅村改派我编写书报提要，后又让我编写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战史，给我一大堆材料，叫我自己计划编写。我认为要研究意阿战史，必须先弄清楚阿比西尼亚的情况，遂拟定先写阿比西尼亚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北路战况、中路战况、南路战况等十二章提纲，取名《阿比西尼亚王国记》，只写了一半，即因七七事变而中辍，后来连原稿也不存了。

在绥署工作期间，宋哲元于保定莲池书院旧址设立了莲池讲学院，礼聘河北老学者梁式堂为院长，我的老师尚节之、高阆仙诸先生均受聘在该院讲学，我也曾报名为院外研究生。在绥署中我曾写过三封与尚先生讨论《周易》的信，尚先生复我两封，不久，这来往的五封信均由尚先生介绍在北平《晨报》副刊《艺圃》上发表。我与尚先生讨论的内容，即就他关于《易》象的某些观点进行商榷，尚先生对我的意见作了肯定，并称许说：“非执事，孰能有此疑，孰能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哉！”（《答书一》）又说：“《易经》既深有所入，既当继续用力，成此绝学，甚善甚善。”（《答书二》）后来吴检斋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即全数转载入他所

主编的《中大学报》创刊号，并为我写了一篇跋文，作了好评。当时以为该创刊号即将出版，未将跋文抄下，不料才印刷毕，尚在装订，而卢沟桥事变起，终不得发行，现不知世间还存有此刊物物否？解放后，有人告诉我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博士写有一部《变化的书》（1960年初版于莫斯科，1978年为美国转译，英译名为《易经研究》），此书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列举了我的论《易》三书及尚先生的复书。

从1936年8月投笔从戎，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段时间我在南苑受军训4个月和在绥署工作7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的特殊经历，除此11个月之外，我均以教书为业。这时期，我们这些大学生初出校门，人人自以为满腹经纶，可以藉此大展才华，却不料日寇步步侵略，卢沟桥事变猝起，终麟阁将军及赵登禹师长等均抗战阵亡，宋哲元率所部南撤，我因是下级人员，无人过问，遂沦陷于北平。因此我的思想极度悲观，兼之贫病交加，无力归乡，只能在风雨飘摇的危城中教书以糊口。记得当时写过这样的短诗：我亦天涯悲作客，第余热泪洒神州。遗山不死灵光在，野史亭城待访求。（《题赫上谷龙恩耕墅助读崔图》）可见，我当时的思想一方面对祖国大片土地的沦陷无限悲愁，另一方面却寻不到出路，内心无限凄惶、感慨，想如元遗山之写“野史”以安身立命。

四

沦陷期间，我又回到私立嵩云、燕冀两中学任教，所教均为古文。是时尤喜禅宗。逾年，吴检斋、孙蜀丞诸先生邀我返回母校国学系任讲师，教授《易经》、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唐宋诗选和杜甫、黄庭坚、元好问诸家诗专集，至1941年冬返闽而止，历时凡3年有半。

早在1925年，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以日本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为经费，组织中日学者计划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我的老师

尚节之、吴检斋诸先生均受聘参加撰写提要的工作。初时我曾协助吴先生写了几篇“礼”类提要，代替尚先生写了100多篇“易”类提要；又以我自己的名字写了“易”类提要30篇，“礼”类提要60多篇，还整理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全书原稿今尚存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系根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油印本印行，实际只有原稿的一半。台湾版序言中说：“关于撰著提要及负责整理之人，据桥川氏告我国何朋氏，共有85名，皆为积学之士，其中尤多为目录学者。至于负责各类整理工作之人，大致如左：（甲）经部，易类，柯绍忞、吴承仕、尚秉和、黄寿祺；……礼类，胡玉缙、吴承仕、黄寿祺、吴廷燮……”序言中“易”、“礼”两类都列有我的名字；但该书正文所收的提要却相当不全。因此，我认为国内所藏全稿今天还有重新整理出版的必要。日人桥川时雄曾拜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孙蜀丞教授为师，也曾多次拜候尚节之先生，所以对我有了解，他在1940年编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说我师事尚节之先生，治《易》“精苦刻铭”。

在北平的最后3年半，我父亲、祖父相继逝世，我无法奔丧回籍，悲苦之极，以沦陷区遗民自处，内心所景仰的人物是郑康成、陶潜、王通、戚同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贤，妄想“为往圣继绝学”，撰写《周易通考》、《周易集解义疏》、《周易正义新疏》三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料岁月蹉跎荏苒，迄今未有所成。

1939年秋，吴检斋先生突然逝世，传闻系日寇收买医生害死了他，校内师生无不痛悼，国学系主任孙蜀丞先生遂命我整理吴先生遗著。至1941年11月，吴先生著作已整理出47种，并写成《先师歿吴先生之著述》一文。此时又闻母病甚重，遂决计南归。才到上海，适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路不通，便从杭州、金华、温州陆道返闽。

我在沦陷区北平近4年余中所著，有《易学群书平议》（初名《六庵读易录》，中改《易学群书述评》，后改定今名）7卷130篇，《汉易条例》5卷，《六庵易话》（原名《嵩云草堂易话》）1卷，《六庵读礼录》1卷，《丧服浅说》4卷，《宋儒学说讲稿》14卷，《明儒学说讲稿》7卷，《历代易家考》5卷，《历代易学书目考》1卷，《尚氏易要义》2卷，并有《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南归之日，因日寇在北平正阳门东车站检查，不准携带书稿，临时转寄正阳门外兴隆街邵武郡馆范秋帆先生家。不久，范先生病故，范夫人发疯，子又年幼，辗转迁徙，无处寻觅范家下落，以致各稿俱亡。今惟《易学群书平议》、《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三种因有副本尚得幸存。

五

1941年12月，我回到阔别多年的霞浦故乡。母亲一见我归来，积年长病霍然痊愈，我喜出望外。

归闽前，我曾函告旧同学杜悦鸣。当时杜在永安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文史地科任讲师，他接信后以告校长唐翼冲（守谦），唐即聘我为文史地科副教授。因此，我南旋后便无失业之忧。

次年初，我动身赴永安就师专教职，途中曾为海匪所洗劫。居永安半年，随校迁往南平水南。是时，文史地科主任为章靳以（方序）教授，国文教师仅我和杜悦鸣、包笠山（树棠）等人，工作顺遂。至1944年夏，校长一再换人，新聘教师人数渐多，教师间颇多矛盾，兼之水南气候不佳，我常患疟疾，时欲避地他去，故曾拟应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易园（遵统）教授之聘，到协大任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后以协大校址在邵武，气候与南平相同，疟疾尤甚，未果往。1945年2月，遂应国立海疆学校聘，离南平往仙游。在永安、南平3年中，所撰书稿有《先秦文学史》1卷，《左传要略》1卷，《世说新语注引书考》1卷，《六庵别录》1卷，

《水南读书札记》1卷,《南旋集》1卷。

国立海疆学校是新办的,我幻想或有些新气象。不料到海疆才几天,校长又换人,新校长一到任便计划迁校,半年后果迁往南安九都,仅一年,又欲迁往泉州,校事纷乱如麻。当时学生屡闹风潮,我总是替学生说话,同事们号我为“小钢炮”,且有人怀疑我是共产党,其实当时我与共产党是毫无关系的。我只是时时愤慨,自起别号为“巢孙”,意为“黄巢之孙”,与友人徐君藩写信常用此名,表示对现实不满。由于看不到中国的光明前途,我常萌厌世之念,想出家修行。那时我心中最钦敬的人物,是以艺术家而出世修行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我住在莆田涵江的囊山寺上,从和尚们那里听到了胜利的消息,顿觉国家从此有了希望,一时欣喜若狂,从囊山寺上飞跑下来。是年10月10日,还专程从南安九都奔赴泉州加入庆祝国庆的狂欢游行。但是,过了一些日子,眼看胜利后的国民政府依然毫无振作的气象,消极悲观之心,至此而极。

1946年春季后,我便决计离开海疆学校,回到福州教书。先被人介绍到福建学院任国文教授。不意师专旧同事陈建行(秉乾)、姜芝隐(子润)诸教授闻我愿回福州工作,就请校长再聘我回师专(当时已从南平迁校福州)。而师专的学生们也纷纷来信欢迎我回校。我遂辞福建学院而回师专。回顾在海疆学校一年半,只写了《群经要略》11卷及诗文杂著《海疆集》1卷。

我重返福建师专不久,校长又换人。当时国文科主任严叔夏回协和大学任教,新校长拟请厦门大学林庚当科主任,林未至,即让我代理科主任。是时国画家潘天寿在杭州国立艺专当校长,前师专艺术科教授吴弗之(谥)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吴能画擅诗,与我交谊甚深,他来函、电促我赴杭州任艺专国文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我觉得杭州风景优美,研究文学的条件也比福州为佳,

颇欲前往。而新校长以林庚决定不来，并见杭州有人拉我，遂正式任命我为国文科主任，不让我赴杭州。逾年余，校内之纷乱与海疆相等，我又想离去。恰好汕头的南华大学文史系托我的业师朱少滨先生（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聘请教授，朱先生遂介绍我去南华。我正欲前去，又逢换林馨侯（天兰）先生为校长，林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又是师专的老教授，曾和我为诗友，他不愿放我去南华，于是我继续在师专任国文科主任。

在重返师专任教的3年中，因教师缺乏，我先讲授过《左传》、《诗经》、《楚辞》、《庄子》、《史记》、《汉书》等专书和文字学、训诂学、经学概要、国故论著、要籍目录、历代散文选、诗歌选、词曲选，以及国文教材教法、各体文习作、教学实习、大一国文等十多种课程。这3年中，我虽未著刊过一本专著，但编写了多种教材和讲稿，涉猎的方面颇广泛。

更可喜的是，我在师专发现了一位高材生叶挺荃，他学业优良、思想进步，领导校内的学生运动，时时向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使我对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而寄希望于共产党，实自此时始。叶挺荃后来为革命牺牲，成为烈士。我始终认为，叶挺荃虽是我的学生，实则他是我学习共产主义的启蒙老师。

六

1949年8月，福州解放。林馨侯先生留任师专校长，我仍为国文科主任。同时军管会派胡允恭（邦宪）同志来当军代表，未几接管，胡就任副校长。1950年2月，林校长辞职，胡副校长升任校长。同年秋，师专改院，国文科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系，我续当系主任。

我当时对胡院长所采取的“破旧立新”政策，有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同时，他不知听何人说我学《周易》只会卜卦，对我的印象也很不好。因此我的消极情绪大增，乃至想回家当中医生，卖

草药糊口。旋即提请辞去系主任兼职，推荐郭展怀（虚中）同志接充。后来，胡院长通过和我接触并深入调查了解我的情况，对我的看法渐有改变。1951年秋，他即派我担任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图书馆主任，兼院务委员；半年之后，他即大力肯定我整理图书、接收福建学院乌山图书馆、主持大一国文教学小组等工作的成绩，并提议选我为“模范教师”，甚至在全院大会上表示要投我一票，可见他对我的印象大大改变了。

此后，历“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重大政治运动，院领导多次更易。1953年中文系设工作组，我被任为组员（相当于副系主任），不久即改为工作组组长（相当于系主任）；1956年中文系复设系主任，我再为中文系主任，直至1966年“文化革命”被停职审查为止。

回顾解放后的17年，我工作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祖国不断强盛，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我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1958年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表明我对党的衷心向往。然而，我对17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某些错误倾向也未尝不偶有所觉察。尤其是对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问题，以及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问题，我深怀隐忧。对学术著作，顾虑亦颇多。及今回顾我在“文革”前17年中所发表的著作，只有《汉易举要·孟氏易》1卷。其它如《六庵读书札记》、《六庵日录》等，均未曾发表。此外，曾参加集体编写《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福建文学史稿》、《清诗选注》等书的工作，并被推为主编或总纂。此段时间，旧体诗歌写了270余首，编为《朝阳集》，并曾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部分。

17年中，我可引为自慰的是，我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无所吝惜地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尽管在多次运动中我屡受“冲击”，但我始终不忘人民教师的崇高职责，教学工作，事必躬亲；学生有问，答必详尽。每当自己的学生有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我便感

到无限的欢愉与安慰。

在这17年中，我于1963年秋至1964年夏，曾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而在1963年国庆节，我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同年11月，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第四次扩大会议，并承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同志的接见，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事。

七

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使全国各条战线遭受了一场浩劫，文化界首当其冲。

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这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只是对自己遭受到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深感苦痛，对被劫掠去的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资料、手稿等极度惋惜。特别是其中有先师尚节之、吴检斋、高闲仙诸先生与我讨论《周易》、《三礼》以及诗文的数百封具有学术价值的信件，悉数毁灭，尤为痛心。每当回想起这些散失的材料，总勾起我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愤恨。

1966年5月起接受“审查”，历时将及4年。1970年2月下放周宁县农村接受“再教育”，又历时两年半。至1972年8月福建师大成立（由原师院改名），才又被调回师大任教授仍兼中文系主任。

1974年，我被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调去注释明代李贽的《焚书》、《续焚书》，并担任注释组的总纂。当时正是“批林批孔”的盛时，我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空前的颠倒历史之风，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位300多年前的李贽，他的著作中明明充斥着大量的唯心主义思想，怎能把他捧为“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呢？他明明不是“法家”，怎么硬说他是“法家”呢？学术的良心，使我不能信口雌黄。我找了各种资料，说明李贽受《周易》的影响、受道家的影响、受佛教的影响，辩白李贽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唯心主义的。

我还指出，李贽并非反对真孔孟、真道学，他反对的只是“伪孔孟”、“假道学”，事实上他是孔孟的信徒。然而，这种叛“帮”离“线”之说，谁能同意？又谁敢同意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作违心之论，因此，从注释工作开始到未终而结，我总是坚持我的学术见解：李贽著作有研究的价值，但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不是法家，指出他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糟粕。

十年浩劫期间，前4年关在“牛棚”里，除写《劳改日记》及无穷无尽的检讨外，别的皆不能写。下放两年半写诗词270余首，定名为《山居集》。在注释李贽《焚书》、《续焚书》期间，曾写了一些札记，定名为《注李贽墨》。

八

“四人帮”垮台了，举国欢欣。

1979年，我被任命为福建师大副校长，这使我深深感到党的信任和肩负的重担。

同年，我招收了4名先秦文学研究生。

在垂暮之年，我想的是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贡献，在学术研究上、在培养学术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中竭尽余力。我的一些诗句，如“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但期薪尽能传火，却望才良早入班”之类，正表露了我的真实感情。近年来，我除了为研究生讲授先秦文学专书外，曾发表了《漫谈古典文学的自学与讲授》、《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几点体会》、《作家应该向我国的古典文学优秀传统学习》、《周易名义考》、《论易学之门庭》、《六庵易话》（一、二）、《六庵诗话》等文，编辑了《学易初阶》讲义，与陈祥耀同志等修订了《清诗选注释》，并同研究生张善文合写、发表了《“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一文，同梅同生合写了《楚辞全译》一书。又编近年来所作诗为《华香园集》，词为《蕉窗词稿》。同时，我正准备重新

补写已经亡失的《历代易家考》、《历代易学书目录》，并准备编写《中国易学史》以供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同志们参考，还想写一部《周易译注》以供初学《周易》者参考。能否写成，尚有待今后的努力。

使我毕生永记的是，1981年6月20日，党组织接收我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今年7月1日又承批准转正，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回顾从20年代赴京求学以来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其中交织着长年不懈的学术探研，坎坷艰辛的生活境遇，以及变幻不测的政治风云。然而，自解放以来我在心中树立起的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向往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却未尝一日消失过。去年，我在加入党组织的会议上说过：“党今年60岁，我今年70岁，论年龄，我比党早生10年，但是，今天我刚成为党组织的一员，我只能说是党初生的婴儿……”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终究要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受业张善文笔录于1982年8月）

黄寿祺年谱简编

黄 高 宪

1912年(民国元年)农历八月初四(公历9月14日)丑时,黄寿祺生于福建省霞浦县盐田镇。黄寿祺的祖父名黄金铭,字谨三。黄金铭18岁时其父就去世了。他一面经商以养活母亲及弟妹,一面刻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他参加了几次“文生”考试,由于准备得不够充分,均落第了。由于身强体壮,后来就弃文习武,36岁时考取了武秀才。他将武艺传给两位弟弟,他们也都考取了武秀才。金铭公在福州经营茶叶生意多年,后因年老多病,不能经商,便回盐田镇设私塾教学童,1939年春逝世,享年78岁。他教黄寿祺读《四书》、《诗经》、《左传》等,使黄寿祺在少年时期就奠定了良好的古文学基础。金铭公生有两男,长男名韶,即黄寿祺的父亲。黄韶(1886——1937),字凤石,19岁时考取文秀才(名列第二)。据《霞浦县卫生志·医林人物·黄凤石》载:“(黄韶)曾先后考入福建陆军讲武学堂及全闽高等学堂。后弃儒学医,闭户读医书9年,始为人诊病,辄有效,求医者踵接于门。30岁而后,医名日著。为人治病不受人酬,见贫困者并常资助药物,以是尤为乡里所敬重。民国26年夏秋间瘟疫流行,带病为群众治疗,终因劳累过度,病逝。……后人将其平日医案、验方写成《趋庭随笔》一卷,惜皆毁于倭难中。”黄韶喜欢研究《周易》,黄寿祺受其父影响,对《周易》特别感兴趣。黄寿祺的母亲名郑莲姿(1887——1973),是福安县松罗乡松罗村人,

生有三男三女，黄寿祺系长子。

1916年开始读书，受教于祖母毕氏。

1917年正月至1919年底，在家塾从祖姑丈何宗乐先生读书。

1920年正月，祖父送他入霞浦县城私立圣教小学读书，编入初小三年级（下学期）。因病，读至暑假便辍学回家。暑假后由祖父教读。

1921年正月至1923年底，在私塾从何宗楷先生读书。除读《四书》之外，还读《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古文笔划百篇》、《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1924年正月，祖父送他入霞浦县城区立第一小学肄业，编在高小一年级（下学期）。在小学读书期间，受到许献其、叶嘉亨、叶嘉贞、王士琛等老师的爱护。

1925年7月，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霞浦县城的福建省立第三初级中学。国文教师陈咸熙先生是林琴南的崇拜者，教其读《畏庐文集》及林译诸小说。从此，他喜欢阅读桐城派文章，同时，也阅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

1926年，与同乡人严惠仙（又名严蕙心）结婚。

1927年秋，与同班同学一起游览了闽东的太姥山、浙东的南雁荡山，并参观了浙江平阳、瑞安、永嘉等地的中学。

1928年7月，初中毕业。同年秋到福州，考入福建省立福州理工中学，编在高中一年级理科化学组，肄业一年。国文教师林炳焜先生很赏识其文学方面的基础与才华，劝其专攻中国文学，于是，他决心读完高中一年级后即放弃理工科的学习，报考大学文科。在这一年里，他读了《正谊堂丛书》，手抄了元末理学家吴海的《闻过斋集》，对研究宋元明哲学产生了兴趣。

1929年8月，赴北平；9月初抵北平，同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科预科，肄业两年。

1931年7月，预科毕业；同年秋，升入本科国学系，肄业4年。

他在中国大学预科和本科学习期间，任课的教师有吴承仕、尚秉和、高步瀛、杨树达、余嘉锡、孙人和、朱师辙、林义光、唐兰、陆宗达、任化远等。在大学学习期间，尚秉和、吴承仕、马振彪、高步瀛、林损等几位先生传授的知识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尚秉和先生系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的弟子，精通诗文，并著有《周易尚氏学》、《焦氏易林注》等著作。黄寿祺从事《易》学研究，主要由他指导、传授。黄寿祺协助他完成《焦氏易詁》，并为此书作《序》。吴承仕先生系章太炎的弟子，当时任国学系系主任，精研《三礼》，黄寿祺受其影响，曾研究丧服之学。马振彪先生系桐城派古文大师马其昶先生的侄儿，他除了继承桐城派“学行踵程朱，文章继韩欧”的衣钵之外，还潜心研究佛学，兼任北平广济寺弘慈佛学院教授。黄寿祺除了向他学习桐城派古文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弘慈佛学院作旁听生，听马先生讲授佛学。高步瀛先生也是吴汝纶的弟子。黄寿祺主要向他学习《文选》学，另外，在经济上还得到他的一些帮助。林损先生系永嘉学派的继承人，黄寿祺主要向他学习宋元哲学。此外，孙人和、朱师辙、任化远等几位先生传教的诗文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

1935年7月，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回到故乡福建霞浦县，担任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兼文史地教员。因表扬其学生能在作文中大胆地揭露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结果被县长（兼校长）张灿解聘。

1936年1月，离开霞浦，经福州，往北平。2月，经其师尚秉和介绍，在私立嵩云中学和燕冀中学教国文，任教一学期。8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决定在北平、天津、保定招考大学毕业生，以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其师吴承仕积极支持、鼓励他报名应试。当时，有数千大学毕业生报名，并分科参加考试。他以中国文学专业甲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9月，被派往南苑军事训练团大学毕业生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班主任、第二十九军副军

长佟麟阁将军对《周易》感兴趣，他为佟将军讲过《周易》。12月，训练班毕业时，他为佟将军代拟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考取大学毕业生训练班同学录序》。

1937年1月至8月，在冀察绥靖公署参谋处第三科工作，同时为河北保定莲池讲学院院外研究生。在绥署中，他写过三封与尚秉和先生讨论《周易》的信，尚先生回了他两封。不久，这五封信被北平《晨报》1937年5月3日、10日和6月2日的副刊《艺圃》刊载。

1937年8月至1939年1月，在北平燕冀中学任国文教员。

1937年8月至1942年1月，在北平嵩云中学任国文教员。

1938年8月至1941年11月，在北平中国大学任国文系讲师，讲授《周易》、《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唐宋诗选》及杜甫、黄庭坚、元好问诸家诗歌专集。

1939年8月至1941年11月在北平华北国医学院任国文教授。

1939年9月，吴承仕先生在天津突然逝世，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孙人和先生吩咐他整理吴先生遗著，至1941年11月，整理出47种，并撰写了《先师歿吴先生之著述》一文。

在北平期间，他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馆撰写过《周易提要》、《三礼提要》多篇。由日本桥川时雄先生编纂并于1940年10月印行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日本版）中载有黄寿祺的传记。此《传记》称：“他（黄寿祺）在中国大学师事尚秉和教授，研究易说，是一位精苦刻铭的学生。”在北平工作期间，著有《易学群书平议》七卷、《汉易条例》五卷、《六庵易话》（原名《嵩云草堂易话》）一卷、《六庵读礼录》一卷、《丧服浅说》四卷、《宋儒学说讲稿》十四卷、《明儒学案讲稿》七卷、《历代易家考》五卷、《历代易学书目考》一卷、《尚氏易要义》二卷，还有《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南归之日，以上书稿无法携带，寄存范秋帆先

生家，不久，范先生病故，书稿全部丢失。由于《易学群书平议》、《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尚有副本，故幸存至今。

1941年11月离北平，经上海、杭州、金华、温州，回到故乡霞浦盐田镇。

1942年2月至1945年1月，在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文史地科国文副教授。1942年5月该校从永安霞岭村迁往南平水南后壑村。他与著名国画家吴谿（荦之）、擅长写旧体诗的包树棠（笠山）常一起评画吟诗，号为“岁寒三友”。10月，生女儿黄幼严。

在这3年中，他著有《先秦文学史》一卷、《左传要略》一卷、《世说新语注引书考》二卷、《六庵别录》一卷、《水南读书杂记》一卷、《南旋集》一卷。

1945年2月至1946年7月，在国立海疆学校任国文科教授。该校1944年秋成立，首任校长张兆焕。1945年1月教育部改派梁龙光为校长。因原省立师专校长唐守谦在该校任教务主任，黄寿祺和徐君藩先生遂同往该校任教。该校初办时设在仙游县金石中学旧址内，1945年7月迁往南安县九都镇，1946年6月迁往晋江（今泉州市）。黄寿祺于1946年夏辞去海疆学校职务，前往福州。在这一年半中，他著有《群经要略》十四卷、《海疆集》一卷。

1946年8月至1950年7月，在福州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国文科教授、科主任。讲授过《左传》、《诗经》、《楚辞》等国学专著，还讲授过《训诂学》、《经学概要》、《要籍目录》、《历代散文选》、《历代诗歌选》、《历代词曲选》、《国文教材教法》等多种课程。在此期间，撰写了《周易名义考》等论文。

1950年8月至1951年1月，在福建省立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教研組主任。

1951年2月至1951年7月，在福建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組组长、大一国文教学小组组长。

1951年8月至1952年7月，任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院

务委员、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图书馆主任，负责完成了对福建学院乌山图书馆的接收工作。

1952年8月至1953年2月，在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1953年3月至1953年8月，在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系工作组组员、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组组长。

1953年9月至1954年7月，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兼系工作组组员。1954年3月起兼任中国语言文学教研组主任，并任福建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省文联）委员。

1954年8月至1955年8月，在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兼系工作组组长、中国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

1955年9月至1966年“文革”前夕，任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8年12月至1961年6月主持编写了第一部较完整的《福建文学史》。该书经四次修订，于1961年9月以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文学史》编委会的名义油印成册。此书虽未正式出版，但它至今仍是研究福建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

1956年10月起，任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副组长。

1959年1月起，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1959年2月起，任福建省文联常务委员。

1960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筹备委员。

1963年8月起，任福建省中国语文学会理事长兼福州分会理事长。

1963年8月至1964年4月，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3年11月，应邀参加在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

1966年2月，夫人严惠仙病逝。

1966年7月至1970年1月，在福建师范学院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批斗等迫害。

1970年1月至1972年8月,被下放到周宁县咸村公社碧岩大队茶广村。全家人随其迁往。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歌咏乡村风情的诗篇。其中不少是与包笠山、王确斋(梦惺)、陈喆庵(祥耀)先生的唱和之作。辑有《山居集》一卷。

1972年8月至1979年7月,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74年9月至1977年4月,任福建省李贽著作注释组总纂组组长,组织编写《李贽著作注释》。在此期间著有《注李贽墨》等。

1976年6月,女儿黄幼严病逝。

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起,任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福建省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领导组成员。

1978年11月至12月,随福建省政协考察团赴江西、湖南等省考察。

1979年起,任福建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

1979年8月至1984年7月,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

1979年8月至1988年底,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张善文、梅桐生、翁银陶、杨际德和郭建勋。

198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10月,赴北京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纪念吴承仕(检斋)同志大会;12月,经济南返闽。

1983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聘为“福建省教授、副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4月至11月,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赴京整理出版吴承仕先生遗著,指导助手整理出吴承仕的一批遗著,其中《吴承仕读书提要》、《吴承仕文录》、《淮南子旧注校理》等书经其审阅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1月中旬,经南京、上海返

闽。

1984年2月,与其研究生梅桐生合著的《楚辞全译》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3月,与陈祥耀教授共同主编的《清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赴山东曲阜参加孔子诞辰2535周年纪念会。会后登泰山、游济南,经蚌埠返闽。11月,与陈祥耀教授同赴湖南长沙参加中国韵文学会成立大会。12月,被中国韵文学会聘为顾问。

1985年2月,其诗词集《六庵诗选》(附《蕉窗词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共选诗532首、词22首,是从其1980年以前所创作的1000余首诗词中选录的)。3月,随福建省政协考察团赴闽东地区考察,到过宁德、柘荣、福鼎、霞浦等县市。同月下旬,赴闽南东山县参加黄道周(石斋)诞辰400周年纪念会。6月,应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赴沪参加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10月,赴宁德市参加冯梦龙学术讨论会。

1986年7月,被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会聘为顾问。

1987年3月退休。

1987年4月至1990年5月,他与张善文合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至第四辑相继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7年11月至12月,随福建省政协参观学习团赴大西南各地,访问了广西、云南、四川等省。

1988年5月,被选为福建中华诗词学会会长。6月,他的《易》学专著《易学群书平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2月,赴家乡霞浦参加霞浦建县1705周年纪念会。同月月底赴宁德市参加建市纪念会。

1989年4月,经西安转赴郑州参加黄河诗会。嗣将赴会期间与赵玉林先生唱和之诗辑为《秦豫行》一册,由福建诗词学会内部印行。5月,与张善文合著的《周易译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同月，被中国周易研究会聘为顾问。7月中旬，应将乐县政府之邀，赴将乐观光、创作，并游泰宁金湖等；下旬应平潭县政府之邀，赴平潭观光、创作。8月，任《福建诗词》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编辑、出版《福建诗词》第一辑。

1990年元旦，省委书记陈光毅、副省长陈明义、省委宣传部部长何少川、省教委副主任叶品樵及福建师范大学领导林可华、朱鹤健、陈一琴、郭荣辉等一同来家拜年。

1990年2月至3月赴美国洛杉矶考察。据美国《1990年华商年鉴》(南加州版)报道，美国易学研究院拟聘请黄寿祺任院长。报道写道：“易学——使人类聪明的学问。由世界易经权威、中国大陆著名易学教授黄寿祺先生担任院长，主持讲授易学原理及易经应用等……”3月底经香港回闽。

1990年7月28日上午9时20分，因患胃癌，医治无效，病逝于福建省立医院。享年78岁。

黄高宪 福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处长，中文系副教授。

六庵先生著述要目

郭天源 编

说 明

先师六庵先生精《易》学，通文史，擅诗书，生平著述甚富。本目主要著录已刊行的专书、论文和杂著，分易礼、文学、史地、综合四类编次，各类之属大致按首次发表时间排序。其中，以“易礼类”为主，略附简要叙录；“文学类”之诗词吟咏，收结集单行本，散见于各报刊的作品，未一一备录；“综合类”收各种序跋记述文章。尚待整理和正拟出版的遗著，如《六庵文录》、《六庵读礼录》、《群经要略》等，亦暂不入目。而《历代易家考》、《历代易学书目考》、《尚氏易要义》、《汉儒说易条例》、《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阿比西尼亚王国记》诸书稿及《闽东风俗记》大部原稿，惜先后散佚于抗战与“文革”期间。

编目过程中，承张善文、黄高宪两学兄提供不少知见材料，并参考了黄玲菁同学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就学时所撰毕业习作《黄寿祺教授著述系年》初稿，谨此藉申谢忱。

· 易礼类 ·

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

《北平晨报·艺圃》1937年5月3日、10日，6月2日；《周易

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尚节之,名秉和,清光绪进士,近代《易》学大师,曾任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六庵师即从其学《易》。此三书就节之先生《易讲义》中有关易象的疑误和《易讲义》、《易诂》两书的异同处,以及《易象释》与《易诂》所存在的矛盾问题,笺陈请教。时节之先生答以二书(亦载《北平晨报·艺圃》1937年5月3日、6月4日),并加勉励:“《易经》既深有所入,即当继续用力,成此绝学,甚善甚善。”上述师生间的论《易》书,在国内外学术界颇见影响,问世当年即被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博士列作其所著《变化的书》之参考书目。

嵩云草堂易话

北平《新光杂志》1940年4月

六庵师执教北平时,曾在“嵩云草堂”寓所居住六七载。《易学群书平议》和《易话》等许多著述,均成于此。《新光杂志》所载《易话》,仅原稿的一小部分。

汉易举要(卷之一)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本文着重就汉易中的《孟氏易》卦气说,先考四正卦、十二辟卦、六十卦次序,公、辟、侯、大夫、卿之始名,每卦六日七分、七十二侯;尔后列举诸卦气图与表,并论其所用。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易类)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出版

30年代六庵师曾参与该书《易》、《礼》类的提要编写,其中《易》类代节之先生撰100多篇,以己名撰30余篇,时辑成《易类书目提要》一册,原稿现尚存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70年代,台湾整理出版《续修提要》,书中《前言》有谓参撰者多积学之士,并列六庵师之名。而所刊《易》类提要,仅北京现存原稿的二分一。

周易名义考——六庵读易丛考之一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中国古代史论丛》第1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本文于考述历代诸家的不同说法之后,认为宜分别从本义和后起义去看《周易》的名义。其本义即“周为代名,易主变易”,其它均属后起之义。如简易、不易、太易等系指易理而言,象则不可言,故非本义;又如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五义,皆不出变易这一本义。

论易学之门庭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1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本文先概述历代《易》学源流宗派,最后强调学《易》的两大原则:一是从源溯流——首须熟读经传本文,考明《春秋内外传》诸占筮,其次观汉魏古注和六朝隋唐义疏,继再参考宋以后经说;二是强干弱枝——以象数、义理为主干,余皆枝附,同时指出:不从古注入手是为迷不知本源,不由主干寻枝是为浑不辨主客。

本文 1988 年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读《周易》札记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1 期;《文学理论研究》第 4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本文与张善文合撰。作者就《周易》在创作过程中所贯穿的“观物取象”这一思维形式,探研其与艺术思维之间的相契处和本质区别。认为其相契表现了古今皆然的文艺规律,其区别则正说明了事物渐进的发展规律。至此,“滥觞”的理论观点据以阐明。

六庵易话(一)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2 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内容凡五端:一、《易》家好怪之害;二、不通《集解》、《注疏》者不足与言治《易》;三、陆元朗以画卦为“名数之初”;四、援引“阿赖邪识”释性;五、《易》所重在象。

六庵易话(二)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周易研究论文集》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内容凡三端:一、探讨《周易》经传作者、时代、名义与影响;二、自述家学与师承;三、评议前代学者。

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齐鲁学刊》1984年第6期;《周易研究论文集》第4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本文将《易传》所引孔子的教育言论,分为品德、智力、体育、学习与施教、交友、处世、治身、语言文学修养、哲学思想几个方面,阐述孔子的教育思想;并对《易传》与《论语》中的有关内容加以对照证明。1984年发表删节稿,1990年刊载全文。

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文心雕龙学刊》第4辑,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

本文与张善文合撰。作者就《文心雕龙》对《周易》内容的直接运用,从卦象之引据、文辞之援用、根源之探究、词语之融化等四个方面深入辨析,以说明《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与张善文合编。选收1908—1984年间国内学术书刊上发表的有关考证《周易》起源、名义、作者、流派和研究《周易》考古材料的专论50篇。

易学群书平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该书撰著于1938—1947年。此10年间。六庵师通览历代易著,并依《四库总目》体例,撰稿134篇,厘为7卷。各篇除著录书名、卷数、版本、作者爵里和各书主要内容外,重点论析其是非得失。时尚秉和、陈遵统先生分别为之序。尚序云:“凡解《易》之书经

黄君商订、解剖，其是非得失，判然立明，如镜之鉴物，妍媸好丑，毫无遁形，学者苟由其说以求之，绝不至有面墙之叹、歧途之入也。”陈序云：“书中搜罗弘富，辨极精确，洵足以补（四库）《提要》之缺略，作后学之津梁。”书稿经40年后公开出版，由张善文校点。1988年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易学群书平议卷之一（节选）

《周易研究》1988年第1期创刊号

选载《周易丁氏传》、《京氏易》、《王肃易注》、《周易王弼注》四篇。

闽人易著提要五篇

《文献史料研究丛刊》第1辑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出版

所载内容选自《六庵文录》未刊稿和《易学群书平议》中有关清代宁化刘文龙的《古易汇注》、漳浦蔡首乾的《周易阐象》和闽县陈懋侯的《周易明根》、《知非斋易注》、《知非斋易释》等五种闽人易学著述的书录提要。

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周易研究论文集》第4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本文与张善文合撰，作者通过对《周易》的阴阳对立观念，以及万物变动不居和革故鼎新思想的分析，揭示《周易》哲学中和谐、相对、创新的美学内涵与意义。此外，还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1988年发表删节稿，1990年刊载全文。

周易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该书与张善文合撰，共10卷。卷一至卷五为上经，卷六至卷八为下经，卷九系辞传，卷十为说卦、序卦、杂卦传。卷首为《前言》、《读易要例》、《译注简说》，书末附《主要引用书目》。全书在译注的

基础上,还撰有 400 多则《说明》和 69 篇《总论》,是一部译、注、论相结合,考据、辨义、阐理、释疑、总结相并重,以全面研讨《周易》经传的新著。1992 年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与张善文合编。选收 1908——1984 年间国内学术书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先秦、两汉、魏晋时代《周易》象数学、阴阳五行学、卜筮学等方面的专论 31 篇,又未刊稿 2 篇,共 33 篇。

与范秋帆先生论易书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2 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写于 1941 年夏。范秋帆,名毓桂,曾任国立北平法政大学等校教授,为六庵师的业师之一。书中六庵师本着不求取象之由则难明系辞之理的治《易》态度,就《解》卦上的关于六爻辞和取象的两个疑问(为探求其象,古今名儒诸说多所论列),向秋帆先生请教。

答包笠山论易书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 2 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写于 1962 年秋。是年,六庵师发表《汉易举要》,笠山先生有两书与之商榷,时六庵师亦以书答,主要围绕所提汉易流派及《孟氏易》等 6 个问题陈述己见。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三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与张善文合编。选收 1936——1988 年间国内学术书刊上发表的有关《周易》义理学,包括经传哲学和唐至清《易》著,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汉代《易纬》、《太玄经》等的研究专论 37 篇。

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与张善文合编。选收1927——1988年间国内学术书刊上发表的以各种新观点、新方法对《周易》与社会哲学、政治思想、文学、美学、语言、数学、逻辑、古代经济思想、法制、天文历法、古代医学和养生学、儒佛道等多学科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专论38篇。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礼类)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出版

六庵师于三礼之学亦精,师承吴检斋先生。前述30年代参与该书编写工作时,除撰《易》类外,还撰有《礼》类60余篇,并为检斋先生代写数篇。

· 文学类 ·

漫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闽江》1958年第1期

漫谈如何研究中学古典文学教材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

试论杜甫绝句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几点体会

《语文学习丛刊》1979年第1期

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学问题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1980年第1期;《语文函授通讯》1980年第4、5、6期

六庵诗话

《蒲公英》1980年第2期

作家应该向我国的古典文学优秀传统学习

《闽西文丛》1981年第2、3期

楚辞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1991年重版

该书与梅桐生合撰。1991年作为《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之一重版。1992年获贵州人民出版社优秀图书奖。

清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该书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六庵师与陈祥耀教授任主编。

六庵诗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该书选编六庵师于1926——1983年间创作的600首旧体诗，分《北学集》、《南旋集》、《海疆集》、《朝阳集》、《山居集》、《华香园集》、《华庐集》7卷，又附《蕉窗词》22首。书中有陈祥耀教授序和俞元桂教授记文各一篇。

善于选择运用好的选本

《文科月刊》1988年第2期

《九歌·河伯》鉴赏

《楚辞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本文与张善文合撰

迢迢牵牛星

《汉诗赏析集》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

本文与张善文合撰

朱熹诗文理论述要

《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出版

本文与张善文合撰

学生古今诗词鉴赏辞典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六庵师为该书领衔撰写人之一，并撰书序。

秦豫行——黄寿祺、赵玉林唱和集

福建中华诗词学会1989年出版

福建诗词(第一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该诗词集系福建中华诗词学会编,六庵师任主编。本集刊有六庵师之“学习海内外作家优良风格,发扬闽中诗派悠久光辉”题辞,并收作品多首。

福建诗词(第二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六庵师仍任主编,本集亦收其作品多首。

从苏颂诗文看北宋朝廷与道教的关系

《上海道教》 1991 年第 1、2 期合刊

《福州师专学报》 1991 年第 2 期

本文与詹石窗合撰

· 史地类 ·

霞浦县志文苑传补

《北平全民报·副刊》 1928 年

闽东风俗记

《北平中和报》 1934 年

六庵师所撰《闽东风俗记》共 12 篇,大部分原稿已佚,该刊仅连载过一小部分。

晋荆扬诸州郡县多于汉代考

《课艺甄选》第一编 北平古学院 1939 年出版

《吕氏春秋·十二纪》与《淮南子·时则训》略同,汉儒辑为《月令》

盖古明堂行政遗文考

《课艺甄选》第一编 北平古学院 1939 年出版

漫话福州

《旅行家》 1980 年第 1 期

· 综合类 ·

焦氏易詁序

《焦氏易詁》(尚秉和著) 1934 年刻本

苏州《文艺掇华》 1935 年

六庵师曾协助节之先生整理撰著《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等书。此序系《易詁》付梓前应节之先生所请而作。

水南读书札记

《南方日报·新畦》 1943 年

关于先师吴承仕先生的材料

《新文学史料》 1982 年第 4 期

福建历代名人传略序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福建历代名人传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梁容若诗存稿序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83 年第 4 期

略述先师吴检斋先生的学术成就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吴承仕同志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关于先师吴检斋先生学术成就的报告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

回忆“一二·九”运动

《霞浦文史资料》第 5 辑 霞浦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6 年出版

风尘呖语跋

《霞浦文史资料》第 6 辑 霞浦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 年出版

竅启吟草跋

《霞浦文史资料》第6辑 霞浦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出版

训诂学概论序

《训诂学概论》(黄典诚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

陇右方言发微序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陇右方言发微》(李恭
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年出版

李贽年谱考略序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李贽年谱考略》(林海
权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出版

空海研究序

《空海研究》(陈国强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0年出版

论文写作指南序

《论文写作指南》(王命夔著)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年
出版

周易辞典序

《周易辞典》(张善文编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出版

编 后

黄寿祺先生是著名的汉语言文学研究家、教育家，古典文学专家，又是才气横溢的诗人。先生一生发奋治学，学贯古今，著述甚富，尤以精研易学，成一家之言，而蜚声海内外。他爱国育才，广布教泽，桃李满园。

先生谢世后，学林痛悼同深。我们特辑追忆先生的纪实性文字，哀成一集，以缅怀先生的业绩和风范。

承先生生前友好、同窗、同事、门人和各界人士踊跃惠稿，诸凡先生之求学经历、治学成就，及学术与社会活动，而至性格操行、诗文交往，均有翔实生动之记述。

承俞元桂、陈祥耀教授于征集与编辑工作多所指导；先生哲嗣黄高宪和张善文、郭天源等同志亦预有力焉，黄高宪同志并提供了珍贵的图片资料；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特作了扉页题字，谨在此一并致谢。

本辑编辑中，江登峰、郑广红同志参加了工作。